辽宁教育出版社

奥尔波特等 著
刘水平 梁元元 黄鹏 译
赵元村 审校

谣言心理学

新世纪万有文库





奥尔波特等　著
刘水平　梁元元　黄鹂　译
赵元村　审校

谣言心理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谣言心理学/（美）奥尔波特等著；刘水平，梁元元，黄鹂译；赵元村审校.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3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6辑·外国文化书系）
ISBN 7-5382-6488-4

Ⅰ. 谣… Ⅱ. ①奥… ②刘… ③梁… ④黄… ⑤赵… Ⅲ. 谣言—社会心理学 Ⅳ. C912.6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90205号

学术策划	王 土 林 夕 柳 叶
文库工作室	俞晓群 刘国玉 柳青松
总发行人	俞晓群
责任编辑	柳青松 李忠孝
美术编辑	吴光前
封面设计	郑在勇
责任校对	李守勤
出　　版	辽宁教育出版社（沈阳市十一纬路25号）
发　　行	辽宁省新华书店
印　　刷	沈阳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3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32　印张 5.75
字　　数	130千字　插页 1
印　　数	1—5 000册
定　　价	9.00元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六辑弁言

在开始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前后，辽宁教育出版社提出一个口号：为建立书香社会奠基。这口号讲得颇有分寸：只求奠基，未敢说书香社会何时到来。在出版社说来，只是尽其在我，为建立书香社会出一份力。到了今天，我们是否可以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了。

何以敢说书香社会正在到来？君不见，中国上上下下，正出现一股轰轰烈烈的创建学习型社会的热潮。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首先提出创建学习型社会的任务。党的十六大以后，大家进一步认识到，创建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在文化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学习，现在已经成了一项全民的活动。

要学习，就得在在有书本可得，处处有书香漾溢。学习自然不能本本主义，然而学习不能没有书本。几十年前的一个伟大号召：认真作好出版工作，眼下正在获得新的意义。

《新世纪万有文库》出到了第六辑，离千册的目标已近。虽然《万有文库》的老创办人王云五先生近年声名渐佳，我们却总觉得快要和《文库》话别了，不无惜惜。现在眼见创建学习型社会的蓬勃气势，深感责任重大。《新世纪万有文库》无助于读者直接接触当代最新

思潮，学习最新技艺，然而欲明文化学术之源流，洞悉时新学问之底奥，它还应是得力助手。希望在最后几辑，为创建学习型社会服务得更好。

《新世纪万有文库》编辑部

二〇〇二年底

原著序

大部分日常社交谈话总包含着谣传。日常生活中，我们与朋友聊天时，也充斥着各种有根据或无根据的小道消息。毫无根据的谣言是一种未经证实的、偶然性的谈话，其目的不过是与朋友打发时光。我们传播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时，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跟无意识地问候“早上好，天气不错！”一样。

这种社交谈话只是向我们的对话者表达一种含糊的友好感觉，避免沉默的尴尬，它们只是谣言传播的一种形式。但是，大多数谣传和小道消息并非毫无根据。它们有深切的目的，有重要的感情上的目的。只是说者和听者通常无法表达出来，他们只知道这种流言对他们很重要。它似乎能不可思议地缓解他们不稳定的情绪和焦虑。

虽然谣言的散布，一直是重大的社会和心理问题，在危机时刻更是如此，每当社会局势紧张，不实的报道便恶毒地增长。在战时，谣言或散布不必要的担忧，或夸大希望，从而使道德遭到破坏，国家安全受到威胁，它们威胁着军队情报的安全，尤为有害的是，它们传播敌视和仇恨国内本地驻军的有害偏见。战后谣言的破坏性影响仅稍轻于战时。

正是战时谣言问题，促使我们着手本书中叙述的研究性调查。但是，当我们开始分析与战争及和平年代流言散布有关的试验时，却苦于缺乏系统描述该课题的社会心理学文献。至今，似乎无人尝试对谣言的基本现象作统一协调的描述。因此，我们觉得有必要以基础教科书的形式，将所有与此重要课题有关的信息汇集在一起。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谣言都不应仅仅被看成是纯粹的怪物，是人们

在有意识的社会行为中，奇特但无价值的一种偏离。恰恰相反，事实证明谣言原则被广泛应用，它在回忆、忘却、想像及文饰作用方面典型的歪曲过程，与我们在人们的交流形式中发现的歪曲过程非常一致。例如：传奇故事，它们是某个家庭、部落或民族的人文精华和英勇行为或事件的永恒传说。保存传奇故事的目的，以及它们流传变化的过程，与那些转瞬即逝的谣言传播时所产生的现象基本相同，在法庭证词中，在向朋友描述过去的经历时，在俏皮话和自传中，在谚语、格言和传记中，甚至在历史著作和艺术创作中，我们也发现与存在于一般谣言歪曲中相同的非常重要的原则在起作用。对个人和人文内容进行省略、突出、同化的趋势，存在于所有不受客观事实标准严格限制的人类交流形式中。

虽然在下面的章节中，我们试图指出谣言原则的更广泛应用，但绝大部分篇幅将集中在那些未经证实的通常被称为谣言的主题，通过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些范围更窄的例子上，希望他能精通其中所包含的规则，从而自如地运用到人类交流的所有相关形式中。

我们将使用的“谣言”一词，是一种通常以口头形式在人们中传播，目前没有可靠证明标准的特殊陈述。

任何谣言总暗含着传播一些真相的意思，即使传谣者在趣闻的开场白中提醒说“这仅仅是谣传，但我听说……”，里面也含有这种意思。

传播的媒介通常是口头语言。确实，谣言偶尔也印在报纸或杂志上，或者传播于电波中，但是，负责任的出版者和广播电台正学着控制那些道听途说的报道，尽量避免传播谣言。而另一方面，诽谤的小册子和不负责任的出版物是有害谣言的常见载体。

我们的定义将集中于“谣言一般是特殊的和有关时事的”这样一个事实上，也正因如此，谣言通常是暂时引起人们的兴趣。谣言来来去去，有时候同样的谣言反复出现，但它们几乎总是与事件或人物有关，一则谣言的主人公通常很容易识别：某先生啦，一位电影演员啦，俄国人啦，隔壁搬来的陌生人啦，某联邦机构等——这些都是谣言的典型目

标，有少数谣言没有人物和明显的受害者。还有少数谣言不能明确说明谣言大意的行为或事实的性质。对事件道听途说的报道，小道消息，诋毁，对即将到来的事件希望或灾难性的预言，都是谣言的具体表现形式。

我们对谣言定义的中心特点坚持认为：谣言仅在缺乏“证据的可靠标准”时盛行，该标准使谣言区别于新闻和科学，使欺骗区别于知识。确实，我们不能总是很容易知道证据的可靠标准何时出现。正因如此，我们不会总能分别哪是事实，哪是想像。刊登在一家声誉卓著的报纸上的、标明日期的、所有读者都可看到的新闻，通常可以作为证据的可靠标准。但是，当告诉朋友这则消息时，偏离了印在报上的内容，谣言便由此产生。如果我们口头表述与报上所说的一模一样，那就没有谣言了——当然，除非最初的新闻本身就背离了证据的可靠标准，或它本身就是谣言。

因此，为了判断我们听到的是信息还是谣言，我们必须先判断描述离它所依据的证据是近还是远。在谣言中，证据的来源越来越模糊，经常退至什么也没有、至多不过是“他们说……”，尤其是当证据的标准是由一个代词出现时，肯定是谣言。有时候证据的标准难以捉摸，就像这种熟悉的形式“我从一位权威人士那儿听说……”。

因为证据的标准有时存在于提供消息的人本身，所以我们经常需要判断提供给我们消息的人，是否真的知道他所说的情况。我们能肯定一位科学家在给我们说到他的专长时是不会带有谣言的。医生与外行的朋友们相比，不容易相信或传播有关神奇治疗方法或荒谬可笑的流行病方面的谣言。冲绳岛上的老兵，也比其他人不易相信或传播有关发生在该岛上的战斗虚构。虽然老战士在讲述一场战役时倾向于依靠他们的想像。任何人，在有关他们专业方面都有可靠，或相对可靠的证据标准，但对外行来说，通常难以判断他们的专业与公正程度。

在大多数事情上，我们都是非专业的，谣言就因此而产生。我们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耐心去检验我们所听到的，是否背离证据的外在标

准，即使有时这些标准存在，也能得到。所以，我们抵御谣言惟一可靠的方法，就是对所有道听途说的描述持普遍怀疑态度。我们希望本书读者能形成谨慎的怀疑态度。

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得益于R.H. 纳普的经验，战争初期他曾为马萨诸塞公共安全委员会研究谣言问题。本书还承艾达和罗伯特·奥尔波特；多罗西·C. 波斯特曼批评指正。多萝西·L. 波斯特曼和西尔维亚·B. 科尔钦，洛兰·莱尔曼曾帮助编写本书。本书获得的例证一般都是由Hlughton图书馆的阿诺尔德·韦伯格博士，罗斯·E. 塔格特先生，A. 拉斐尔·塞勒姆女士和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塔科布·卢森伯格博士提供的。我们还要感谢埃莉诺·D. 斯普拉格女士帮助编纂本书，感谢查尔斯·沃兹沃斯先生为我们画的用于谣言实验中的生动插图。

我们还要向下列出版社允许我们转载其出版著作中的例证或原文段落表示感谢，它们是：《铃声》辛迪加；Bobbs-Merrill公司，剑桥大学出版社；E.P. 达顿股份有限公司，Hoghton Mifflin公司、阿尔弗雷德·A. 克诺夫股份公司和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并向下述机构和期刊的编辑和出版者致谢，它们是：美联社、波士顿《环球》杂志社、波士顿《先驱者》报社、纽约《先驱者论坛》报社、《纽约人》杂志社、《公共管理》杂志社、《公共舆论季刊》杂志社、《科学》杂志社和《锡拉丘兹邮政标准》。

目　录

第一章　战争时期的谣言　1

珍珠港谣言——谣言与国家士气——谣言防御——谣言攻势——武装力量中的谣言

第二章　谣言为什么会流传　17

谣言的基本法则——散布谣言的动机——投射(指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谣言公式的归纳——谣言流传的间接原因——最后阶段的谣言

第三章　评述与回忆　30

评述——感知、记忆、描述——个体与群体记忆

第四章　一种实验方法　38

实验室方法——标准程序

第五章　实验结果:省略与突出　45

省略的限度——突出

第六章　实验结果:同化作用　65

不涉及情感的同化作用——更强烈刺激下的同化作用

第七章　实验结果:推断　79

主题变换——虚构和添加——自发行为的结果——语言的误解——时间和地点的错误——孩子们的报告

第八章　歪曲的基本模式　94

歪曲的三分模式的普遍性——创造性的添加——谣言是否都是假的?——夸张——虚构——凝缩——习俗化

第九章　社会中的谣言　114

谣言和历史——谣言和传说——谣言的分类——热爱和憎恶的融合——谣言受众——耳语运动——报刊和谣言——贴着标签的谣言——谣言和幽默——谣言和骚乱——小结
第十章　谣言的分析　147
谣言分析指导
附录　168
有关部门制止和控制战时谣言的标准

第一章 战争时期的谣言

在1942年和1943年那些紧张的日子里，谣言成了美国关心的重大问题。那时战争情报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指出了谣言产生的原因及控制它的方法。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完全正确，他说："谣言在没有消息时到处传播，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而完全地提供给人们最准确的消息。"

确实，谣言在缺乏新闻时滋长。正因为人们确信政府将有关战争破坏性的消息准确地告诉了他们。他们知道了最坏的消息，所以，在纳粹空袭伦敦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并无蛊惑人心的谣言。当人们确信其知道了最坏情况时，他们往往不会再虚构更坏的谣言，因为那只会更添烦恼。

同时，也不难证明，在消息太充足时谣言也会满天飞。在报纸发表有关珍珠港灾难的正式报道之前，有关我们在此次事件中，损失惨重的谣言并不多。虽然在1944年夏季，报纸披露企图暗杀希特勒之前，已有希特勒死亡的谣言，但更多的谣言是出现在报纸披露之后。1945年4月底及5月初，有关和平谣言的泛滥，是与新闻机构中公开讨论德国即将崩溃同时出现的。类似地，在胜利日前夕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谣言的洪水席卷全国，关于战争结束的过早传闻传播太快，来不及正式否定。

谣言历史中奇特的插曲之一：在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总统突然死亡的消息公开后的几小时内，便到处流传着许多著名人物死亡的谣言。其中包括马歇尔将军、比尼·克罗斯比和拉

瓜迪来亚市长。如果公共事件没有新闻价值，一般也不会滋生谣言。在某种条件下，新闻机构越突出某消息——尤其是突发性消息，该消息便越要承受更多更严重的谣言歪曲。

战争情报局那位官员的错误在于，他认为谣言纯粹是一种情感产品，是可靠信息的代替物。他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当重要事件出现时，个人从来不只是认可这件事，他的生活深受影响。在他的意识里，事件的情感暗示产生各种幻想，他便寻求解释并想像不着边际的后果。

这位官员还不准确且过于简单地陈述了谣言传播与控制的部分程式。当事件对个人的生活有重要影响而又缺乏有关该事件的消息，或即使有也使人在主观上产生分歧的时候，谣言便开始流传。这种分歧的原因有多种，有时是新闻没有清楚地报道，有时是听到有关该消息的相互冲突的描述，有时则因为个人对该消息的理解力的原因。最重要的是，尤其在战时，当人们不相信他们所获得的消息时，谣言便会迅速蔓延开来。

珍珠港谣言

1942 年 1、2 月，恐怖的谣言在美国泛滥。这些谣言的主题总是：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中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比当局公布的要大得多，还有些谣言宣称，整个太平洋舰队已经于 12 月 7 日全军覆没于珍珠港。更有的说，同一天有 1000 架飞机还没起飞就被毁。现在已经知道，珍珠港事件中遭受的所有损失，并没有完全在官方的最初报告中公布，这可能是出于军事安全的原因。因人们对此表示怀疑便产生了谣言。不相信新闻，公众没有可供核实与控制其可怕想像的事实标准。谣言流传如此之广，如此扰乱人心，以致罗斯福总统于 1942 年 2 月 23 日，在炉边谈话时，认为有必要抽出一些时间来否认这些幽灵般的谣言。即使那时，总统

也不能将整个事件的真相全部公布于众。但他尽了最大努力，在不损害国家安全的条件下，尽可能多地公布了事实，以缓解人们的恐惧。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信心呢？我们将作简单的解释。

首先，让我们给出珍珠港事件的谣言程式，我们发现——如所有谣言那样——虽然事件对人们的生活有重大影响，但有关它的新闻却含糊不清。在该特殊事件中，这种含糊不清来自于当时起作用的三个条件：(1)许多人极不信任华盛顿政府，不信任它以前的改革，它的干涉主义，它的一系列机构及它的那些"长发专家"①；(2)一般来说，人们不大相信战争期间的新闻政策，即使那些不反对政府的人也不完全相信官方公布的消息。在战争初期，怀疑也许有一定的正当理由。(3)最主要的是，人们的生活由于战争的到来而被完全扰乱：家庭支离破碎，计划被迫改变，前面是黑暗而不可知的将来。尤其是，那些不能确信我们有能力阻挡攻击甚至入侵的人们感受的恐惧更大。要解释这种恐惧，就必须找到一个貌似真实的理由。而手头最简单、最具体、最适当的一种理由，便是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几乎全军覆没，我们差不多毫无防御能力了。因为除了珍珠港没有其他战斗，那么使我们无援的一定是珍珠港事件。相信具体的、近期的、戏剧性的理由比相信遥远的、不易于辩认的理由(即我们自己未能为国家防御作好准备)要更容易。这样，伴随一种"穷根究源"而产生的强大意识否定了接收到的这类新闻。②

---

① 整个战争期间一直存在着对官方消息发布的不信任，从下列民意测验可以看出来："你认为政府公布了公众应该了解的关于战争的信息了吗？"珍珠港事件后三天，只有68%的人准备回答"是"，回答"是"的人数量在整个战争期间一直波动，但从未超过70%，在1944年3月甚至低至51%。

② 谣言传播最重要的心理根源之一，便是人们想理解并简化许多接踵而来、发展迅速的复杂事件的需要。谣言使事情变得比真实情况更简单，这种简化与理解的努力我们称为"穷根究源"。

谣言与国家士气

珍珠港事件的谣言和所有其他过分夸大军队损失的谣言，可归纳为恐惧性谣言。恐惧性的谣言，尤其是在战争初期，总是比希望性的谣言要多得多。后者通常以预言战争早日结束的形式出现。据说伦敦的《劳埃德日报》曾引述说有十分之九的人认为战争将在圣诞节(1942年)前结束。有一则荒谬的小道消息，在全国广泛流传：一位预言家预言希特勒将在六个月内死去。听到预言的这个人对此表示怀疑，但这位预言家坚持己见，并说"是的，希特勒将在六个月时间内完蛋。这就跟你不久将在你的汽车上发现一具尸体一样将成为现实"。故事继续编道：不久，这位怀疑者在一次驾车外出时，在路边让一位受伤者搭车，在送他去医院的途中，却发现那人已死在他的车上。

这样怪诞的胡说竟然引起足够的兴趣而流传广泛这似乎是怪事。原因之一是希特勒可能死亡对传谣者很重要；二是因为他们希望希特勒早点死亡；三是围绕任何人死期臆想上的模糊性；四是希望本身需要自圆其说。这种自圆其说的逻辑是这样的：既然那个预言家成功地预测了汽车上的尸体，那么她关于希特勒之死的预言也是可信的。

恐惧性谣言，与希望性谣言一样，在战争期间对后方的士气有重要影响，前者因其令人担忧的特点，容易打击人们对己方取得战争胜利的信念，它们招致不必要的焦虑，有时导致失败的观点。

而希望性的谣言，因其过分乐观的特点，有时导致削弱战斗力的沾沾自喜，由于得到盟军一系列胜利的消息，使人们放松战斗准备，结果导致献血人数的下降。当人们一旦相信有关即将到来的胜利或战争快要结束的谣言时，就容易放松努力，减少其

奉献。

尽管这两种谣言对国家士气影响很大，但与第三种谣言的影响相比还是相对轻的，第三种也是战时谣言中最多的一种：带来仇恨与敌意的——挑起分裂。

1942年9月《读者文摘》刊登了一篇名为《波士顿战争谣言四起》的文章，后面印有一份问卷。它给出了1942年夏天，从全美国收集到的1000种谣言的百分比分配。

分析表明，1942年夏天的所有谣言中，约有三分之二是怀有敌意目的，造成分裂影响。大约有9.3%的谣言是反犹太人的，3.1%反黑人，21.4%反当局，19.6%反陆军和海军。一股连续不断的抱怨和指责的浊流对准了美国同胞的团体，而他们实际上都在为战争胜利作出牺牲。这类谣言只会在关键时刻损害民族团结。谣言的受害者被激怒，当他们最不被宽恕的时候，怀疑与反斥成为普遍现象。

谣言防御

不难明白，为什么政府官员和爱国公民十分警惕谣言对后方士气的潜在损害。虽然他们相信传播谣言，是战时紧张不安的一种自然而不可避免的症状，但他们也不知道谣言在国内滋长失败主义、冷淡情绪或在国内制造混乱方面起多大作用。

1942年Ruch和Young就谣言的传播与接受程度作了一项战时研究。通过提问对象，认为谣言是否真实(不论其以前是否听说)，计算出一个“信谣指数”。纽约市平均信谣率是9.4%，波士顿为3.8%，事实证明，不论是流传度还是接受程度，都是穷人中比富人中更高；45岁以上的人中比年轻人高，犹太人中比非犹太人中高。这次调查表明犹太人易于相信谣

言，这也许可归因于如下事实：谣言主要是“让人恐惧的”那种，在战争初期，这容易引起许多犹太人的不安全感和担忧。

政府机构广泛吸取全国公众的意见，意识到破坏性谣言传播的危害，但采取什么措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见到总统亲临电台否认一则特殊谣言。还有一次，在战争后期，他又明确指出，谣言反映了种族和宗教仇恨，要努力制止它们的传播。历史短暂的统计局的《分裂与征服》及其他出版物是谣言的“解毒剂”。有一小段时间，战争情报局委派它的一个下属单位专门控制谣言。

这个机构不同于私人组织的“谣言门诊部”。谣言门诊部集中精力驳斥错误的谣言，而战争情报局则信赖“谣言在缺乏新闻时传播”这种准则，并集中精力提高新闻质量，增加公众对新闻的信心。虽然战争情报局对为驳斥谣言而重复谣言的做法表示怀疑，但它并不干涉大众化报纸谣言诊所的工作。战争情报局所持的观点是，用事实制止谣言胜过单纯的反驳，免得在反驳过程中，反而使谣言过度流传。谣言诊所的看法则相反：除非给他们指出来，人们一般不会看到事实的相关性。指出谣言并猛烈批评则是上策。两种机构也许都错在过分依赖事实与逻辑。情报与争议不足以消除那些滋长恐惧与仇恨的谣言。当一个反犹太主义者指控犹太人逃避兵役，后来又面对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犹太人按照他们在总人口数中的比例服了兵役，他会怎么做？他只会改变谣言的内容（而不是敌对情绪），他会说“对，但他们在军队里干的都是轻松活”。因为不可能测定军队中谁干“轻”活，谁干重活，所以也就不可能驳斥了，即使驳斥是有用的。要堵住有动机的传谣者的嘴，光有正确的信息与逻辑是不够的。但在一个民主国家（而不是极权主义国家），无论是政府机构还是私人机构，都有责任尽自己的努力呼吁公民保持理智。

政府情报机构运用了许多间接办法对付谣言，公布了有

关事实。用标语牌和宣传小册子呼吁民族团结；联邦调查局与陆海军的情报机构暗中调查，追查那些极为恶毒谣言的踪迹。

战争情报局在谣言问题上所做的最大努力与该问题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方面有关，称为“情报安全”。它生产并散发了许多醒目标语；给人印象最深的恐怕是“Zip your lip and save a ship（闭上你的嘴，挽救一条船）”。不负责任的谈话减少了，令许多观察者感到惊奇的是，连一些老百姓也学会保守战争秘密了。

虽然，情报安全的战役无疑是成功的，但人们发现，要设计一种防止那些更不好下定义、更阴险谣言的方法并不容易，这类谣言往往有暗中制造分裂，削弱人们斗志的特点。

谣言诊所的努力是广为人知的，启用这种新闻防卫武器的功劳当归波士顿《先驱旅行者报》的 W.G. 加文先生，他在 1942 年 3 月至 1943 年 12 月间，在当地心理学家及其他热心公益人士的帮助下，编辑了一种星期特刊。这个主意引起美国和加拿大的 40 多家报纸与许多杂志的注意及仿效。通常揭发的谣言是类型简单，回答简明扼要，但偶尔，如下面的例子所示，是由一位心理学家写专栏文章，对专业知识的一些片断作一个通俗的解释，让人们清晰了解那些更复杂、更危险的谣言。

谣言诊所

请体贴陆军妇女队队员

今天的谣言诊所由锡拉丘兹大学政治心理学教授主持。

几则破坏性的流言蜚语比目前流行的有关陆军妇女队队员的错误谣言，给你们谣言诊所带来的惊愕更大。这里有几个例子。谣言：“500 多名陆军妇女队员非法怀孕被军队遣返”；谣言：“500 名怀孕陆军妇女队队员从北非返回”；谣言：“艾森豪威尔将军说，陆军妇女队队员是他最大的烦

恼之源，她们对他来说毫无价值”。当然，没有丝毫证据能支持此类传言。

有关北非陆军妇女队队员的谣言是错误的，起码，因为它的数字就是不对。该战区的陆军妇女队队员的总数大大少于500人(准确数字乃军事秘密)。至于艾森豪威尔将军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们有他的录音，他认为陆军妇女队员们有高度组织纪律性，并希望她们在北非有更多的成员。

下次如果你再听到此类谣言，你就问传谣者，知道多少有关陆军妇女队员过失的案例？有直接和可信证据吗？然后再问他：到底有多少陆军妇女队队员？通过这种质问，你会知道，这类给整个军队组织抹黑的谣言，只是想像、道听途说或急于下结论的又一种例证。

“大批陆军妇女队员不道德”的谣言荒唐可笑，它们被事实及自身的缺乏逻辑性驳倒了。然而奇怪的是，它们仍在传播，并且越来越存心不良，如果不是智力方面的问题，那么就是我们美国的骑士精神标准出了差错。

不因事实而止住

这些关于陆军妇女队的谣言，不像许多其他谣言，它们并没有因事实的公布而止住。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是，它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内在情感中，且它源于，我们大多数人都具有而没有意识到的一种情绪。客观存在的证据也对它无能为力，我们必须审视自我。

我们人是一种复杂的动物。许多时候我们搅乱一些事情，但我们不知道是什么在困扰我们。虽然长大了，我们有时候还像婴儿似的，受惊吓，受挫折；痛苦，坐卧不宁，但却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但是，有一个特别的理由解释，为什么我们成年人不是总能清楚我们自己的内在感受。那就是“社会”对我们有要

求，我们要得到别人和自己的尊敬。我们有许多连对自己也羞于承认的完全自然的感觉。

这种态度(被称为“抑制”)使我们易于想像或夸大出现在其他人身上的这类倾向。我们认为问题在别人，而不是在自己。例如，我们不喜欢承认自己也会害怕；我们有时会走极端，然后又大肆责难来掩盖事实。当这些罪行遭到责难时，便会为所犯的罪行作证，专制的领导人也会为其辩护。

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思想狭隘，有偏见或自私。因此，假如我们公开指责我们敌视的某些人群涉嫌自私自利，我们就能转移内心对这些人的偏见。与此同时，我们也就忽略自身存在的自私。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的缺点或自卑感，因此，如果我们能指出别人的缺点，便有助于我们维护自己的自尊。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害怕自己的冲动，或对此感到害臊，这可能导致谴责别人的非法行为。

找到真正的原因

我们许多人不承认这些自身存在的人类特点，而是将其关闭在心灵的暗室里，假装它们不存在。我们平时只为有意识的行为敞开心灵的“前厅”，而把秘密保存在我们不喜欢进入的“后厅的密室”。我们用“前面的梯子”接受体面的来访者，而把“后面的梯子”留作“暗室”的入口。

正是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许多仇恨与偏见的错误谣言的真正原因，还有那些使我们与我们的美国同胞们产生隔阂的“伪”谣言。促使我们怀疑与诽谤同胞中某些公民群体的原因，并不是真正的客观事实，而是关在我们心灵后厅“密室”的那些感觉。“后面的梯子”上传来了有关别人短处或不道德的谣言，它们利用我们对自己感到的恐惧与不安全，但我们把这些混乱拒之心灵的前门之外。

可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拒绝相信自己有这类弱点；相反，我们相信造谣者所说的关于其他人的谣言。我们把不愿意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抛"到一些相对无知的受害者身上，然后为了使自己感到更安全，我们加入到针对受害者的喊叫声中。我们就这样传播了谣言，有时甚至添油加醋。

还有一些奇怪但却同样真实的东西。如果我们有某种自认为不好或危险的愿望，并将其关在我们的心灵暗室里，我们一般不会扼杀这种愿望，虽然我们不将其示人，但并不意味着它不会得到放纵或满足。相反，我们听到的每一点"有趣的"流言蜚语都有助于它们的"滋长"。

我们的冲动要负责任

简言之，我们至少能在想像中享受这些被禁止的快乐，只要我们将其保持在"前厅接待室"之外。事实上，关上"密室"之门给了我们一个享受这些快乐的更好机会。只要我们不是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冲动，我们便会沉迷于其中，这是真的。如果突然开始意识到它，我们会恐惧，然后也许会找一些替罪羊，并且"义正辞严"地表示对别人的愤慨。

然后我们说英国人、俄国人、犹太人或其他某些人正在秘密地在战争中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对此我们除了最高贵的爱国主义，没有别的感觉。我们能说——"那些可恶的，不正派的陆军妇女队队员们！——她们与我们这些不介意性生活的正派人物是多么不同！"。但如果我们把性生活关闭在"后厅的密室"中，十有八九我们在细想陆军妇女队员的这些"可怕的实践"时，在相信这些，谈论这些时暗自高兴。

需要明白的道理

诽谤的谣言，离间我们美国人，它们不是偶然产生的，更不是由于错误或粗心的言词造成的，也不是轴心国间谍

制造的，而是存在于听谣者内心的的一部分。当我们学会认识自己后，我们不再喜欢这类"后楼梯"传来的流言，不会因听到它而震惊。我们也不会把它当做某种有趣味的或戏剧性的内容传给别人，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传播人的内心，所以我们不相信。

每个美国人，通过自己的知识，都能在阻止危险的造成分裂的谣言时做到这些。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助于维护陆军妇女队员们的光荣与尊严，——保护这些忠诚的美国妇女免遭人类心灵"暗室"的损害。你愿意尽自己一份力吗？

第二个例子摘自1943年7月18日的波士顿《星期日先驱报》①。

谣言诊所

今天，我们讨论一则混合谣言，你也许确实听到了它的某些部分。

谣言：某些少数民族（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或其他）不忠于美国，却（打算发动暴乱）（阴谋控制政府）（逃避兵役）。

事实：没有任何站得住脚的证据能够证明这些针对我们的同胞特殊群体的诽谤是真的，这些谣言是顽固而奸诈的谎言。

分析：虽然它们全都缺乏证据，这些涣散士气的谣言却仍如此普遍，一定有一些有助于它们传播的思想遁辞。我们采访了一位心理学家，问他，为什么正是美国人需要齐心协力的时候，却有那么多人忙于传播针对其同胞的仇恨的谣言？这位哈佛大学心理系的系主任回答了一些重要的问题，他的回答揭示了挑起种族与宗教仇恨的不容乐观形势。

① 经波士顿《星期日先驱报》社允许转载。

问——种族谣言真的有害吗?

答——现在流传于美国的所有谣言中,种族谣言是最危险的。一个传播种族谣言的人比一个炸毁一家工厂的怠工者造成的危害更大。例如,底特律的那帮诽谤者,不仅使军工厂损失了难以数计的时间,而且搅动一帮乌合之众,干出那些如纳粹所做的暴行。最糟糕的是,他们使十分之一人的生活痛苦,使其对美国民主与公平的信仰产生动摇。假如出现更多诸如此类的事件,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并且该输)。现在,希特勒的惟一希望就是美国人不团结。

问——为什么有些人有种族仇恨,并且对种族诽谤津津乐道?

答——答案并不简单,也许最基本的原因是种族谣言滋长了他工作上的不安全感,或者剥夺了他生活中的好事,他由来已久的火气更大了。奇怪的是他不能确切地知道他对什么生气,或者不知道该责怪谁。因此他挑出了一些或多或少有些无知的旁观者发泄一通。他挑选的对象可能是他的妻儿,甚至家里养的猫。种族仇恨者就是那些感到不安全的人们,他们挑出一些因宗教或肤色不同而显眼的看上去有些奇怪的人群,他们侵犯这些不幸具有"高能见度"的无辜的人们。例如,我们可以放心地说,黑人本身很难成为黑人仇恨者的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仇恨者本人的经济、家庭或人际关系。

问——为什么种族谣言在战争时盛行?

答——根本原因是我们遭受更多的混乱与刺激。我们不是责怪造成我们烦躁不安的敌人,而是挑出一个更近的、我们天天看得见的受害者来发泄,对我们来说,事情变得奇怪而不合理了,于是我们简单的头脑告诉我们,应该怪罪于住在对面的那群"奇怪而不合理"的人。

问——是不是所有传播种族谣言的人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感到不安全或内疚呢？

答——不全是。这伙人的领导者无疑是的，他们中有些人是典型的偏执狂。但其他人也许仅仅是追随者，他们喜欢从众。通过加入迫害者行列，他们获得一种不正当的安全感。通过以“白人”，“基督教徒”，“优秀的人”名义联合起来，他们的自我恶性膨胀，却忘了这样做的同时，他们实际上成了认为自己比其他同胞优秀的讨厌人物，成了攻击更弱小、更没有防卫能力群体的懦夫。

问——依您的意见，怎样在这个国家控制这种诿过于人的现象？

答——办法有多种。首先，应该教育成人和儿童正确对待种族差别，这些差别其实很小；还应教给他们我已经说过的简单的诿过于人的心理学；然后，我们应让自己学习邻居的好的品质。伤亡名单便是下面问题的答案：谁是忠诚的美国人？但是，真正的良方是，我们必须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充分的经济与教育机会。这样，没有哪一个群体因自己的挫折而责难另一个群体。最后，我们应当要求有保护少数民族权利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法律，并要求警察强制执行这些法律。特别是在困难时期，警察处理许多种族混居区问题时必须机灵、使人安心、公正。

发行面广的杂志给谣言诊所的意义作了大量额外的宣传，并通过生动的故事，帮助公众建立了“谣言意识”。

但是在与谣言诊所打交道的过程中，心理学家们发现办得糟糕的专栏文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有必要为诊所的建立与管理设计一些标准。在附录中转载的被“波士顿《先驱旅行者报》谣言诊所”及其合作机构“马塞诸塞州公共安全委员会”下属的

"宣传分析委员会"遵守并广泛散布的标准即是一种。它们主要是由 R.H. 奈普制定的,他当时是宣传分析委员会的负责人。

谣言攻势

在现代战争中,在后方进行谣言防御可以对付敌人的谣言攻势。纳粹发动的心理战主要包括"瓦解与征服"战略和"恐怖"战略。谣言是这两种战略中最杰出的战术。1940 年,埃德蒙·泰勒在他的《恐怖战略》中,讲述了在准备一次闪电战时,德国人是怎样用失败与恐怖的谣言使受骗者透不过气来的。通过无线电波,一则又一则谣言传到波兰、法国和那些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三国)。谣言描绘逼近的侵略,同时又描绘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他们的目的是制造混乱与挫败士气。他们对参加同盟国的政府的诚意表示怀疑。对他们援助不幸国家的能力表示怀疑。同时,他们报道波兰与法国大获成功的假新闻。这使人们产生过度的希望,然后又迅速导致失望与恐怖。在德国获得早期胜利后骄傲自大的时候,纳粹无线电的宣传高度分层,就是说,它针对所播放国家,针对每个国家的不同社会群体,投其所好,宣传内容各不相同。虽然这些宣传不是专门用来播种谣言的,但绝大多数却收到了这种效果。因为战时的谣言经常就是二手、三手或四手的宣传材料。播放的主题通常干脆而简短,容易重复,在面临侵略威胁的混乱气氛中易于迅速传播。接下来发生的便是恐怖、慌乱、目标不一致与一窝蜂地退却。

与恐怖战略相比,"瓦解与征服"的战略便需要更多的诡计、更多的吹嘘与重复。所灌输的谣言是算计好了能挑起一个国家内部的怨恨,从而加速其灭亡。有一段时间希特勒曾吹嘘,美国的灭亡可以当做一件"内部工作"来执行。但是他忘了,光有制造分裂的谣言是不够的。

美国的心理战在播放谣言方面则停留在一个很小的范围，该战术发展太晚，在后来被称为"黑色宣传"的整个战略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同样，与我们依靠直接公开的控诉，尤其以新闻与不可辩驳的事实逻辑为依据进行反驳相比，我们很少用这种卑怯的战略。①

武装力量中的谣言

几乎每一个老兵都能记起，从他参军到退役，谣言的洪水一直包围着他。当老百姓中不时流传一些白日梦，令人恐怖的幽灵和制造分裂的谣言时，军人们却浸泡在其中。原因很简单，他们遭遇的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有重要意义，而事件的过程他们看不到，概念的重要性与事实的模棱两可性都达到了顶峰。

特别是在遥远的异国他乡，正常的新闻渠道被切断了，谣言便成了"信息"的惟一来源。对船上的人来说，桥上的官员也许就是"知情人"，但是普通的水手只能受谣言的摆布。等待出发（去哪儿？）的军队靠他们神经过敏的想像猜测目的地。等待下达指令的紧张的飞行员，用等待他们的危险目标的传言、用有关他们的装备不足或有关敌人新的防空设施的威胁性谣言，来发泄他们的恐惧。

许多指挥官都很关心威胁士气的谣言。有的人通过演讲、论证明智地寻找解决办法，或者通过公布大量的新闻达到预防谣言的目的。在一些军营和一些船只上设立了谣言板报。早晨张贴，在白天的阳光下，它们看起来有点傻。一些部队还设立了谣言诊所，处理得当，它们不仅有助于日常教育工作，而且还增

① 关于独裁国家与民主国家发行的宣传材料区别的有趣描述，请参考 F.C. 巴特利特(1940)。

加了一点娱乐。

例如，在德国的一个战俘集中营，谣言诊所是固定的娱乐节目的一部分，而且被证明是极宝贵的鼓舞士气的良药。[①] 囚犯们对该集中营的情况了如指掌，在那儿，即将解放的不恰当的希望不让过早地流传。

① 靠近德国巴特奥布的 Wegscheid 的第 9b 集中营。该营的活动由布赖恩·帕特尔森先生指挥。

第二章 谣言为什么会流传

在上一章中，我们指出了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模糊性掩盖起来。我们已经说过，这种模糊性产生的原因有：缺少新闻或新闻太粗略；新闻的矛盾性；人们不相信新闻；或者某些紧张情绪使个人不能或不愿意接受新闻中所述的事实。

当然，谣言里经常有一些残留的新闻成分，一个“真实的核心”，但在传播过程中，它蒙受如此多想像的阐述，以致变得不可区分，也无据可查了。在一个谣言化了的故事中，几乎不可能确切地说出根本的事实是什么，或者根本不知道是否有事实根据。

谣言的基本法则

粗略地说，重要性和含糊性这两个重要条件似乎与谣言的传播有关。谣言的强度可以用下面的公式表达：

$$R \sim i \times a$$

用语言表达就是：流行谣言传播广度随其对相关人员的重要性乘以该主题证据的含糊性的变化而变化，重要性与含糊性之间的关系不是加法而是乘法，因为，如果两者之中有一个为0，也就没有谣言了。例如，一个美国公民一般是不会传播关于阿富汗骆驼的市场价格这种谣言的，因为这个话题对他没有任

何重要性，虽然它具有相当的含糊性。他也不会传播有关斯威士兰（非洲）居民行为的流言蜚语，因为他不关心他们。光有含糊性不会产生或强化谣言。

光有重要性也不行。假如我在一次汽车事故中失去了一条腿，虽然此事对我具有悲惨的意义，但我不会相信有关我受伤程度的谣言，因为我知道真相。假如我接受了一份遗产并知道它所包含的数目，我就不会相信夸大它数目的谣言。军队中的高级军官与一般的美国兵相比，就不易于相信谣言，不是因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对他们没那么重要，而是因为，按照惯例，他们对计划与战略知道得更多，没有含糊性，也就没有谣言。

在战时，正如我们说过的，谣言的条件是最理想的。军队事件是最重要的，然而军事机密，国家时局发展中自然的混乱以及对敌人行动的不可预知，有助于在那些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上产生高度的含糊性。

我们指出的法则是高度可靠的，但是，还有一些条件，在其影响下它的作用会减弱。假若一部分人口在盖世太保的严密监视下，又假如对传播谣言者严惩不贷，人们也许会或多或少地约束自己。

此外，因为谣言只在想法相同的人中间传播，因此，在很少交流而各不相同的一部分人口中，谣言也许避免跨越社会障碍，因而流行受到限制。

还有另外一种原因，该法则也许也不起作用。有时是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一旦明白是什么让他那么做，他便会不那么做。情况似乎总是这样：虽然在认识到自己像个机器人的过程中，人们就要摆脱这种局面，例如，一些心理学的学生发现为什么他们有这样那样令人讨厌的癖性后，会立即改掉它，或者，那些被指定观察其特殊情绪的表现过程是否与心理学家的预言一致的人发现，那种情绪无论是在感觉上还是在表现上都不自

然。同样，一个“谣言灵通人士”明白了当他处于重要性与含糊性这两种传播谣言的条件下，易于相信并传播谣言。正因如此，他反而不容易信谣传谣了。

若由此推断：自知或洞悉会自动治愈我们的坏习惯，或给我们的思想带来意外的无限制的自由，那是不正确的。还有一个心理学家很少察觉到的事实，即对一条法则运转的认识经常会改变甚至否认，这条法则便有问题。

因此——具有清醒谣言意识的人不易于受骗，我们为在战争期间由心理学家、杂志作者、电台主持人和谣言诊所的编辑们所做的教育工作找到了正当的理由。这里还存在着在大中学校的社会调查活动中是否包括一项对谣言的基本认识的争执。掌握谣言法则的年轻人，能够在证据不确切的各种情况下管住自己，但是，必须努力防止小心正当的怀疑主义变成不加鉴别的怀疑主义（即否定一切）。对谣言太清醒的人也许会发展成连最可信的报道都不相信。

散布谣言的动机

当我们说只有某个主题对听谣和传谣者有重要性，谣言才会传播时，我们便谈到谣言的“动机因素”。任何人类需求都可能给谣言提供推动力。性兴趣是产生许多流言蜚语与大多数丑闻的原因；焦虑是我们常听到的恐怖威胁性谣言的动力；希望与渴望产生白日梦式的谣言；仇恨产生指责性的谣言与诽谤。

1945年8月，流传着一则谣言，大意是：俄国对日本宣战是以获得原子弹的秘密为交易的。那些相信并传播这则谣言的是厌恶俄国人的人，还有那些不喜欢华盛顿政府的人。他们不能明说“我恨俄国”或者说“我讨厌民主党”，而是抓住一则能减轻、辩解并解释他潜在紧张情绪的谣言。

这里必须指出谣言的复杂用途，通过抨击某人厌恶的事情，能缓解他最初的感情冲动。同时，也为他当时的感觉作了辩解，又对自己和他人解释了为什么他那么感觉。因而谣言在起缓解作用的同时，还起到了作自我辩解的作用。“为什么我不应该厌恶俄国？他们只是在得到我们许多好处后才来援助我们……”“为什么我不应该感到恐慌？我们的舰队在珍珠港全军覆没……”“为什么我不该讨厌犹太人？他们这么排外……”“为什么我不该觉得比我的邻居高一等？我就没有像他那样不正当的生活行为……”

但是，缓解感情冲动并给其找点理由并不是自我辩解的惟一方法。除了特殊的情绪压力，我们继续试图从周围找到“理由”。可以这么说，除了情绪上的压力还有理智上的压力，给混乱的形势寻找一条花言巧语的理由本身就是一种冲动。这种寻求“好结尾”（即使没有人为因素）的因素，有助于解释许多谣言的持久性。① 我们想知道周围世界的究竟，我们的思想反对乱七八糟，从小到大我们一直在问为什么，这种“穷根究源”比我们自圆其说与为自己的瞬时情绪状态辩解的冲动倾向要更广泛。好奇是谣言产生的原因。一个情况不为人知的陌生人到一个小镇上居住，会滋生许多传说，来解释人们对他为什么来镇上的好奇心。城市里一条看起来奇怪的坑道会产生许多有关其用途的奇异解释。

总之，谣言提供一种能供排解紧张情绪的口头发泄途径。它们通常能为这些情绪的存在作辩解，而如果直接面对这些情绪，当事者也许难以接受；它们有时能为周围环境中令人费解的现象提供更广泛的解释，从而在使周围世界变得可理解的理智

① 当我们找到满意的解释，当我们对事态的观点清楚而稳定时，我们便发现了一个好的结尾。

驾驭过程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而谣言传播者是很少能明白这三重推动力的，他搞不清为什么他对某种谣言有强烈的兴趣，并立即广泛传播。他也不知道他所传播的谣言反映他自己的程度。因为他不明白投射的心理机制。

投射(指个人意念、欲望等的外化)

当一个人的情绪状态反映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而不自知时，我们称为投射，在他对周围事物的解释中，没有使用完全公正而客观的证据。

在睡梦中，每个人都在投射，只有在睡醒之后我们才认识到，梦中的幻象反映了我们私下的愿望、恐怖或报复欲。孩童睡着了会梦见找到了糖；体育较差的年轻人睡着了会梦到体育场上的胜利；忧虑的母亲会梦到她孩子死了。

白日梦也具有投射性。在沙发中放松自己，我们会在脑中勾画一幅我们的希望、愿望、恐惧等成为现实的画面。我们发现自己处于成功的、满意的或者有时是被击败的、破产的想像中，这就取决于思想的野马驰骋时我们的脾气或情绪如何了。

谣言类似于二手的白日梦。如果我们听到的谣言给事实作出了一个符合我们私生活的解释，我们便愿意相信并传播它。

在下面的例子中，卡尔·门宁格指出了不被承认的一部分愿望，是怎样同时推动并传播一则荒谬的谣言的。

亚当夫人对贝克夫人说："金夫人今天去哪儿了？她是不是病了？"

贝克夫人对克拉克夫人："亚当夫人担心金夫人是否生病了。"

克拉克夫人(她不喜欢金夫人)对戴维斯夫人(她喜欢金夫人):"我听说金夫人病了,我希望她病得不重。"

戴维斯夫人对爱丽斯夫人:"克拉克夫人说金夫人病重,我得去看看她"。

爱丽斯夫人对弗伦奇夫人:"我猜金夫人病得很重,戴维斯夫人刚去看望过。"

弗伦奇夫人对格雷格夫人:"她们说金夫人可能活不了啦,亲戚们都被叫到她床前去了。"

格雷格夫人对哈德森夫人:"金夫人最近情况如何?她是不是死了?"

哈德森夫人对英厄姆夫人:"金夫人什么时候死的?"

英厄姆夫人对琼斯夫人:"你去参加金夫人的葬礼吗?我听说她昨天死了。"

琼斯夫人对金夫人:"我刚听说有关你的死和葬礼的事,是谁说出来的呢?"

金夫人:"如果这是真的,有些人就会高兴了。"

作为投射稍复杂的例子,让我们举一则二战时的谣言。我们在第一章中已说过,这场战争中大部分谣言都是敌对性的谣言,包括对一些美国特殊群体违法乱纪行为的指控(这些特殊群体包括:犹太人、物价管理局、黑人、天主教徒、政府、陆军、海军、红十字会等),或者指责我们的盟友,尤其是英国和俄国。虽然逻辑混乱,可似乎这些投射的动力加快了谣言的传播。

假设一位家庭主妇跟她的邻居聊天时说道(她们有许多人确实这么说了):

我听说在x营中,有那么多的肉,他们甚至把整块的鲜牛肉扔到垃圾堆里。这位妇女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缺肉对她和她的家里人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其次,这事的证据是含糊的,她所处的位置不可能使她知道事实;还

有，肉类短缺确实给她带来了不便，使她不知如何计划和准备她家的膳食。当她觉得恼怒而不知所措时，她知道总有原因。因此在她"穷根究源"的过程中，试图找到应受责备的源头。当然，她可能会责备轴心国或希特勒，但是这些坏蛋离她遥远，罪恶昭著而又抽象，她几乎想像不出他们与她目前具体烦恼的关系。此外，如果有更好的管理，难道会没有足够的肉吗？也许她知道一些不负责任和贪婪的军官，也许她不喜欢陆军对待她的约翰尼的方式，不管怎么说，一个明确的、就近的、貌似真实的罪魁祸首出现了，所以陆军就被指责为引起肉类短缺的原因，她便这样向自己解释并责备他们。这样一个过程被称为互补投射。互补投射不是把某人自己的情绪归因于他人，而是假定他人有某种行为，从而为自己的情绪找一个"合理"解释。（可用这种方法来引证互补投射的极端情况，即充满怀疑与仇恨的偏执患者，指责其他人密谋反对他。）

但我们也许没有对那位妇女的喋喋不休作出完整的解释。假设她没有储存足够的烹调油（因为政府要求她那么做）；假设她在买肉时不交定量配给票而骗取了一点……，亦或在黑市上买了点肉，作为一个严肃而爱国的公民，她当然免不了感到良心上的痛苦，要不她又能怎样？（大多数人尽量使自己良心保持平静，为了做到这一点，至少会偶尔陷入直接投射的陷阱。）

对我们自身内疚的直接投射（非互补），是避免不舒服的良心痛苦的自然而不可思议的措施之一。艾默森在文章中指出："在别人是过失，在自己则是实验。"错的是别人，而不是我们（或者即使我们错了，与其他人的过失相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这样，我们这位很不自知的女士，就可以使良心得到平静。反映在言辞中就是："我为什么要感到内疚？我逃避一点点食物规章算得了什么？看！陆军浪费整块的牛排，相比起来，我的过失简

直微不足道。"①

还有一些有关谣言看法中过失遁词重要性的实验性证据。奥尔波特与列普金发现这样一个趋势，那些相信有关物价管理局存在浪费与特权谣言的人，承认他们在配给额中有欺骗行为，但同时又否认对此内疚或不安。相反，在那些承认欺骗并为此感到羞愧的人中，则较少有人相信有关别人渎职的谣言。总之，当我们相信别人坏时，我们是在努力逃避自身的过失道德心，如果我们多责备自己，就会少传谣。

同一原则还可以在弗伦克尔－布伦斯尼克和曼福德的实验(1945年)中得到证实。他们发现，在一组直言自己反对犹太人的大学女生中，存在一种逃避对自己的缺点负责的倾向。相反，在一组不反犹太人的学生中，则存在一种明显的"自责型"倾向，即责备自己的过失与失败。拒绝面对其过失的人们才寻找替罪羊；而那些知道自己弱点的人似乎不需要替罪羊。

谣言公式的归纳

我们可以对我们的讨论作如下总结：

谣言的产生并在同源社会媒介中流传是由于传播者的强烈兴趣造成的。这些兴趣的有力影响要求谣言主要成为一种文过饰非的手段。为正在起作用的情绪作解释、辩解，并提供含义。有时候兴趣与谣言之间的关系是如此密切，我们可以把谣言简单地概括为一种完全的主观情感状态的投射。

① 当然，很难证明讲述责难性谣言的人自己便犯有责难别人的那种罪行。但是，一般情况是当人们批评别人的过失(我们知道他自己也有这种过失)，却自以为自己有道德。

在谣言与主观情感状态之间建立了紧密联系后，让我们再看看我们的公式

$$R \sim i \times a$$

这种分析方式与麦格雷戈（1938 年）预测中一厢情愿因素很类似。在麦格雷戈的实验中，问到人们（1936 年）是否认为希特勒还会掌权一年。大约有 95% 的人认为会。他们还被问及对希特勒的个人态度，大多数人都恨他。关键在于人们感觉上的憎恨并不影响其预测，因为形势并没有多少含糊性，当时希特勒对德国的操纵是牢固的。另一方面，这些对象被要求预测英国爱德华八世在一年之内宣布结婚的可能性，同时问他们是否认为他应该结婚，那些反对国王结婚的人，只有 32% 的人作了肯定预测。而那赞成国王婚姻的人则有 80% 预测“是”，而进行实验时，有关国王婚姻的消息是极为含糊、极为矛盾的。在没有客观证据引导的情况下，大多数人是根据其主观偏好来预测的。

麦格雷戈写道，“……主观因素对预测的影响受刺激情景的含糊程度限制，但也受事件对预测者重要性的影响。如果重要性或含糊性中有一个为零，那么主观因素对预测的影响大概也为零。在前一个例子中，没有影响预测的愿望，预测者只是简单记录……刺激情景的含糊性。另一方面，如果含糊性为零，刺激情景将完全是抑制的，即使强烈愿望也没有用。”

麦格雷戈的工作引导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即谣言是遵循一条更普遍的社会心理学法则的，这条法则可表示如下：

对环境的看法与解释中的主观情感歪曲只有与重要性和含糊性的综合作用相称时才出现。

投射与希望性想法不是非限制性趋向，只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它们才起作用。人们会由于信任而增强其愿望，会辩解、投射并传播错误的谣言，条件是与主观含糊性及对个人重要性

相称。①

因此，谣言作为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是一种有限的现象，就像麦格雷戈实验中的希望性想法。只有当感觉到与自我有关，并且客观证据和知识不对判断与描述构成理性约束时，它才起作用。

在这方面，亦不难回忆起，许多谣言似乎表现出一种精神饥饿而不是情感需要。因为人们好奇并想知道，这样重要性的一个条件便建立了，但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且因为他们发现主题模棱两可，因此他们易受谣言影响。儿童讲述的有关他们对自然现象、意识、上帝的解释的奇特故事，便带有这种“好奇心”谣言的性质。神话与传奇故事虽然决不总是没有情感倾向，也似乎通常是科学的最初形式。简而言之，“追根究源”本身能构成引起谣言（或神话）传播的“重要性”因素。

谣言流传的间接原因

我们也不能完全这么认为：每个独立的传谣者都是被前面所述的动态模式激发起来的。在有些例子中，诱因也许非常特殊，与故事传播没有主题关系，例如，传谣者也许仅仅在寻求注意。“我知道一些你不知道的事”往往是儿童传谣的序曲。“知情”抬升了一个人的妄自尊大。当他讲述一则传言时，他觉得自己在听者面前居高临下。这种满足对于那些生活平淡无奇和心态不平衡的人可能很有吸引力。此外，传谣者发现自己能在一

① 熟习心理学上称为投射技巧的读者，会立即领会谣言与投射实验之间的相似性。这些实验基于模糊刺激。一团墨迹是无定形的，因此，它的意义由解释它的人来赋予。同样，只有在刺激图形能适合许多解释时，“主题触类旁通测验”才能引出很少隐瞒的个人故事。只有刺激图形高度模糊，实验对象才能按自己的需要来解释它。

些喜欢恶意诽谤的趣闻、喜欢死亡与灾难的恐怖故事的朋友中获得好感。他自己对谣言不感兴趣，但为了使朋友高兴便把谣言传给他们。

还有，某人也许会发现，通过重复他最近听到的东西，便于填平谈话中可能会出现的令人尴尬的沉默。那些无传谣情绪倾向的人，也许仍然会传播谣言。这种无意识的社会谈话本身并不是谣言或其形式存在的原因，但它使谣言得以通过传播链中的一个个“死结”。

在美国还与意大利交战时，发现某个贫穷的意、美社区中有25%的人定时收听“罗马电台”，并且将轴心国的宣传传递给其邻居，初看似乎这些人的爱国心大有问题，但其实原因非常简单。原来是那些收音机质量好，能收到意大利电台的人，在该社区便享有很高的威望。为了维持这种威望，他们煞费苦心地去听、将听到的内容传播给羡幕不已的邻居们，并由此感到自豪。

最后阶段的谣言

当公众期望一则重大事件出现时，谣言是最疯狂的，这种疯狂由于报社与电台对形势的报道而加强。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日，由于报社提前4天错误宣告而提前。1945年，在欧洲胜利日和对日战争胜利日时又发生了同类事件。在这些事例中，导致了不成熟的庆祝。除了可理解的新闻机构不愿措手不及和尽早把好消息带给公众的愿望之外，还有一条心理原因，即人们对重要预期消息具有“偷跑”趋向。

这里我们遇到了个人精神生活中，期望这个有强力的动态条件，当经过一段很长很长的等待后，只剩下最后一片就能拼好七巧板时，我们都去将其完成。我们就像那些穿过迷宫到达食物箱的动物，当它们接近试验迷宫的终点时会加快速度。像它

们一样,我们也有自己的"目标曲线"。当合众社在对日胜利日之前作如下报道时,即使受过良好的新闻收集训练的人也等不及了。

虚假的电讯引起过早的庆祝

星期日下午9点34分,合众社通过电传打字电报机发送:

电讯

华盛顿——日本接受同盟国的投降条件。

两分钟后,即9点36分又送出一则紧急提示。

电讯

编辑们:

停发那则电讯。

但是消息已通过电台广播,立即传遍了纽约的大街小巷。

许多电影院的经理们停止放电影,播出这则"消息",成千上万的人涌向街道,参加未准备充分的庆祝活动。

下午9点40分,合众社公布:

编辑们:

我们华盛顿分社说,他们没有在电报中发出刚才传播的电讯,我们正在调查起因。

此时无线电台已紧急宣告:那则报道是错误的。很显然所有广播都是以合众社电讯为依据的。

与此同时,合众社的电传电报仿佛瘫痪了。因为至少有20分钟没有传来一个字。

下午10点05分,合众社发出此电:

编辑们:

我们仍在核查华盛顿的电讯,但仍没能查到它的来源,我们将尽可能得到解释性的情况。

目标渐升谣言与我们所述的原则并不矛盾，而只是用一个特例来解释它们。预期的结尾对许多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官方消息被略为提前报道，这个事实加大了目前形势的含糊性（到底这件事到来没有？）。新闻收集者和新闻关心者都将注意力集中在预期的结尾上，只要一点点轻信就会认定并相信结局已经到来。

第三章 评述与回忆

按照定义，谣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制造出一则谣言至少需要两人参与。但是，在任何特定时刻，每个个体都是谣言的传播媒介，他在想什么是整个事情的关键。诚然，一条链大于其连接点数目的总和，但正是各个连接点组成了链子的要素和实体。因此，如果不对组成谣言链的一系列个体意识的典型运作作一仔细分析，我们就不能完全理解谣言。

评 述

虽然在战争之前，心理学家们很少注意谣言中的连续（多个体）复述，但是他们早就对谣言出现在个体中的基本模式——感觉－记忆－描述——感兴趣了。大约是五十年前，他们开始认真着手评述的研究，或者，用第一个德国调查者的话来说叫陈述。

评述——对“作为描述者的观察员”的研究，是许多心理学家很感兴趣的领域。正如惠普尔所说，描述来源于感知的过程，因此牵涉到感觉、注意和统觉（领悟）的整个心理学；它随记忆与回想而转移，因此牵涉到整个记忆心理学；因为它是以口头表述形式出现的，因此牵涉到语言与表达心理学；它取决于许多客观因素；性格倾向、情绪、猜测的敏感性等。

当时惠普尔写道，心理学家们发现自己被评述研究所吸引。

有人认为，因为这是惟一使他们感到，能运用到实践中去的高级心理过程的实用领域，它令他们能解释法庭与报社在忙乱中出现问题的原因。

比奈和斯特恩属于这方面的先行者。比奈致力于系统性的实验研究，而且是最早进行此类研究的人士之一。他是使用"图像测试法"的先驱，通过该方法可以研究出对图像化材料描述的精确度。他的资料也包括主观描述测验和口头素材记忆的测试。描述的能力包括在他的测试标准中，并构成斯坦福－比奈智力测验的一部分。

另一位系统化的研究者是威廉·斯特恩，他写的《陈述心理学》是评述领域中的经典之作。主要受斯特恩的影响，陈述得以沿着两条基本线发展——图像测试与真实性试验。在图像测试中，出示给实验对象一幅图像，他必须凭记忆尽可能准确地描述出来。为了使条件更逼真，真实性实验展现一些生动的事件，实验对象觉察不到他们目击的"事件"是经过仔细排练的。一个典型的"接近生活"的实验涉及下述事件：在一次科学研讨会期间，两名学生助手吵了起来，他们的争吵越来越激烈，直到其中的一个持枪威胁另一个。正在那时教授把双方分开，并要求目击者详细描述一下该事件。

在检验观察者描述能力的过程中，用了两种方式：(1)实验对象不用实验者帮助、引导或干扰而给出叙述或自由描述。这类描述的优点是不受建议的影响。但是，它不像第二类描述那样能彻底详细地探查对象的记忆力；(2)询问或盘问，它包括一系列准备好的问题，覆盖了有关刺激素材的所有细节和所有方面，当然，这种方式的主要缺点是假设的危险，目击者被"指引的问题"所提示，是在法庭上经常出现的。

斯特恩(1938年)发现，许多因素影响观察者的描述。最早的歪曲与疏漏似乎出现在对图像、事件本身的最初感知期间。

观察者倾向于抹掉对主旋律次要的细节，有许多细节他根本就视而不见。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描述越来越不准确，歪曲越来越严重，特别是目击者受盘问支配时。当允许他给出一个自主的描述时，他能在原始事件中挑选出细节，仅将记忆中出现的最清楚大概也是最准确的部分描述出来。然而，在盘问中，他被迫对记忆中并不清楚的部分作肯定性的描述，在这种条件下，他很容易被试验者问题的形式与暗示所引导。

斯特恩也发现，如果想得到适当准确的描述，要描述的事件应当单独存在于对象的意识中。如果他把景象与其他类似经历混淆，那么描述将是使人沮丧的混合物。斯特恩指出(这一点在谣言中有很大的重要性)："有无数人在他们的意识里，过去的事情很少有条理"。一些在特定时间里发生的事情与发生在其他时间里的事被混为一谈。任何想对他的童年记忆按时间顺序作一有序描述的人都能证实，出现在记忆的时间框架中的东西是模糊不清的。

斯特恩发现，评述尤其会歪曲刺激物中零散的、不熟悉的特征。要么它们被重新解释，以符合测试对象的习惯。要么它们的奇特性被大大地夸张并成为描述的中心特点。

在口头描述中，额外的曲解源也会起作用。测验对象的词汇量是有限的，他们用陈词滥调和口头对话表达其通常是不完整、无序的记忆画面。当使用语言时，能用比非口头回忆本身更明确的形式来回忆。语言塑造了我们的思维，必须讲出来才会明确。

斯特恩最后还发现，测试对象之间智力与口头表达习惯也明显影响描述。有的测试对象倾向于对其经历中互不关联的特征作一简单的列举；另外有的则胡诌一通，把原因与评价跟描述本身混为一谈。总的说来，男人和女人描述的准确性没有明显差别，但儿童则是如此不准确，如此易受暗示的影响(因为他们

的经历太少，没有形成条理），他们的描述中实际上没有什么自信。斯特恩对儿童评述不可信的论证，是德国修改其法律限制这类证词在法庭上出现的原因。

继斯特恩的研究之后，其他人又做了许多类似的研究。有的研究盘问的暗示性影响。有的研究不同的时间间隔对描述准确性的影响。还有人研究年龄和性别的影响。他们都发现目击描述有严重的缺陷，特别是在最初的感知期间或叙述过程中存在刺激时。感知、记忆与口头描述的一般缺陷本来就相当多，但是情绪状态更是大大地扩大这些欠缺。

感知、记忆、描述

评述的三个心理步骤是感知、记忆和描述。相同的三个步骤构成谣言传播。只不过在谣言传播中，这三个步骤是通过链中的每个环节无穷无尽地重复，而感知，除了第一个环节外，在其他环节中减少到成为纯粹的道听途说。

严格说来，这三个步骤是不能严格区分开来的。我们的感知已受我们记忆起的过去相关经历的影响，有时还受我们想要描述的内容影响。记忆取决于感知，但也取决于用什么语言来表达头脑中的情景。描述是前两个阶段的函数，但也受描述时的社会情境的函数影响。它的形式取决于我们可利用的词汇量及描述时的意图。

当这个复杂的过程本身展开时，从最初的感知进展到最终的描述，原始的感官印象，过去的记忆和情绪不可避免地混合在一起时，便会出现许多迷人的变化。有选择的忘记和主观歪曲不可避免地会改变外部世界几乎所有事情的含义。

这种结论主要是由巴特利特（1932 年）得出的，他的许多实验性方法使他接近谣言的基本现象。他从许多方面解释了记忆

的创造性特点。他证实，回忆并非像一条持续的单纯路径，像集中于感光胶片上的影像，当需要时可以复制。相反，记忆在感知后便立即开始变化。事实上，最初的感知本身并不是感官部件的简单组合，因为一开始它便混入了以前的相关经历。习惯、情绪、文化习俗都起作用，其中起最关键作用的是态度与期望。是它们使得回忆成为一种创造而不仅仅是意识的复制功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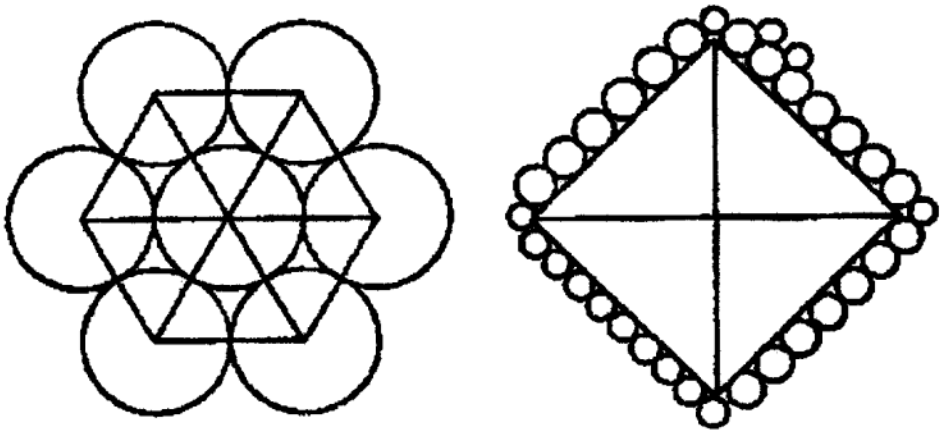
巴特利特的中心概念是“追根究源”（在前面我们已使用此概念）。用他的话来说，“把每种人类认识活动——感知、意象、思考、推理——称为追根究源是恰当的”。巴特利特请人们注意思维倾向于将所有经历重新形成简明的、有意义的、有用的类别，假如这些类别有时是稀奇古怪或不存在，它便不起作用。回忆必须适合人们用来调节其生活的“模式”。不管从“外界”观点看它是多么不真实，记忆总是个人努力从他的经验中得出简练的感觉。

巴特利特的大多数实验都是在剑桥心理学实验室的个体对象中进行的。每个对象都被出示一张图或阅读一则故事。在不同的时间间隔里，要求他们尽可能准确地复述其所见或所闻。有时只过几分钟便让他回忆，有时则隔几个月、甚至几年。

在所有例子中，巴特利特都发现有对素材的大量遗漏。细节被很大程度地忽略了，在回忆时任何图像或故事都有明显的倾向，倾向测试对象生活中所熟悉的东西，与他自己的文化相符，尤其是倾向对他有某些特殊情感意义的东西。在他们指定的结果中，测试对象会对其进行压缩或填充以取得一个较好的“格式塔”，一个更好的感觉闭合———一个更简单，更有意义的完整形态。

巴特利特发现详尽阐述（增加复杂性）相对来说要少。一般来说，人们宁愿将其记忆节略而不愿详尽阐述。后面我们将看到，这对谣言也适用。它们很少被人详细阐述，更多的情况

是，它们常常是原始事件大为简化的版本。但有一种例外，那就是当对某一特征的记忆变得特别清晰，会导致某个特征详细叙述，而造成其他特征消失。巴特利特给出了一个包含七个圆圈的几何图形作为解释的例子（图 1．圆圈变得清晰而其他图形消失）。



试验图形　　复述图形

图 1　圆在失去其他特性的情况下变得突出了

图 1 中的再现减少了三角形而增加了圆圈。根据回忆画出模拟图的测试对象对自己的尝试非常满意，但标明“应该有更多的圆圈”。

在他的故事描述实验中，巴特利特更接近了谣言问题。即使是同一个人，在相隔几天或几周后，复述相同的故事时，也会不断地丢失细节。最后讲述的总是短于最先讲述的，甚至几乎不可辨认了，最容易错的是名字、日期、数字。回忆中素材的变化似乎是不断地符合个人兴趣的过程，该过程在他最初感知时便已建立。他按照自己的爱好从故事中得到一个“笼统的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故事越来越接近他的先入之见（成见）。

巴特利特用一系列测试对象(依次复述)代替单个的人重复他的实验,在这里他正非常接近真正谣言的状态,只不过故事的依次复述是写与读出来的,而谣言则是通过说和听传递的。重要的结果是在个人记忆衰退中都发现有同类变化出现,只是程度加大加快,那些在一定范围内对个人起作用的限制(因为,毕竟他看到了最初的对象),在连续传播中不起作用。

个体与群体记忆

个人记忆的过程与"群体记忆"的过程在大多数方面是相同的。两者都存在相同的歪曲模式,所以这也不令人惊奇。因为"群体记忆"是连续的个体意识处理同一基本的素材内容。

假如提出一个问题:"个体记忆与群体记忆哪个更准确?"答案大致会选择个体记忆。在一定程度上,原始感知使个人描述的变化限制在一定范围内。通常,借助于想像和口头表达,他会保持原始感知的基本形态,同样也会在描述与报告的时间间隔中作一定的复述。而群体记忆,则没有类似的精神支柱。一个新的听众没有可以用来验证其感知的保留印象,同时,他不大可能考虑他听到的一些细节,他除了接受其表面印象,别无选择。

然而,如果一个个体感知出错,并且继续重复和强化其错误,那么个体记忆也许就没那么准确。如果错误与经受者的突出兴趣、过去的习惯或偏见一致时,这类歪曲便尤其严重。当然,同样的危险也存在于群体记忆中,特别是当群体具有相同特征,有相同的偏见和成见时。但通常的情况是,通过从个体到个体的转移。故事便避免了过于适应某个个体的兴趣,最终的结果也许会更准确。

群体记忆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们通常变得高度惯例化。因为涉及到许多个体;显露的含义常常是群体共同关心的。一

个调查对象的癖好易于被下一个人忽略，这样故事便被精简，只剩下一个使所有人都能理解的核心。因此谣言通常比个体记忆更标准化，更同化。有更多的共性。同样的原因，它们更易获得一种文化上的道德风气特征。

第四章 一种实验方法

在可能的情况下，心理学家也和其他科学家一样，愿意在一个实验限定与控制的条件下研究一个问题。他们想揭示，当某些已知的影响在起作用时，会发生什么基本变化。如果可能，他们也愿意系统地改变这些影响，以便发现每种因素对问题中的现象所起的作用。但是许多精神现象都抵制实验的方法，例如，我们怎样对诸如恋爱，神秘经历，收到一份意想不到的遗产后的激动这类共同现象；对悲痛或对激怒等做系统的实验呢？

对于谣言，事情又是怎样的呢？研究者们也许会拟定一则谣言并沿着它的多条传播链进行跟踪，不仅揭示谣言的各种连续的描述，而且全面而彻底地分析每个谣言传播者感兴趣的方式和思想脉搏。虽然第一步，即在我们周围的社会环境中播下谣言是很容易的事，但要仔细跟踪它的传播轨迹却不可能。我们的最佳做法是，当我们发出的谣言绕回我们身边时，捡起后来的随机说法。

在期待日本投降的紧张时期，当谣言传播的条件达到最佳状态时，华盛顿的一个年轻人进行了这样一项未完成的实验。故事由约翰·C. 梅特卡夫提供，刊登在《纽约先驱论坛报》(1945年8月18日)上。

蓄意播下的谣言

也许是最荒唐错误的谣言——“死亡光顾日本”——产生于一篇蓄意播下的报道中，这则报道是华盛顿的两个记

者编造的，六小时之内带着圣迭戈海军处的极度惊恐传回。

这则虚假的谣言在正式投降之前两个晚上的午夜时分于华盛顿一家夜总会中正式产生，它是建立在希特勒理论——“谎撒得越大越有人相信”——的基础上的。

“只是为检验一下这条理论而开个玩笑”，一名记者后来说，“我们虚构的故事如此荒唐，它甚至超出了我们自己的想像”。

该故事说，日本裕仁天皇在一支全副武装的神风飞行中队的陪同下，飞往关岛和“太平洋与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以及舰队海军上将切斯特·W.尼米兹会面。故事继续说，这两名美国官员与天皇一同上了一架美国大型运输机，在一支强有力的轰炸中队的陪同下，飞往华盛顿。这则不可思议的故事的高潮是：天皇正在去白宫签署投降协议，出席的有杜鲁门总统，内阁与美国陆海军司令。

撒下这则错误的谣言，希望取得令人震惊的效果，一名记者打电话给一名他认为肯定会传播该谣言的海军部的一位官员，然后便回家等待预料的结果。

不久便有了反应，但即使记者们也对随后所发生的一切感到惊奇。

六小时之后，另外一家报社的一名女记者打电话给两名谣言编造者中的一个，并以极担忧的心态吐露，她刚接到驻圣迭戈身为海军官员的丈夫打来的电话。接着便上气不接下气地重复叙述他所散布的谣言。

关于正式投降的说法，这则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可能传播到什么样的偏远地区，留给人们去猜测吧，但错误的谣言很快便愉快地传到白宫。

其他一些传言还编造说，裕仁天皇已飞往莫斯科去克

里姆林宫签订投降书；有的说日本已经发现了原子弹的秘密，正在拖延时间准备用原子弹给美国海军一个出其不意的反击；有的说天皇已到达旧金山，将对美国人民广播；还有的说尼米兹上将和其他一些海军高级官员，正在东京附近的一个秘密会堂与日本谈判。

后来，又有许多关于在华盛顿、伯尔尼与东京传递信息的错误谣言；还有的说美日在关岛、在冲绳、在马尼拉、在珍珠港举行秘密会议。其中最为极端的，是全国顷刻间都对美联社发出的一则捏造有关投降的电讯信以为真。有官员说，此通讯是由一名恶作剧者虚构的，目前联邦调查局及五六家其他政府与私人侦查机构正在调查此人的身份。

从这则报道的表面价值来看，我们首先注意的是谣言传播的速度，特别是在紧张的期待中；我们也对最后阶段或"目标梯度"现象感到惊奇，即离希望兑现似乎越近，期望性的谣言便越容易传播。在报道中我们也注意到，当不确定性和重要性达到最大值时，谣言有着惊奇的繁殖力。

播下这则故事的恶作剧者确实进行了一次有关谣言的实验（一个未完成的不严谨的实验），但结果却没告诉我们任何有关链中的连续环节的情况，或有关原始故事经历的特殊歪曲，也许我们可以将实验转到心理实验室来进行，从而改进那位恶作剧者的方法。

实验室方法

谣言实验室方法源于前一章中描述的有关记忆与描述的研究工作，这些实验的基本程序是使实验对象面临同一种标准情境，他以后的复述能与之比较。他的连续描述的变化过程被记

录下来。这种基本程序能派生出许多方式，其中的一些方式在前一章已经描述过。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描述试验的最重要的变化形式是使描述通过单独的个体传递，称为“连续复述方式”。这样做使我们能够揭示谣言传播中的社会因素。

我们承认，实验室控制能够成功，但都过于简单，由于使连续复述在人为的环境下进行，我们牺牲了谣言情境的自发性与自然性。我们发现实验性谣言的“传播”不是依赖于通常支持谣言传播的诱因，而是依赖于实验对象与实验者合作的愿望。在实验情境中，仇视、恐惧和自我满足的表达受到限制，说者与听者之间人际友好关系的影响（例如，通常存在于谣言传播中的特殊关系）也消失了。在实验室外，讲述者往往为了听者的利益给他的故事增加点色彩（悲哀的表情、幽默或激动），而在实验室，气氛使描述小心而精确。讲述者感到他的准确性声望处在关键时刻，所以尽最大努力在描述时准确地转述他所听到的一切。当用学生作实验对象时，学校那种强调准确观察与精确描述的氛围，使连续描述远比实际上的谣言缺乏色彩，更为客观。

真实生活中的谣言与我们在实验室研究的那些谣言之间还有其他区别。在平常生活中，听者能与讲述者聊天，如果他愿意，还可以提问打岔（虽然，事实上他很少会这么做）；而在实验中，听者不会使用这种有疑问的辅助手段。在真实情境中，听到一则谣言与转述一则谣言之间也许有几天，几星期甚或几个月的时间间隔；而实验中一般是听完后立即描述。还有，为了使程序统一，实验者通常要求听者尽可能准确地描述；而在平时的谣言传播中，身边并没有严格的检查者去证明传闻是否正确地重复了。最重要的，上面已经提到，是刺激的条件极不同，在实验中，实验对象力争准确，他本身的恐惧、仇恨、希望却没有激发起来。他并不是平常生活中那个自发的谣言中介。

必须注意到，几乎所有这些不同条件都可能增加实验情境

中描述的准确性，并产生比真实生活中的谣言少得多的歪曲与猜测。但尽管有这些限制条件，实验室实验仍然在推导谣言传播的基本现象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屋内”谣言也许不如“屋外”谣言生动，没那么绘声绘色，没那么极端，但它们的心理机制是相同的。

标准程序

从一个大学的班级或专门讨论的观众中挑选出一组人——一般为六或七人。请他们离开房间，一般情况下并不告诉他们，是作关于谣言的实验（虽然对此略有所知也没有什么害处，因为研究表明：曲解的出现虽受其影响，但影响甚微）。他们只是被告知：当他们返回房间后，要仔细听将要听到的内容并“尽可能准确地”将听到的内容复述出来。

当实验对象离开房间时，屏幕上出现描写一些详细情境的幻灯片，一部分观众的任务是（一边看一边）向第一个实验对象描述其所见。他的描述中要求包含有约二十个细节。①

对画面进行初次描述后，实验对象中的一员被叫回房间，并把他安排在一个看不到投射屏幕的位置，但房间里的其他人能看到。（如果房间没有凹室，或其他建筑部位也不能在实验对象进门的地方提供屏蔽点，那么应该在实验开始前，在适当的地方设置一些可移动屏风。）

---

① 对于特定实验的还有一种程序。实验者本人可对实验对象朗读一段标准的场景描述。通过这种方法，每次实验的开端是用同一方式阐述的，而由许多观众作的原始描述则大不相同。

使用何种方式似乎没什么不同，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画面本身都是比较的标准，通过允许第一次口头描述各不相同，我们可将其称之为“初次复述”，并证明感知是多么有选择性，多么不准确，即使它是由现场目击者描述的。

由选定的一名观众或实验者将“目击”描述讲给第一位实验对象听。

然后把第二位实验对象叫进房间，他的位置紧挨着第一位实验对象，两人都看不到屏幕，然后，第一位实验对象将其听到的有关情景（观众仍能从屏幕上看到）尽可能准确地复述一遍。然后，第一位实验对象再坐到能观察到实验手段的位置上。

第三位实验对象再挨着第二位坐下，并听他描述。

程序以相同的方式继续进行，直至最后一位实验对象复述他听到的故事。并坐下（通常在笑声中）将其最后复述与屏幕上的原版对照。在不同的实验中，每幅画面都有一系列“最终描述”，准确记录了最后一位实验对象所说画面包含的内容，通过将这些最终描述与原始画面相比较，我们会看到，即使只有六七个人的口头传播，也会产生多么大的歪曲，丢失多少细节。

在三十多个实验中（实验结果我们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讲述），许多小组使用了这样的标准程序。这些小组成员包括大学生、正在军训的新兵、社区讨论会的成员、军队医院中的病人、教师圆桌会的成员、正在受训的警官，除这些成人实验对象外，还选择了一所私立学校的孩子们作实验对象。从五年级到九年级每个年级的学生都有。

应当指出的是，大多数实验是在有许多观众在场的情况下进行的（20 至 300 名观众），实验对象的描述是在有同学或战友在场的情况下作出的。他们的社会、经济或专业兴趣都差不多。没有怯场迹象。也许因为这些小组成员属于同一类型，还因为志愿者是排除了那些明显易受自我意识支配的人。但是，很显然，一些社会影响还是在起作用。在有观众的情况下得到的最终实验报告比实验对象只对实验者描述的要短，总的来说更不准确。

在研究社会影响时普遍发现，当人们觉得自己处于被观察

状态，就会更加小心和保守。

为了弄明白观众的影响，我们做了一些比较性的实验。在场的除了实验者没有别的观察者。基本报告清楚地显示：观众在场使得描述更简短——这是保守与谨慎的产物。描述者倾向于谨慎，只讲述他认为准确的那些内容。与此同时，由观众诱发出的注意力分散与自我意识也容易减少描述时的准确性——即使它同时造就了不详尽性。

确实，日常生活中的谣言传播很少有观众的检验，但即使没有观众准确性会大一点，但我们目前感兴趣的研究主题——谣言歪曲的性质与过程，在两种条件下没多大差别。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实验都在有一名观众的情况下进行呢？因为他们是谣言心理学对各类观众的有价值的、生动的展示。实验揭示了谣言过程的本质特征，保证了既不使讲课者失望，也不让观众失望。

一个简单的实验需要大约十五分钟。它给一堂有关评述或谣言主题的讲课或讨论做了一个极好的前奏。

第五章 实验结果:省略与突出

当谣言传播时,它的趋势是变短、变简洁,越来越易被理解与讲述。我们的实验表明:包含有二十或更多细节的原始描述,是怎样在最终描述时惊人地简化到平均只有约五个细节。

在整个实验中,细节的数量在一系列复述的最初便大量减少。数量继续减少,但速度越来越慢。图 2 显示了多次连续复述中所保存细节的百分比。

该曲线以十一次实验为基础,显示了在五六次口头传播的过程中,即使在没有什么时间间隔的情况下,也有约 70% 的细节被忽略,丢失率保持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早期复述中细节丢失的百分比比较大。

高速省略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下述事实:即连续描述中依次的描述者,未看到最初的素材。他们也没有时间进行"心理复述",那会使他们把更完整的描述传递给下一位听者。省略的速度部分归因于实验设计中观众的影响,意识到有许多苛刻的听众(他们面前总有原始的画面),描述者觉得自己的准确性受到测试,他会尽量省略他搞不确切的内容,以避免错误。

比较下面的实验报告 A(在有观众的情况下取得)与实验报告 B(没有观众的情况下取得)。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观众影响的程度,两份实验报告都是在一幅法国人战斗场景画面的基础上取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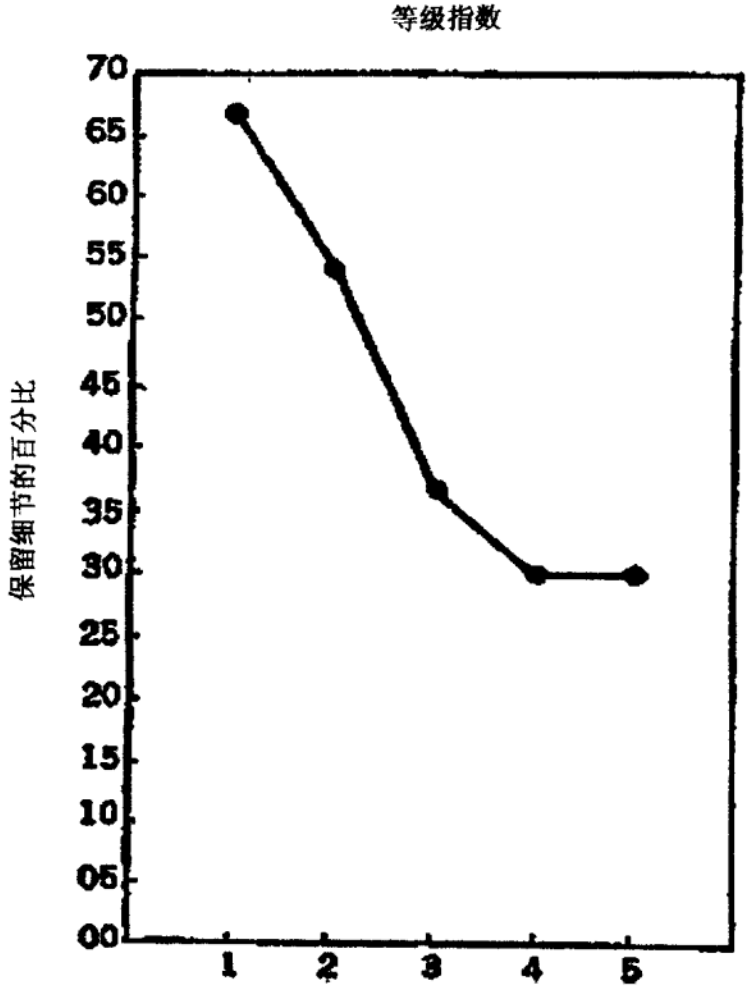


图 2 连续复述中保留细节的百分比

实验报告 A

（有观众）

场景描述：图上有四个男人，一个站着，一个跪着。左角有一座教堂，教堂下面有一路标，标示着两个方向。四个男人当中有一个是位于画面中央的黑人，他下面是一个手持步枪的跪着的男人。右边是一辆红十字会大篷车，那个黑人站在一面墙上，左手拿着一枚手榴弹。教堂的尖顶的左上方有一架飞机。有一

个黑人站在一面石头砌的墙上，右侧一辆红十字会卡车旁边有两个人。一个男人将头靠在墙上，还有一个男人用望远镜朝教堂望，他旁边似乎有一堆加农炮弹丸。

复述 1：屏幕上有一幅图，图上有四个男人，有一个是黑人，站在大石墙上，手里拿着一枚手榴弹，在一辆红十字会大篷车旁边有两个男人，图右侧有一座教堂，其尖顶上面有一个十字架，钟上显示的时间是两点差十分，教堂边有一个路标，天空中有一架飞机。

复述 2：有四个有色人种男人，其中之一手拿一枚手榴弹，右边有一座教堂，尖顶上有一个十字架，钟上指示两点差十分，还有一个路标。

复述 3：有四个有色人种男人在工作，其中一个手拿一枚手榴弹，有一教堂尖顶，上面有一个十字架，时间是两点过十分，路边还有路碑。

复述 4：有四个黑人在工作，其中一人拿着一枚手榴弹，有一座教堂，其尖顶上有个十字架，时间是两点过十分，路旁有指示牌。

复述 5：有四个黑人在工作，有一座带有尖顶与钟的教堂，时间是两点差十分。

复述 6：有一个教堂尖顶，四个黑人在工作，教堂有一座钟，时间是两点差十分。

实验报告 B

（没有观众）

场景描述：有一幅战斗场面。前景是一群战士，其中有一人正在用望远镜朝背景中的教堂看。一名战士正朝右边开枪，一名黑人站在墙头扔手榴弹，墙头上，士兵在射击，那名黑人正对从教堂后反击的敌军作手势，右边的背景是一辆红十字会的救护车。两名男子在往前跑，右前景一名男子痛苦地躺着，靠近敌

人的地方另一名男子已死了。这是在法国，一块路牌上标着：往左距离瑟堡 50.5 公里，往右距巴黎 20.5 公里。他们射击依托的墙是一家商店的一部分。商店的一个标牌上写着“面包与酒”。天空中，飞机在射击，往下扔炸弹。机壳在燃烧，在乡下有毁坏的房屋，一座教堂和折断的树，教堂的尖顶上有一面钟，指示两点差十分，背景上的敌人穿着黑色军装，似乎是德国人，前景中拿望远镜的男人是一名少尉，带着一枚肩章。

复述 1：很显然这是一幅战斗场面。前景是三名男子，其中一名是少尉，肩上有肩章，他正通过望远镜看位于左背景上的敌人。另一人躺在他旁边，从一家旧商店的废墟墙向另一边射击。一块牌上写着“面包与酒”。背景中是一座教堂，教堂前敌人在战斗，穿着黑色军装，教堂尖顶上的钟表明时间是两点差十分。四周是毁坏的房屋，飞机在天空飞，扔着炸弹。背景中是一辆红十字会救护车，两名男子正从里面跑出来，右前景一名男子痛苦地躺在地上。另一名男子躺在敌人前面，我不知道他的确切位置。我想是在画面中间，有一名黑人站在墙头朝敌人打手势，示意人们攻击敌人。

复述 2：一幅战斗场面，一名肩上有肩章的、大约是中尉的男子在指挥战斗，他位于左前景中，另一名战士趴在地上朝背景上的敌人射击。这位战士伏在上面射击的石墙，仿佛是某家商店的残垣断壁。这商店可能是家小饭店，因为有块标牌写着“Pain et Vin”意思是面包与酒。图的另一侧有一座教堂和一尖顶，钟上指示为两点差十分。那边有一辆救护车和从它里面跑出来的两个男人。在毁坏的建筑中是一场大屠杀。一切都被击倒了。图上有一名黑人，他可能正在鼓励人们战斗。

复述 3：这是一幅战斗场面，场面是废墟的一部分，显然是一个遭受严重射击的村庄，左前景是一名中尉在负责战斗。有一位战士趴在地上，依托一家饭店的的残垣断壁射击。有一教

堂尖顶，上面的钟指示为两点差十分。还有一辆救护车，两名小伙子从里面跑出来，远处是敌人前景的某个地方，有一些小伙子，其中一名是中尉，因为你可以看到他肩上的肩章。图上的一名黑人正在鼓励人们战斗。

复述 4：这是一幅被严重毁坏的市镇画面——一幅战争场面。左前景是一名中尉，我们知道他是中尉是因为他军装上的肩章，中尉下方一名战士正依托一堵墙射击。我忘了他朝什么射击了，很显然是敌人，他射击依托的建筑是法国一家饭店的残迹，牌子上写着什么面包与酒。图上的某处有一名黑人，可能在中间，他在激励人们去战斗，在右背景远处有一面钟，上面标着两点差十分。

复述 5：这是一幅被战争毁坏的市镇画面，毁坏相当严重。左下角有一名中尉，说他是中尉，因为他带着肩章。他下面有一名战士卧倒在地射击。他是靠着一堵什么墙射击，这面墙可能是一家法国饭店的，因为上面写着什么面包与酒。中前景是一个有色人种士兵发命令，右上角，一面钟指示两点差十分。

由于被观众分散了注意力，并意识到观众在注意他们的错误，所以在实验报告 A 中，实验对象的描述更简短、更仓促、更“安全”，实验报告 B 中的实验对象因没有观众，描述得更好。但是，虽然有观众省略的速度加快了，但现象本身是相同的。

省略的限度

省略决不会无休止地进行到灭迹的程度。图 2 中曲线最后部分的稳定性是发现的某些结果。它表明：(1)简明的描述易于被如实地复述；(2)当描述变短后，可供实验对象选择的细节变少了，进一步歪曲的可能性也因此减少；(3)任务变得很容易，以

至于用常规记忆法，就能记住那些素材。在所有例子中，最终的和临近最终的描述比前面任意两次描述的内容都要更相仿。

例如，在实验报告C（一幅街道场景画面）中，持续性的老一套类型得到论证，虽然最终描述（第六次）与第五次描述相比，显示了一些另外的省略与一些发明。

实验报告C

（说明不断增加的生搬硬套影响）

场景描述：该情景是在地铁或火车上，车厢里有八个人，左侧有一名男子在看报纸，挨着他的是位上了年纪的女士，她右手拿着一个购物袋，远一点的座位上有一名妇女抱着一个婴儿，还有一个蓄络腮胡子的上了年纪的男子，另一名胖男人在打瞌睡，一名黑人和一名白人站在车厢里，那名黑人衣着普通——穿着佐特套服，那白人是一名国防工人。他们正在争论，白人手里拿着剃须刀，车厢里有四则广告：一则是“好运牌香烟”；一则是“小鹅牌香皂99.44/100%纯度”，上面有一只鹅；一则说“请到闲云野鹤营来度假，舒适的旅馆，负责的委托人”，还有一则是“选举麦金尼斯为市政委员会委员”。

复述1：这是一幅地铁或火车上的情景，上面有七个成人一个小孩。座位上坐着一位抱小孩的妇女和一名上年纪的胖乎乎的男子，他在打瞌睡。一名有色人种男子穿着一身佐特套服，他正和一名白人男子争论。那白人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有四幅广告，一是“好运牌香烟”，一则是关于某种肥皂的。还有一幅是有关某家旅馆的。

复述2：这是一节有七个成人在内的地铁车厢。有一名上了年纪的妇女，膝上抱着一个孩子。有人在争论，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车厢里有四名有色人种，有四则广告，其中一则标着“好运牌香烟”。

复述3：这好像是一辆有轨电车，上面有七名成人，有一名

上了年纪的妇女,膝上抱着一个小孩。有人在争吵,手里拿着一把剃须刀。车上有四个有色人种,有四幅广告。一则标着"好运牌香烟"。

复述4:这幅图说的是一辆有轨电车,上面有七个人,有四名有色人种。一位女士带着小孩。有人在挥动剃须刀,还有一些广告牌。

复述5:这是一辆载有七名乘客的有轨电车。有一名带小孩的妇女。有人在挥动剃须刀,有一些广告牌和一些有色人种。

复述6:图上是有七个乘客的有轨电车。有一名带小孩的妇女,有一些有色人种,有人在挥动剃须刀。

看来实验对象倾向于依赖生搬硬套的记忆。在"尽可能准确地复述听到的"指示下,死记硬背提供了最安全最可靠的完成任务的方式。无疑,在我们的实验中,对死记硬背的依赖比在平时谣言传播中更明显。因为在后者那里,准确性不是目的。时间间隔影响了死记硬背,而且强烈的兴趣防止了刻板的记忆。但在两种特殊条件下,生搬硬套也会在平常谣言传播中起作用。如果某个人不是被强烈的想法激发,只不过是为了和别人谈话时,他会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地用他听到的形式重复最近听到的故事。或者,如果一则谣言变得如此简明扼要、如此标语化,以至于不需要任何努力就能以听到它时的刻板形式记住时,生搬硬套的记忆似乎就在起作用了。

省略并不意味着对细节的任意忽略,有些细节比其他细节更易受到影响。在那些尤其易于省略的内容中,巴特利特列出了专有名称与头衔。专有名称(除了众所周知的外)对实验对象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与兴趣。它们在他"穷根究源"的过程中没有帮助,因此就被忽略了。在说明名字是一则故事中最不稳定的因素、最易省略方面,我们的结果与巴特利特的结果是一致的。

事实上,在我们所有的实验中,人名和地名不是被省掉了,就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了。读者在我们所有的实验报告中会察觉到这种作用。

虽然迅速、彻底省略名字是一个惯例,但也有例外,如果实验对象的兴趣或训练他们特别注意名字,那么这些名字在整套复述中会保留下来。实验报告 D(法国人战斗场景的画面)是从一组"陆军特种训练计划(ASTP)"学生处得来的,应当注意到,在整套描述中,虽然许多其他细节被省掉了,但出现在路标上的城市名称和它们离战斗场景的距离却一直保留下来了。在军队中,地理方面的数据——地点的名称与距离——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生存也许取决于对地理数据的正确描述。但即使是这种专业性的依靠也阻止不了距离变得模糊不清,错误百出。

实验报告 D

(说明军事兴趣对保留物的影响)

场景描述:该场面发生在战时的法国。可以看到七名穿军装的人。两人在射击,其中一人躺着,受了伤,膝上缠着绷带。一名黑人士兵站在那里,正准备扔手榴弹,在他们的后面,有一座被毁的有一个门的建筑物,十字路口有一块路标上写"瑟堡 21 公里,巴黎 50 公里",还有一块牌上写着"面包与酒"一幢毁坏的建筑边有榴弹,建筑物后边有一座顶上有个大洞的教堂,教堂有尖顶,上面有一面钟,显示时间为两点差十分。可以看到教堂后有两架飞机,可看到爆炸的情景。在很靠右的地方有一辆救护车,两名男子拿着担架从里面出来。牌子:"面包与酒"。

复述 1:该情景是在法国。战壕里有两名士兵。他们旁边是一名受伤的士兵。附近是一所被毁的房子。一名黑人士兵正在投手榴弹,一块路牌上写着"距瑟堡 50 英里,离巴黎 21 英里"。有一座带尖顶的教堂,显示时间是两点差十分。燃烧的弹壳表明战斗正在继续。图上某处有一辆救护车,有一块牌子写

着“面包与酒”。

复述 2:场面是在法国,有一战壕,里面有两人,一个在射击,一名战士躺着,受了伤。有一块路牌——“巴黎 50 英里,瑟堡 21 英里”。图上有一辆救护车,一个正在扔手榴弹的黑人士兵后面有一所房子或者一个大车棚。房子后是一座教堂,尖顶上时间显示为两点差十分,教堂后有一些飞机。

复述 3:情景在法国,有两名士兵在战壕里,还有一名伤兵,图上有一辆救护车,背景中有一所房子,还有一座带尖顶的教堂。时间是……我记不得了,有一块路标:“瑟堡 21 英里,巴黎 50 英里”,图上有一名黑人士兵。

复述 4:场面发生在法国。离瑟堡 21 英里,离巴黎 50 英里。这信息是一块路牌给出的。图上有两名士兵,还有一名黑人士兵。远处有一教堂,还有一所房子,附近有一辆救护车。

复述 5:场面是在法国,离瑟堡 21 英里,距离巴黎 50 英里。我们可以在路标上看到。图上有一名黑人士兵,附近有一座教堂,还有一辆救护车。

复述 6:场景在法国,离瑟堡 21 英里,距巴黎 50 英里,这是路标上显示的。图上有一名黑人士兵。附近有一辆救护车和一座教堂。

复述 7:场景在法国,离瑟堡 21 英里,距巴黎 50 英里,画面上有一名黑人士兵,还有一辆救护车。

复述 8:场面在法国,离瑟堡 50 英里,距巴黎有很远。画面上有一辆救护车,还有一名黑人士兵。

在这份特殊的实验报告中,第三位实验对象忘了显示在教堂尖顶钟上的准确时间,显然又不愿意随便猜测,而在其他有新兵的实验中,显示在教堂钟上的准确时间一般都在连续描述中如实地复述了。时间与地点对军事职业有着优先的价值。

读者也许已经注意到了，当报告的句子变得简短，那些没有省略掉的内容，虽然就相对地更突出，更清晰了。

突　出

突出可以定义为：从一个较大的篇幅中对一定数量的细节有选择性地感知、保留和描述。它是省略的互补现象，一方与另一方同时存在。虽然在多份实验报告中都出现了突出，但并不总是突出相同的内容。在一份实验报告中得到突出的内容，在另一实验报告中也许被省略。例如，请注意在地铁场景画面中的选举广告标牌出现了什么情况。在许多实验报告中，从第一次描述后就没有提到该广告牌。但在下述实验报告中"麦金尼斯当选市政委员会委员"（四广告中之一）不仅得到保留，而且麦金尼斯先生得到了一个议会候选人的位置。

实验报告 E

（说明突出）

场景描述：这是一幅地铁停在戴克曼街的画面。显然是街道快车。它显示了有五个坐着和两个站着乘客的火车车厢，车窗上方有常见的广告牌。其一是有关某种烟的；其一是一幅肥皂广告，另一幅是关于某种野营的，还有一幅是关于某个麦金尼斯竞选市政委员会委员的政治性广告。坐着的是一个头戴帽子，手拿报纸的男人。他的样子很滑稽，胖胖的，正专注地看报，挨着他坐着的是一名右臂提购物袋的妇女，戴着眼镜和一顶圆帽。还有一些空座位，座位前面是一名黑人，穿着佐特服，头戴馅饼式男帽，扎一根花哨的领带。他正和一名国防工人交谈。那工人衣着破旧：工装裤，高统靴，无袖汗衫和帽子，他似乎是个造船厂的工人。左手拿着一把剃须刀，显然正跟那黑人在争论。接下来坐着的是一名抱小孩的妇女，正看着两个男人争论，她衣

着普通，长头发。她旁边坐着的是一名穿斗篷的男子，是一名犹太拉比，正在看书，戴着古怪的帽子，他穿一件长大衣，不时髦，他旁边坐着一名胖男子，在打瞌睡，扣着双手。

复述 1：图上是一列地铁，停在戴克曼街。它显示了地铁车厢内的情景，约有五人坐着，两人站着，有一些普通的广告，一是关于烟的；二是关于一名政治候选人麦金尼斯的。坐着的有一名正专心看报的胖男子，旁边是一名妇女。然后是一个空座，然后是一名穿佐特服的黑人与一名拿剃须刀的国防工人在争论。好像还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然后是一名抱孩子的妇女，接下来是一名像是犹太拉比的男人和一名打瞌睡的胖男人，两个男人站着；一名胖妇女在看着他们。

复述 2：该情景是在一辆停在戴克曼街的地铁里。这是车厢的内部，有五人坐着，两人站着。有一些普通的广告，一是关于烟的；一是关于一名叫麦金尼斯竞选的。坐着的有一名正专心看报的胖男子，一名妇女。然后是一个空座，然后是一名黑人与一名国防工人。黑人穿着佐特服，其中有一人手拿剃须刀。他们正站着激烈地争论。还有一名妇女和一名儿童和另一个男人。

复述 3：这是一幅戴克曼街汽车里的情景。车厢里有七个人，五人坐着，两人站着。在广告中有一幅是关于一名叫麦金尼斯的人选举的。站着的是一名胖男人和一名抱孩子的妇女。坐着的是两个男人，然后是一个空座，接下来是一名妇女和两名在争论的国防工人。其中有一人是穿佐特服，手拿剃须刀的有色人种。争论非常激烈。

复述 4：情景是在地铁里。五人坐着，两人站着。车厢顶部是一溜广告。其中有一则是关于麦金尼斯竞选议会议员的。有一名男人和一名妇女坐着，还有两名国防工人。其中一人是穿佐特服的黑人，正挥动着剃须刀。一名抱孩子的妇女站在那儿。

还有一名胖男人站着。

复述5:情景是在地铁车厢里。五人坐着,两人站着。车厢里有广告,其中一幅是关于麦金尼斯入选议会的。车厢前面有一名男人,一名妇女和两名国防工人,其中一名是手持剃须刀的黑人,正在生气地挥动着剃须刀。有一人站着,是一名抱孩子的妇女。站着的一名男人是一个胖子。

复述6:这是一幅典型的地铁情景图。图上三人站着。地铁有一般的特征。有一些广告,其中之一是关于麦金尼斯竞选的。坐着的是一名男人和一名妇女。另两名男人,其一是黑人,正在争议将举行的选举。黑人正挥动着剃须刀。在另一个地方站着一名抱孩子的妇女。你在地铁里也可以看到这些。

突出经常抓住奇特的、重复的话,它们最早出现在系列描述中。吸引听者的注意,对其的传播常优先于其他事实上对故事更重要的细节。这种作用的例子在实验报告F(街道场景画面)中可以看到,注意第一次复述中"有一个男孩在偷东西,一名男子在告诫他"的描述。该句在整个系列复述中被一字不漏地传递下来。"告诫"这一近乎文学的词在某种程度上吸引了后续听者的注意力,因此原封不动地传播下来了。

实验报告F

(通过措辞的保留说明突出)

场景描述:这是一幅街角图,是16号大道与巴特利特街的拐角。前景有一辆装水果的手推车。有一个男孩似乎想从车上偷点水果。车主正与他谈论拿水果的事。有一名黑人警察从街上走来,一名黑人男孩绕着街角走。一家商店上有一块牌子:"利维父子男子服饰用品店"。背景上有一座房子,上面写着"仓储批发店",及"此处禁止玩球"。在另一角上有一座建筑,好像是一家剧院,"洛氏剧院";一幅关于吉恩·奥特里主演电影的广

告。有一家医务所，有一块牌子，“安东尼·史密斯医学博士”。一扇窗户中有一个花盆正往下掉。有一家商店从6月25日进行削价销售。出售的衣服价格从6.25美元起价。图上有两只动物：一只从垃圾桶里寻食的猫和一条狗。前景上有一个消防栓。在一扇窗户上有一面军旗，上面有一颗星。

复述1：这是一幅街景，前景中有一辆装水果的手推车，一个小男孩正从里面偷东西，一名男子在告诫他。这事发生在16号街与林荫道街的拐角处。街上走来一名黑人警察和一位小男孩。画面上有一家取名“利维”的男子服饰用品店。背景上还有一处标明“仓储批发店”的地方，一家医务所——安东尼·史密斯医学博士。从一扇窗户中有一个花盆正往下掉。还有一家剧院——洛氏剧院，给吉恩·奥特里主演的某部电影作广告。图上还有一条狗和一只猫。

复述2：这是一幅街景。前景中有一辆装蔬菜的手推车。一个小男孩正从里面偷东西。一名男子在告诫他。这事发生在16号大街与林荫大道街的交会处。图上有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名称是“利维”。背景上还有一家仓储批发店。还有一家医务所——安东尼·史密斯医学博士。一只花盆正从一扇窗户往外掉。也有一家电影院：“洛氏电影院”，上演吉恩·奥特里主演的影片。街上有一条狗和一只猫。

复述3：这是一幅街景。前景是一辆装水果的手推车。有一名儿童在偷，一名男子在告诫他。背景中有一家商店，“利维”男子服饰用品店。和一家电影院——洛氏电影院，正上演一个名叫吉恩·奥里奇的演员主演的电影。有一家叫史密斯医学博士的医务所。有一条街上走来一名警察和一名有色人种男人或一名有色人种警察。——叙说者没说清楚。还有一条狗和一只猫。

复述4：一幅街景。有一辆手推车。一名儿童在偷水果，一

名男子在告诫他。有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和一家电影院。电影里有一名叫吉恩·奥里奇的演员。还有一家医务所，名字叫史密斯还是什么。

复述5：此图代表了一幅街景。上面有一辆装水果的手推车。一名小男孩从里面偷水果，一名男子在告诫他。街上有一家男子服饰用品店和一家电影院。演员叫吉恩·奥里奇。还有一家医务所，名字似乎叫史密斯。

复述6：这代表了一幅街景。上面有一辆装水果的手推车；一个男孩在偷水果，一名男子在告诫他。背景有一家医务所，医生的名字叫史密斯。还有另一家办公室。

复述7：我被告知一幅街景。上面有一辆装水果的手推车；一个男孩在偷水果，一名男子在告诫他。背景有一家医务所，医生名叫史密斯。还有另一家办公室。

复述8：有一幅街景。上面有一辆装满水果的手推车；一个男孩在偷水果，一名官员在告诫他，或者有人在责备他。背景有一家医务所，牌子上标出叫史密斯。

突出也可能发生数字上的变化，通过增加数目内容得到突出。例如，法国人战斗场景画面中的那个黑人，他的身材与不平常的相貌需要强调，在实验报告A中竟从一个黑人成了四个黑人。

还有一种时间上的突出，倾向于将事件描述成发生在现今。此时此地发生的事，是听者最感兴趣的而且很重要。在少数例子中，原始描述是用过去时表达的，结果出现临时逆转、场景被听者变成了与其同时代发生的事。显然，在那些被说成明显是发生在过去的事件的谣言中，这种作用不会出现，一个人不能把“玛丽皇后今晨与10000军人同船航行”这样的谣言变成与自己处于同一时期的事件。但是许多谣言通过被人与当前情景联系

在一起而得到突出。例如，一则这样的描述——X 先生上星期在黑市上以 1.5 美元一镑的价格买了一只鸡，就可能（而且往往会）变成“我听说他们正以每磅 1.5 美元的价格从黑市上买鸡”。人们对现在发生的事比上星期发生的事更感兴趣。因而容易使人们改变事情发生的时间。如果可能，就改成目前。正如我们会在第九章中看到的，一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流传的古怪传说，在 1941 年间又被改头换面变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谣言。

突出也会发生在当原始描述中出现有动作的情况下，在关于法国人战斗场景的许多实验报告中，飞行的飞机和燃烧的炸弹在描述中常被强调，同样，街道场景画面中下落的花盆也常被保留并强调，不但下落的花盆这个细节被突出并保留，而且在实验报告 G 中“下落的主题”扩展为图上一个男人正在抽的一支烟。这种效果也可以解释前面提到的数字性突出。

实验报告 G

（说明动作的突出）

场景描述：这是一幅街角图。背景中是一家服饰店——利维父子店。这是 16 号大道与巴特利特街的拐角处。在右角前景有一些垃圾桶，一名男孩倚在柱上。街边有一条狗，后前景是一个花生米小贩在卖五分钱一袋的花生米。过街有一家顶部是保龄球场的“洛氏剧院”，正上演吉恩·奥特里主演的电影。有一座大建筑，看上去像一家仓储店。上面有牌子，写着“此处禁止玩球”。商店顶部有三扇窗户。其一有医生招牌；另一有三只花盆，一只正往下掉；第三扇窗户上有一面军旗。一名男孩子在偷花生米，摊主正朝他叫喊。一名黑人警察从街上朝他走来。保龄球场里有一名男子把身子探出窗外。有一名男孩子靠在柱子上，是一个黑人。

复述 1：图景是在一个街角，不是很热闹的市区。一个细节

表明那是在16号大街，在角上有几个男孩，一个黑人，一名黑人警察。还有一些垃圾桶，一只猫或一条狗在垃圾桶里寻食。还可以看到一家“洛氏剧院”，二楼是保龄球场。挨着它的是一家仓储店的一面大空墙。上面写着“此处禁止玩球”。空中横着一晒衣绳，背景远处是一家服装店。名字叫Debe(反正有两个“e”)。在顶层或某上层有一些窗户。其中一窗户上有三只花盆，一只正往下掉。在另外两扇窗户的一扇里，可看到一名男人在抽烟。不知是烟还是男人正往外掉。在洛氏剧院正上演一部吉恩·奥特里主演的电影。

复述2：情景16号大街的一个街角，不是闹市区。街角处有一群人，一名看起来是警察的黑人。街角上有垃圾桶，一只猫或一条狗在垃圾桶里寻食。街对面是一家“洛氏剧院”，正上演吉恩·奥特里主演的一部电影。二楼是保龄球场。挨着它的一家仓储店的空墙上写着“禁止在此玩球”。再下来是一家服装店。店名里有两个“e”。商店上面有几扇窗户。其中一扇里有三只花盆，一只正往下掉。另一扇窗户里有一名男人在抽烟。不知是烟还是男人正往外掉。

复述3：画面是市镇贫民区的一幅街景。一群男孩在路边玩耍；有一名黑人男孩和一名黑人警察。街对面是一家“洛氏剧院”，正上演一部吉恩·奥特里演的影片。楼上是一家保龄球场。挨着它们的是一面空墙，上面的告示牌上写着“此处禁止玩球”。再下来是一家服装店，店名里有两个“e”。某处有一扇窗户。上有三只花盆，一只正往下掉。在另一扇窗户上，有一名男人在抽烟或雪茄，其中之一或二者大约在掉出来。

复述4：这是一幅市镇贫民区街景。有两个男孩在街上玩。一名黑人和一名黑人警察。过街是一家剧院，正演出吉恩·奥特里演的电影。戏院上面是保龄球场。挨着它的是一面空白墙，上面的标示牌写着“此处禁止玩球”。挨着墙是一家服装店，店

名里有两个“e”。一扇打开的窗户上，有三只花盆，一只正往下掉。另一扇窗户里有一名男人在抽烟或雪茄，一支或二支从男人嘴里往外掉。

复述5：图片是市镇贫民区的一幅街景。街上有两个孩子在玩。有一名黑人官员和一名黑人男孩。过街是一家剧院，上演吉恩·奥特里主演的电影。戏院上面是保龄球场。挨着它的是一面空白墙，上面写着“禁止在此玩球”。附近是另一座开着窗户的房子。窗户里有三只花盆，一只正往下掉。在另一扇窗户里，一名男人在抽烟。他抽的东西正往下掉。

复述6：这是一幅市镇贫民区街景。两名男孩——一名黑人男孩和一名白人男孩，在玩球。有一名警察。过了街是一家剧院，上演吉恩·奥特里主演的电影。楼上是保龄球馆。附近是一面空白墙，告示牌上写着“禁止在此玩球”。一扇窗户上有三只花盆，一只正往下掉。在另一扇窗户里，有一名男人在抽什么东西。他抽的东西正从他嘴里往外掉。

有时突出是通过将事实上静止的物体说成活动的物体而实现的。因此，在地铁场景的画面中，显然是停在一个地铁站的火车，却常常被描述成开动的火车。

这种突出当前的动态并把静止目标描述成动态形式，是一条众所周知吸引人注意力法则的例子。视野中的动态物体（特别是当大多数目标是静止的时候）几乎总是吸引我们的注意力。为什么会这样呢，这里有一条适用的生物学原因。运动的物体有潜在的危险性、希望性或者对我们来说是可能的重要时刻。我们应当注意它们，就是由于这种首要注意法则，在我们的实验中，描述成动态的物体吸引了听者的注意力，因而容易保留下来并传播下去。

“大小”也容易突出，它跟动态一样是吸引注意力的重要决

定因素。[1] 第一位描述者将注意力集中在突出的大目标上，接下来的每位听者都接受了这一突出的印象。因为他主要是依赖于描述，不能与原图核对，因此，他也许会通过想象把目标的相对突出性夸大许多。有时他用与听到的相同词语描述事实，有时（如上面提到的）出现加倍的现象，就像法国人战斗场景画面中那个高大的黑人变成了“四个黑人”；关于街道场景的描述也经常保留关于“大型批发店”或“大片空白墙”的说法。

注意力的决定因素除有形的，还有语言上的。因此有一种明显的保留术语的倾向。在我们的实验中，术语常常是对场所与主题的一种描述——舞台的布景。对法国的战斗场景的描述通常用某种描述格式来介绍的，“这是一幅战争场面”该术语在一系列复述中继续下来。在同一幅图中“场面发生在巴黎与瑟堡之间的某处”这一事实也常得到保留，虽然距离总被歪曲。街道场景则用下面的术语描述：“这是一幅街角场面”。关于底特律种族骚乱画面的描述常以此话开头：“这是幅种族冲突画面”。

要解释这类突出，我们可以援引实验对象要给故事取得某种时空定位的愿望，这种在日常生活中很重要的定位，即使提供了形象的素材时似乎也是必须的，还有另外一种优先保留时空术语的因素是：它们通常在故事的开头被提及。在任何系列中首先出现的内容，总是比后面的内容更易被人记住（首位作用）。

时事有利于突出。法国的战斗与底特律种族骚乱画面的情景与实验时发生的相同事有直接关联点——一幅战斗场景与底特律种族冲突，在前一实验中，“在法国的战斗正在进行”这一事

① “大小”作为吸引注意力的重要决定因素，可通过一个简单的实验来说明。一些字母和数字均匀地分布在幻灯上，除了一个大些，其他的大小都一样。然后，将幻灯放给实验对象看很短时间，并问他看到了什么，他们无一例外地会描述大的字母或数字。其他项目被他看到的机会都一样，但却比大的少。

实几乎总是被描述出来。在后一例实验中，街头小冲突常被描述成出现在底特律，虽然画面本身并没有给出事件发生地点的任何迹象。因为进行该实验的当时，底特律的种族冲突正是大众注意的中心，因而实验对象理所当然地认为画面中的事件是发生在那里。通过突出该画面的时代特征，对于实验对象来说位置的模糊性消除了。在他理解含义时他便保留了一个固定的参照点。

涉及到熟悉的符号时也会出现突出，例如，在法国的战斗场景中教堂与十字架是描述得最多的内容。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些普通符号表达许多意义并为众人所知。因为实验对象对它们很熟悉，所以在描述它们时很有把握。这些符号在象征化过程中进一步起作用，而象征化过程是谣言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底特律骚乱场景中，象征警察权力的夜间使用的棍子，一般在系列描述中都会保留下来。地铁场景画面中的剃须刀——已成陈规的黑人暴力的象征，也总是得到保留并突出，有时在描述的过程中，剃须刀被描述成被人"威胁地挥舞"或"挥动"，这样通过归因于动作而解释突出的附加过程。

感觉闭合（指不完整的形象、观念等在想像中变完整）也是突出的一种形式。这归因于实验对象使其经验尽可能完整，前后一致和有意义的迫切愿望。在我们的实验报告中，有许多感觉闭合的例子。在街道场景画面的实例中，标牌包含了许多不完整与错误，它们是在感觉闭合过程中出现的。这样，Bow 总是描述成 Bowling Alley（保龄球场）。剧院的挑出遮篷画上的名字 Gene Antry（吉恩·安特里）一被描述就往往成了 Gene Autry（吉恩·奥特里）。Lucky Rakes（好运牌耙地机）往往成了 Lucky Strikes（好运牌香烟）。这些感觉闭合常发生在第一次描述（对屏幕所作描述）中，说明所有校对员知道的事物——当某人对正确完整的拼法熟悉时，是很难找出错误来的。

取得感觉闭合的倾向有时也许导致有趣的结果，就像街道场景中那个下落的花盆。我们已经讲过，这种怪事抓住了实验对象的注意力，因而常被描述出来，但在一份实验报告中，这种“令人不舒服”的情境被修改了，花盆被说成在半空中被“接住了”，这种想像的感觉闭合使描述者感觉舒服些。因为那种不合宜的动作被阻止了。

感觉闭合的另一种可能形式是引进解释与自圆其说，这种现象在我们的实验素材中没有在平时生活的谣言中明显，通过补充意义来突出是战争时期许多谣言的显著特点。这时候，人们常用幽灵般关于损失的谣言来解释短缺、挫折、失意与担忧，或怪罪于“当权者”、“犹太人”、“物价管理局的官员”或者“罗斯福”。许多日常生活中的谣言，只不过是对我们个人感觉与遭遇的特殊解释或偏见。

第六章 实验结果:同化作用

在日常的言谈话语中,我们常常把“理性化的”思考和“情绪化的”思考严格地区分开来。对某位作家,艺术家或作曲家,倾向于理性的,我们会说他是“理智的”,“有头脑的”。另一方面,倾向于情感的,我们会认为他是“富于直觉的”,“浪漫的”。同样,我们有时也会给自己的心理活动贴上“理性”或“非理性”,“认知的”或“情感的”标签。偶尔,我们也用“意动的”这一表示主观意愿和能动性的词汇作为“认知”的反义词。

尽管心理学家自己也常常使用这种绝对的区分,但实际上,它是不准确的。没有任何心理活动是纯粹认知性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它缺乏动机或情感的影响。记忆通常被认为是一种认知能力,但是如果不是个体具有想要记住的意愿,就不可能解释记忆现象。这种动机可能像政治的或种族的憎恨一样强烈,也可能像通过执行试验者的指示而使其高兴的意愿那样微弱。在任何情况下,认知的变化过程(包括对谣言的人为加工)和情感的激化过程(包括对谣言的兴趣因素)都是混杂融合在一起的。

这种理智和感情之间微妙的相互渗透,明显地表现在谣言传播过程中刺激物经历的变化中。当我们询问是什么导致了谣言的某些细节被删除,而另一些细节则被强调,以及用什么来解释认同作用与谣言传播过程中产生的换位、插入和某些歪曲,答案可以在认同过程中找到。认同过程与谣言受体的理智与情感对谣言的吸引力有关。

尽管我们没有理由把认同变化过程中的理智与情感这两个方面作鲜明对照，然而为了便于分析，我们还是要把性格中的认同趋向分为不涉及情感的和与情感有关的两个面。但是在我们的头脑中要始终记住这样一个事实，即在现实当中，认知性的认同作用与情感性的认同作用是混同在一起，无法区分的。

不涉及情感的同化作用

格式塔心理学家是动态变化自足型的主要发现者，他们喜欢称之为"记忆回溯"。一旦感知发生了，重要性也随之产生，因此便引起了记忆重组。在感知的最初表现中，不是所有客体特性所产生的刺激都会再现。从一开始，感知就是有选择性的，并趋向于简化我们周围的世界。记忆延续并推动了变化过程。如果不受已经存在的刺激的约束，记忆会加速一个"良好格式塔"的形成。变化朝着简单、协调、结构合理的方向发展。领悟力，正如莱布尼茨所强调的那样，是自发的。它似乎在尽量保持它的形式的同时，也想保持它的内涵。由于这个原因，一种简便的变化过程被建立起来，它在记忆里产生出的结构要优于刺激本身所存在的结构。①

趋向主题的同化作用。正如我们曾所指出的，根据故事主题的需要，内容被强化或简化。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使故事更加连贯、合理、圆满，它们也就被歪曲了。例如，在法国的战斗场

① 考夫卡(Koffka) (1935)总结了导致发现结构法则的一些基本试验。一些格式塔心理学家争论说，新旧记忆材料之间的关联对记忆的变化过程影响甚微。他们认为，这些变化产生于原始的，"天生所固有的"大脑的变化过程。另一方面，批评家们则反驳说，记忆中的一切变化本质上都产生于联想过程——就是说，是将新的记忆材料改编为适应心理背景或思维习惯。在本书中讨论到认同的曲解问题时，我们在争论中保持中立，并在同化变化下列出它或是出于原始的大脑机理，或是出于对先存在的心理背景的联想。

景中，战争这一主题在所有的报告中都被提及并强调，并因为它的重要性而成为报告的焦点。在其中一则复述中，一个假想的牧师被引入画面；一些人被说成是正遭到杀害；救护车变成了红十字站；复述中被毁坏的建筑物的数量增多了，毁坏的程度被夸大了。所有这些复述，尽管它们错误百出，但却迎合并且丰富了这一主题——一个战争场面。假如它们真的出现在图画里，它们会造成一个“更好”的格式塔。依照被介绍的主题，绝不会出现与之无关的事物——不会有苹果馅饼，芭蕾舞演员，也不会有棒球运动员。如果有所添加的话，他们会创造出一个混乱的或“更加糟糕”的格式塔。①

除插入的情节外，我们还有其他为了突出主题而伪造的事实。照片显示，带有红十字的卡车装载着炸药。然而，通常总是被说成装载的是医药品，当然“应该”是这样的。这个同化的错误有时是自发地出现在观察性的报告中的。在这个案例中，从屏幕上描叙照片的受试者并不是“直接看到的”。但是，更经常的是，医药品的假象是作为记忆的同化性错误加入的。

在同一张照片上的黑人几乎总是被说成一名士兵，尽管他的衣服显示，他可能是一名民兵游击队员。在战场上出现一名正在作战的士兵，比在正规士兵中出现一个老百姓，“更为”适宜这一战斗场景。

正在进攻教堂的敌军有时被指认成德国人，尽管在照片上没有一处地方表明他们确实是德国人。既然照片中的路标表明是在法国，于是自然就断定敌人一定是德国人。不久，这种推论被说成为事实。

---

① 对这种说法，我们仅发现了一个例外。在一个最终描述中，一个壁炉台被引进了照片！这显然是由于在连续的复述中对那个钟的强化而造成的。这组壁炉－钟是一个普通的例子，是由讲述者“自动”造成的。这个特别的歪曲例证了语言习惯的同化力量。

良好的继续。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指出，完成结尾的倾向是如何造成强化作用的。不论是原来的照片或者后来听到的，受试者总在试图使刺激物中不圆满的地方变圆满。街道场景中的那个路牌，“ Lowe's Pa……”常常被读作“Loew's Palace”(洛氏宫)，并在复述中也是如此，而 Gene Antry 则变成了 Gene Autry。

所有这些，还有许多类似的案例，都可成为格式塔心理学术语“良好的延续”的例子。显然，由于运用了已有的知识，意在造成一个更加连贯、紧凑的心理构形，它们不仅证明了强化的过程，同时也证明了同化的过程。

压缩引起的同化作用。很多时候，记忆好像试着尽可能地减轻自己的负担。把它们归入一个单一的总类中比记住个别的项目要更省力。地铁场景画面中，车厢里的一系列图片都有自己的特点，报告中有时代替它们的却只是提到“广告牌”，或者“许多广告”。在描述街道场景画面时，把售货车上的水果说成“各种各样”比列举所有不同的种类要方便得多。

这种倾向的结果是在强调许多内容的相似和有共同点的项目时，个别的不同点和特性就都丧失了。为了同化而过分压缩，其结果是，由压缩引起的同化作用得到的是一些陈腔老调。谣言并不追求精确的细节。它更乐于谈起“大胖子”，“暴徒”，“犹太人”，“日本佬”。期望的同化作用。除了有助于增强主题的变化之外，许多内容都采取一种顺应讲述者平时的思维习惯的形式。事物以它们通常存在的方式被感知和记忆。这样法国的战斗画面中路标牌上的公里数常常变成了英里数，以适应我们习惯的长度单位。描述地铁场景中时，经常说成一个黑人和一个国防工人为了一个空座位而争吵——一个在拥挤的地铁中引起麻烦的合理原因。关于底特律种族骚乱场景通常是说警察在逮捕一个黑人，显然也有少数报告指出那个官员更像是去保护黑

人。人们知道，比起他们的保护职责，警察更擅长履行逮捕职能。简言之，当一个实际感知性的事实与期望相冲突时，期望可能会提供一个比事实本身更为有力的感知和记忆的决定因素。

也许，在我们所有同化性的歪曲中最惊人的发现是，在一半以上的实验里把地铁场景中白人手里的剃刀说成是在黑人手里。这个结果，我们将在后面更充分的讨论，它是一个趋向固有期望的同化作用结果的明显例子。黑人总被“设想”拿剃刀，而白人不拿。

语言习惯的同化作用。预期经常只是用感知和记忆中的材料去迎合早已存在的语言定式。例如，地铁场景中，黑人被说成是一个“穿佐特装的人”或者一个“穿佐特装的黑鬼”，如此生搬硬套不仅强化了想像，而且是用惯用的套话去套一个人。这样以衣帽取人，而且既然他是一个“穿佐特装的人”，剃刀就更加毫无疑问地在他手里。

在法国的战斗场景的描述中也涉及到一个古怪的歪曲现象，明显是由于语言习惯造成的。教堂塔楼上的大钟被一个“壁炉台”代替。即使在战争背景的情况下，对一个报告者来说，语言联想的习惯对他的影响也显得非常强烈。以下是该案例的有关部分：

复述 6：这是一张战场的图画。有一个装有大钟的小教堂，大钟显示的时间是差 10 分 2 点。照片下部的路牌指着去巴黎的方向，距巴黎是 150 英里，距瑟堡 21 英里。战场上有人被打死。

复述 7：这是一张战场的照片。有一个牧师①，壁炉台上的钟指着 1 点 50 分。有一个路牌，距瑟堡还有不少英里。

① 这一变化好像是一个趋向主题的同化作用，对“小教堂”这个词的言语误解更促进了同化。

语言在引起听者的想像并确定他对该事件的设想时所具有的强烈影响，当然是谣言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一步。许多谣言几乎都是由一些语言的老套定式来传播的。一遍又一遍，它们包括标语口号式的而且通常是带有偏见的惯用语。诸如："逃兵"，"日本间谍"，"黄铜帽"，"哑巴瑞典人"，"长头发的教授"诸如此类。

更强烈刺激下的同化作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并不能充分表现出潜藏在日常闲谈、谣言、流言蜚语之中的情绪化倾向。然而，尽管这种倾向深深地潜藏在人的本性中，有时是会在实验室条件下表现出来。

着装品味的同化作用(妇女)。针对街道场景的画面，我们从一组女大学生处得到以下记录。其中，对廉价商品和服装的兴趣贯穿始终。而在男性一组中，没有人明显地提及衣着。

实验报告 H

(特别爱好造成同化作用的例证)

场景描述：图片上是第 16 大道和巴特利特大街。主要的景物是一个大广告牌："利维父子百货商店"。那儿有两个商店橱窗。一个橱窗里写着"今日大降价"，而且陈列着三件劣质衣服。另一个橱窗是一幅广告："打折"。一个站在水果摊旁的男人正在呵斥一个想偷水果的小男孩。车上有 5 分钱一个的香瓜、梨和其他水果。水果车的右前方有一个黑人。一个黑人警察正沿着大街走过来。一个黑人男孩站在第 16 大道和巴特利特大街的街牌旁边。一只狗站在街上，一只猫正从垃圾桶里往外扒垃圾。还有一家剧院，洛氏剧院，正上演吉恩·奥特里主演的戏或别的什么。剧院没开门，售票处没有人。洗衣店的晾衣绳横穿

过街道上空，电影院的上边有一个保龄球馆。街道的另一边有一个仓库。一个打着伞的大胖女人正走过仓库旁边。

复述 1：图片上是一座大城市的场景。周围有许多商店，商店里有很多标牌、告示。主要的街角在第 16 大道和巴特利特大街。有许多商店，有两个标有“降价”和“打折”。有一家商店叫“利维兄弟”。商店前边有一辆卖水果的货车，有花生、香瓜、梨和苹果，香瓜一片五分钱。一个胖夫人从街上走过来。还有一个垃圾桶，里面有只正在乱翻的猫，后面有一家洛氏剧院，正在上演吉恩·奥特里的戏，没开门。有一个商店正在降价，那儿的衣服不怎么样。

复述 2：一个大城市，有许多告示。很多商店都打出降价和打折的广告。一个橱窗里陈列着非常难看的衣服。一个牌子上写着第 16 大道和巴特利特大街。还有一个洛氏剧院正在上演吉恩·奥特里的戏，现在空场。有一个垃圾桶，一只猫正在桶里刨食。一个胖女人在街上走着。街边有一个卖水果的小贩，卖花生、香瓜、苹果和五分钱一片的西瓜。

复述 3：这张画上是一个城市里的几条大街。有很多的招牌和很多的商店。许多商店正在打折。有一个商店卖的衣服不怎么样。有一个洛氏剧院，正在上演吉恩·奥特里的戏，现在空场。一个牌子写着第 7 大道和巴特利特大街。一个胖女人正从街上走过来。一只猫正从垃圾桶里找东西吃。一个水果贩子正在卖梨、苹果、香瓜和五分钱一片的西瓜。

复述 4：这是一张有许多街道的城市图片。这儿有相当多的商店卖打折商品。在一个商店里卖的衣服特别难看。有一个洛氏剧院，正在上演吉恩·奥特里的戏，现在空场。还有一个胖女人，一只猫正从垃圾桶里找吃的。还有一个卖水果的，正卖梨、苹果、五分钱一片的香瓜。

复述 5：这是一张街景的图片。有很多的商店打着各种招

牌在降价。一个商店卖的衣服特别难看。一个胖女人正从街上走过来,一只猫在垃圾桶里找吃的。有一个卖水果的正卖苹果和五分钱一片的香瓜。

复述6:一个街景,有好多街道交会在一起。商店挂着各种打折的招牌,有一个商店的衣服很难看。一个胖女人从大街上走过来。一只猫在垃圾桶里找吃的。有一个卖水果的卖五分钱一片的香瓜,苹果和其他各种水果。

职业爱好的同化作用。我们的军人受试者又提供了一个案例。在关于法国的战斗场景画面的报告中,这些人对时间和标着距离、方向的路牌具有特殊兴趣。职业训练使他们对两者特别敏感。

我们发现,军队医院病人中的一组受试者在所有关于军事场景的描述中,都只把士兵叫做"人"。另一方面,在所有平民组中,把这些同样的人叫做"士兵"。这一微小的细节表明一个下意识的假设参照物的同化力量。对那些与普通市民生活相分离的伤员而言,所有的士兵都是"人",因为在他们直接接触的环境中所有的人都是士兵;对平民来说,除了特指的那类外,男人们并不都是士兵。

利己的同化作用。绝大多数谣言之所以能传播是因为人们各有所图,别有用心。简言之,他们传播谣言是出于某些自私的原因。

我们通过底特律种族骚乱场景画面来说明这一点,这次我们选择一组警察作为受试者。在测试结果中,我们注意到了整个复述是如何集中在那个警官身上的(无疑,受试者们对他寄予了强烈的同情或"认同")。对警棍,他的权力的象征,异常敏感,并且变成了争论的主要对象。整个叙述全是保护和偏袒那个警察的。

实验报告 I

（由于警察的利益造成同化作用的例证）

场景描述：这儿引用了一张电影照片，它刊登在一个全国性杂志上。这是底特律种族暴动时的一个场面。有一群人围着一个右手拿防暴警棍的警官，以及一个抱膝坐在地上的黑人。在右边，一个男孩正在跑开。左边，面对着警官有一个看上去怀有敌意的男人因害怕警棍而不敢靠得更近。围观的人群大约有100人。

复述1：屏幕上的这张照片引自于底特律暴动时拍摄的一部电影。在照片上一个右手拿防暴警棍的警官正在监视坐在地上的一名男子。在右边有一个小男孩。在左边是一个男人想上前干涉，但又害怕警棍。

复述2：这张照片引自底特律暴动时拍摄的一部电影。照片上有一个手拿警棍的警察和坐在地上的男子。还有一个小男孩和一名想干涉但又害怕的男人。

复述3：照片是在底特律暴动时拍摄的。照片上有一名男子，还有一名警察。那个男人手里拿着棍子想去干涉，但出于某些原因又没去①。那儿还有一个小孩儿。

复述4：这是一张底特律暴动的照片，上面有一名警官和一市民。警察手里拿着警棍，那个男人想从警察手里抢走警棍。

复述5：底特律暴动的照片。有一个拿着警棒的警察。有人想从警察手里抢走警棒。

下边是一个基于同一张照片的记录，来自非警察的一组受试者（在这个特别的案例中，是一组教师）。它举例说明，在一个不同职业的组别中，兴趣的焦点和同情的趋向是多么的不同。

① 注意在下列复述中，歪曲的部分被趋向期望的同化作用纠正过来了。

实验报告 J

（不同职业组别同情趋向的例证）

场景描述：首先，这是种族战争的场面。这儿好像有一群相当好斗的人群。在图中央有一个看上去像黑人的男人。一个左手拿着球棒的人监视着他。然后是一个有攻击意图的人，紧握着拳头，大张着嘴，带着威胁的表情。在最左边，另一个黑人想逃跑。人群充满了极端的敌意。照片中间那个可怜的受害人好像没有穿鞋。

复述 1：这好像是表现了导致种族战争的种族问题。一个处于被动局面的黑人位于照片中心。他很可怜，没有穿鞋，被一群拿着球棒和报纸卷的愤怒人群包围着。后边站着一个得到人群支持的警察。另一边是一个正在企图逃跑的黑人。

复述 2：这个事件涉及种族问题。显然，人群中间有一个黑人，穿得比较破，没有穿鞋，被愤怒的人群包围着。紧挨着他的是一个得到人群支持的警察。黑人是否被捕不太清楚。在另一边，有一个黑人试图逃跑。存在一种激动的情绪。

复述 3：你和我正在走着，遇到一群人。出事了。在人群中间是一个有了麻烦的黑人。他的鞋找不着了。一个看上去很焦虑的警察站在他旁边。不知道这个黑人是否被捕了。在边上，另一个有关的黑人正试图逃跑。

复述 4：这是一群围在一起的人。这群人对某件事很感兴趣。人们注意的中心是一个黑人青年，衣服不整，鞋也没有了，并且还有其他迹象表明他受到了虐待。紧挨着他是一个警官，正在试图控制局势。难以判断这个警官是逮捕了黑人，还是试图保护他。在另一角，还有一个黑人显然正企图逃离人群。

偏见的同化作用。在实验室的条件下，很难获得由仇恨产

生的歪曲，然而在我们的材料中，我们得到某种机会去追寻种族仇视的变态心理，地铁场景特别适合这一目的。

在关于这幅画面的实验中，有超过半数的系列报告的某些段落都说是黑人（代替了白人）手里拿着剃刀。有几次，他被说成在疯狂地挥舞剃刀，或者在用剃刀威胁那个白人。在这一系列的复述中，有时一开始，剃刀就从白人手中移到了黑人手里，有时是在结尾。

我们不能肯定这种不祥的歪曲所反映的是仇恨黑人，还是害怕黑人。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更深层次的情绪可能就是起作用的同化因素，尽管歪曲甚至也会出现在没什么种族偏见的受试者身上。有这么多广为流传的陈词滥调，如黑人是暴躁的，惯于使用剃刀当武器的，被人们不加考虑地接受，以至于这些报告除了表现出趋向陈词滥调和固有成见的同化作用外，提不出什么别的东西了。因此，在这一案例中的歪曲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敌意的同化作用。很多所谓的偏见只不过是顺应当时的习惯。

联系同一幅画面，我们的黑人受试者的报告有时暴露出一种深受刺激型的歪曲。这表现出他们淡化有关种族的讽刺性描述的愿望（因为这关系到他们作为这一种族成员的利益）。

实验报告 K

（由于本种族的利益造成同化作用的例证）

场景描述：这是开往卡特兰特公园的地铁快车车厢里的一个场景，车正驶过德科曼大街站。一个男人正坐着看报纸。他旁边是一个妇女。还有其他三个人也坐在那儿：一个抱小孩的妇女，一个留胡子的男子，一个秃顶的男子。在前边站着两个人，一个穿佐特装的黑人，另一个穿制服。他俩正在争论什么，或许是为了他们旁边的空座位。穿制服的男人手里好像拿一件武器，看上去像是一把剃刀。坐着的人们中有三个人看着这两

个年轻人，看看会有什么结果出现。穿佐特装的黑人很平静，穿工作服的人很激动，用手指着上边的一幅广告；这时，好像只有他在说话。乘客的头顶上有好几个广告。一个广告上写着“好运香烟”；第二个是小鹅肥皂的广告，是一张小鹅的照片。边上是帐篷的广告，写着“在休闲野营地度过你的假期”。最后是一个公众广告，“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

复述1：有一列开往卡特兰特的地铁，正经过德科曼大街。一个秃顶的男人正在看报，旁边是一个抱小孩的妇女，还有其他三个人。还有一个空位子。两个年轻人，一个穿佐特装的黑人和另一个穿工作服拿着一把剃刀的年轻人，他们正在看广告。有一个“好运牌香烟”的广告，另一个是肥皂的广告，还有一个关于野营帐篷的，还有一个竞选公职的广告。

复述2：这是一节地铁车厢的图片。车里有一个男人，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以及其他的人，有一个人穿佐特装，可能是个黑人。车里有香烟、肥皂和什么剃刀的广告，我不太清楚是什么。发生了一件事儿。

复述3：这张图片是在车上。车上有一个男人，一个妇女和小孩。一名男子好像穿着佐特装，他们不能确定他是否是一个黑人。有人正在卖香烟和肥皂。出了点什么事儿，好像是关于剃刀的。

复述4：这一情景发生在一列火车上。车上有一个男人，一名妇女和一个小孩，还有一个男人穿着佐特装。不能确定这个人是不是黑人。车厢里出了事，是关于剃刀。

复述5：这一情景发生在一节车厢里。车上有一个男人，一个妇女和一个小孩，还有一个穿着佐特装的男人。我不能确定车里是否就是同一个男人。出了点什么事儿，详细情况不知道。

从这些记录可以看出，尽管让他们尽可能确切地复述他们

所听到的，黑人报告者倾向于：(1)不提图片上的那个人是黑人，或至少尽可能随便地提到这一点；(2)淡化有色人种的不良特性。例如，避免使用诸如“扎眼的衣服”一类的词。没有黑人自发地把白人手里的剃刀说成是在黑人手里。

一个黑人受试者在描述法国的战斗场景时，省略了这一事实：画面的中心人物，那个正要扔手榴弹的人是个黑人(实验报告 L)。他可能感到涉及种族因素(尽管不是诽谤)会引起偏见。

实验报告 L

(由于种族利益造成同化作用的进一步的例证)

场景描述：这是一幅战斗的场景。四个主要的人物是士兵，他们正在向隐蔽在教堂中的一群敌人进攻。有一个黑人士兵马上要扔一颗手榴弹。前边有两个男人跪着，一个在射击，一个用望远镜观察。第四个主要的人物是一个胳膊负伤的人躺在地上。这是一个距巴黎 21 公里，距瑟堡 50 公里的地方。在背景上，有一辆救护车，有几个护理人员正向战场跑过来。那个隐蔽有敌军的教堂，是一个典型的老式教堂，有高高的尖塔，塔上的大钟，正指在差 10 分 3 点上(在此有听众们争论认为是差 10 分 2 点)。无法辨认进攻的士兵是哪一国的，他们隐藏在一堵石头墙后面。在角落里有一个牌子，上写着“Pain et Vin”。空中有两架飞机在相互射击。在背景上还有炸弹在爆炸。

复述 1：图片再现了一幅战斗场景。敌人隐藏在一个有钟塔的教堂里边，钟的指针指着差 10 分 2 点。背景远处有炸弹在爆炸，空中有两架飞机。进攻的士兵中有一个已经负了伤。他们从一堵墙的后面开火。有一块牌子表明距瑟堡 21.5 英里，距巴黎 50 英里。

复述 2：这张图片可能是一幅战斗的场景。敌人隐藏在一个教堂里，教堂有一个尖顶的钟塔，钟的指针指在差 10 分 2 点。

背景上还有飞机和爆炸的炸弹。还有一块路牌，上写着距巴黎50英里，距瑟堡21英里。

复述3：这是一幅战斗场景的图画。背景上有一个带大钟的教堂，钟正指着差10分2点。还有一架飞机和一个炸弹正在爆炸。一块路牌表明距巴黎150英里，距瑟堡21英里。

进一步的复述显示出这些记录的通常特点。

在底特律骚乱场景的报告中，一个黑人受试者表现出偏向处于场景中心的黑人的暧昧态度。黑人正在吵闹的陈述被断言为他受到了虐待。

因此，即使是在实验室条件下，我们仍可找到由于潜在的需要而产生的同化作用。谣传倾向于迎合、支持职业爱好，同阶层或同种族成员们的同伴关系，或报告者个人的成见。确实，实验中因情感而产生的歪曲大大少于在日常生活的谣传中所产生的。然而机理是相同的，因此尽管受实验条件的限制，我们仍可能已经成功地揭示出所发生的同化性歪曲的所有基本形式。

第七章 实验结果:推断

大多数谣言开始于对一真实事件的陈述,也就是说,某个人认为自己对某一事件的经历很有趣味也很重要,想告诉其他人。通常,报告的主题(主旨)贯彻始终:一个反犹太人的故事始终是反犹太人的,一个可怕的故事一直是一个可怕的故事。主题对变化的抗拒在哈特金布什(Hartgenbusch,1933)的实验中受到注意,在他的实验中,不同年龄和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受试者,连续地复述了描述性材料及短故事。不管是何种材料还是哪类受试者,在所有的项目中,主题总是最少变化的。同样,检视我们最终的报告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主题尽管被省略和严重歪曲,但都保持了与原始事件的某些联系。

主题变换

存在着一些例外。偶尔表面的细节可能突出出来从而取代了主题,这样,一个新的主题产生了。因此,在实验报告 G 中描述一开始就集中在那个从水果摊上偷水果的男孩身上。然而后来,主题变换成玩耍和坠落:男孩子们在玩球,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禁止玩球",电影院贴着上演戏目的海报。一个花盆从一扇窗子里落下来,另一扇窗子中一个男人抽的雪茄也正在落下来。

在下列关于地铁场景画面的描述中,为麦金尼斯某个候选

人拉选票的广告在所有的广告中最为显眼。最终的描述成了这样:车厢里人群骚动,人们喊着"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① 最初的主题——那个工人和黑人之间的争执完全不见了。然而,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也不能说这最后的报告完全是"连篇谎言"。从原始场景中得出的一个事实核心仍保留着:地铁、一位牧师、一名妇女和麦金尼斯的竞选,这些都含含糊糊地反映了实际情况。

实验报告 M

(主题变换的例证)

场景描述:这场景发生在从纽约开往范·卡特兰特公园或大街的地铁上。有 7 个人——5 个坐着,2 个站着。一个戴帽子的老年绅士正在读《波士顿环球报》。有一名戴帽子的妇女。一位牧师正在读一本小书。挨着他的是一个秃顶的人。一个穿着带花点紧身衣的妇女抱着一个婴儿。有两个人站着——一个黑人和一名白人。黑人穿着佐特装,白人是一名工人,手里拿着一把剃刀。他们好像在争论什么,其他的人对此不太注意。车上还有几个广告牌:"快来参加野营","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荣誉、安全、可靠、人民的公仆"。还有一个小鹅肥皂的广告。这是一列快车。

复述 1:这个场景发生在一辆从纽约开往范·卡特兰特公园的地铁列车里。它是一辆快车。这儿有 7 个人——5 个坐着,2 个站着。有一位穿带花点的紧身衣的女士,一个牧师在读一本书,一名男子在读《波士顿环球报》,一个男人目光越过一位女士

① 在这个例子中,拉选票的广告如此突出,反映了地区利益。这个实验中的受试者是大学生,在他们的老师中也有一位麦金尼斯先生。熟悉的名字引起了注意,并导致了这个戏剧性的强化的例子。

的肩头向前看。两个人站着——一个白人和一个黑人。那白人拿着一把剃刀。他们正在争论,但没人在意。有两三个广告。一个是"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或市长";另一个是关于某种肥皂的。

复述 2:有一辆开往范·卡特兰特公园的列车。车上 5 个人坐着,2 个站着。有一个穿带花点的波尔卡紧身衣的女士,一个牧师,一名女士或一个男子在看《波士顿环球报》。有人从她的肩膀上看过去。两个人站着,一个是白人,另一个是黑人。那个白人手里拿着一把剃刀。有两个广告,一个是"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或其他什么公职。还有另外一个广告。

复述 3:有一辆开往范什么地方的地铁列车。车里,一个男人站着,还有一个男人坐着看《波士顿环球报》,还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穿着带花点的波尔卡紧身衣的女人。地铁里有广告,其中一个是"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

复述 4:有一辆开往范什么地方的地铁列车。车厢里有一群人,还有一个牧师。车厢里发生着某种骚动,人们喊着"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或其他什么。一个妇女坐着,在干什么我不记得了。

复述 5:有一辆开往范什么地方的地铁列车。车里有一群人和一个牧师。有某种骚动,人们喊着:"选麦金尼斯当参议员。"车里还有一个妇女坐着,在干什么事儿。

在关于地铁场景画面的描述中,另一个例子更为特别,它显示出实验过程中主题的两次变换。在原始的描述中,场景的中心围绕着黑人和白人工人的争吵。在复述 1 中,焦点转移到车里的广告上。两个主角不再争吵。而且他们都被说成是在看广告。在复述 2 中,引进了一个编造的意外事件,而且一直持续到结尾。不管怎样,即使在这个假设中,环境事实是正确的,即这

假想的插曲发生在地铁里。

尽管这种主题变换仅发生在较少数的情况下，但我们的实验中仍是令人吃惊的结果。它们所在之处，往往是对一微小细节的强化。一旦一个新的主题产生了，它便开始产生影响，并尽可能地对故事中的所有个别细节加以同化。

虚构和添加

在为数不多的案例中，当我们不能把一个内容解释成对前一个复述中的细节的歪曲时，就可以谈到完全的虚构了。换言之，虚构几乎总是同化作用的例证。讲述者会想像出一些细节以适应主题的需要。例如，我们回忆一下，在法国的战斗画面的描述中，一个牧师是如何被塞进这个战争场景的。在我们刚刚看过的实验报告中，一个讲述者向我们提供了地铁车厢里一个骚动的竞选人群，制造了麦金尼斯候选资格的故事。在关于底特律骚乱的描述中，一个受试者（实验报告 J）为暴徒提供了棍棒和卷起来的报纸卷。设想暴徒们拿着棍棒不仅是“合理”的，而且这个创造是通过对警察的警棍的同化作用而产生的，这一点在故事中被明确地陈述出来。既然已有一种武器出现，那么为什么不能有其他的武器呢？

在我们自己的实验案例中，我们几乎没有发现通常称作添加的情况。故事变得越来越短，而不是越来越长。巴特利特（Bartlett）在他的个体记忆实验中也发现了这种压缩趋势，但他推测在连续复述中，一个人可能会扩展和编造。但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我们的连续复述所表现出的强化和简化的程度更甚于巴特利特在他个人的实验中的发现。正如我们已经解释过的，这个结果，一方面是由于听众的态度造成的，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实验的要求造成的（即“尽量精确”）。但是，日常生活

中谣言的汇集也表明，当它们传播时，谣言变得非常简明，甚至成了警句。当然，简略的程度由谣言本身的性质决定。一个恐怖的故事就不太可能变得口号化，因为故事列举了许多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另一方面，一个敌意的谣言，如"犹太人逃避服兵役"，在以"山姆某某怎么样怎么样"的套话作为开头之后，或是看了某些谬误的统计表之后，这个谣言最后就缩减成一个使人很容易记住的短句。

偶尔，在谣言传播过程中，会发生因好奇而反过头去求知真相的情况。在极偶然的情况下我们发现，一个谨慎小心或多疑的人，在传播谣言时会加进一些限制和解释从而阻碍了谣言迅速歪曲的过程。例如，在实验报告 J 的复述 4 中，这名受试者造成了一种审慎的影响。第四个受试者讲的确实比前边的复述更为真实。在描述这个幻灯片所表现的一种不明朗的形势时，这个受试者说："很难说那个警官是已经逮捕了那个黑人，还是试图保护他。"为了表达他自己的困惑，他无意中回到了对这张图片本身惟一客观的解释上。其他的受试者偶尔也小心地指出，他们的报告是不大可靠的。一些带限定性的字眼，如"我不知道……"，"我的印象是……"，"我听说……"时而会出现。然而，有必要强调，即使是在实验中有鼓励谨慎的情况下，这种限定也是超出常规的。它们在现实的谣言中并不是经常发生的。

自发行为的结果

为了解释虚构的过程，我们将不得不再次回到"自发行为的结果"这一概念上。在普通的谣言中，我们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谣言传播者总是想给事件寻找一个原因，为人物寻找动机，给问题的某一环节寻找一个合理的存在理由。在我们的实验中，实验要求显然不鼓励作这种合理化的说明。因此，我们得到

的许多记录都是缩简为几乎是像小孩一样列举出的相互之间没有联系的内容。列举是慎重的办法。但是即使如此，我们绝大多数的报告保持着故事的基本原形。一个貌似合理的推论被传播者编造出，在传播时，又被受众不加批判地接受。

语言的误解

关于虚构和歪曲的另一个较次要但仍很重要的来源是语言的误解。当一个人没有亲眼目睹最初的事实，并且预先并不了解它的性质时，他惟有根据自己从传闻中得到的印象去理解。许多的人听觉器官是有缺陷的，而且即使那些有正常敏锐听力的人也经常听错，或者由于对所听到的内容毫无心理准备，也会发生听错或曲解。让我们看看关于地铁场景的实验报告中摘引的下列复述：

复述 4：这是一张地铁或电车的图片。车里有一个黑人和一个拿着剃刀的工人。车正沿着一条大街走。车外有广告：投某人的票和参加什么野营。右边有一个睡着了的妇女，一个留胡子的男人和一个牧师。

复述 5：图片是关于一辆电车或地铁的。某人或其他的什么人——一个黑人和一个拿着剃刀的工人。在车的右边，有一个正在睡觉的妇女，一个留胡子的男人，某个人的竞选广告，一个牧师。

复述 6：这个场景是在一辆电车或地铁上。有一个黑人和一个手拿剃刀的工人。坐着的是一个正睡觉的妇女，一个留胡子的老人，一个牧师。还有广告：野营广告和为某人竞选的广告。

在复述 4 中，广告，竞选，野营是分开的概念。在复述 5 中，压缩成了一个意思，表现为竞选广告。言语的误解把野营恢复

到故事里的一个单独的位置。这个不寻常的变化表明，要想从一个谣言的最后说法，去推断其曾经有的中间环节是不可能的。我们听到的传说可能曾经包含了现在没有的内容，而我们现在听到的说法可能确实比那些中间插进来的版本更符合事实。

有时，语言误解对事实造成的破坏甚至更为严重，如以下关于街道场景的实验报告。受试者是五年级的学生。（无关的东拉西扯和故事整体性的欠缺，是这个年龄段的受试者的典型特点。）在复述 1 中，我们看到，“其中的一个窗子里住着一个医生”。复述 2 中，我们发现，“其中的一个窗户里有一只鸭子”。当然，后来的受试者也就无法指出这个错误了，这一误解一直保留到这一系列复述的最后。同样的，复述 5 中提到的“植物”，在复述 6 中转化为“飞机”，这大概也是言语误解的结果。

实验报告 N

（孩子们报告中的离题倾向和言语误解的例证）

复述 1：有一个售货车和一个男孩子正想从车上拿什么东西。一条人行道。一只猫。许多垃圾桶。其中的一个窗户里住着一个医生。有一个花盆正掉下来。还有一些其他的花盆。一个晾衣绳。两个男孩子。

复述 2：售货车。两个男孩。其中的一个正想从车上拿什么东西。一座房子。其中的一个窗户里有一只鸭子。一个花盆从其中的一个窗户中掉下来。晾衣绳。人行道。其他一些花盆。

复述 3：汽车。男孩想从车上拿什么东西。一只鸭子。一些花盆在人行道上。

复述 4：一只鸭子。一辆汽车。一只狗。一盆植物。

复述 5：一只鸭子和一辆汽车。一只狗，一盆植物。

复述 6：一只鸭子和一辆汽车和一只狗和一架飞机。

时间和地点的错误

很多谣言描述事件时声称发生在确切的地点、时间，但是，我们的实验表明，在一系列报告中，所提及的特定时间、地点和专属名称在各项内容中，是最容易被歪曲的。

在表述场景发生的大体地理位置时，所发生的错误并不很严重。对事件发生的大体位置（“一条街道场景”，“法国人战斗场景”，“地铁场景”）的确定通常会贯穿一组复述的始终而不会发生严重的歪曲。这样的表述为每一个下面的听众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方位。没有这样一个地点，听众要把他所面对的模糊不清的局面组织起来是十分困难的。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表述之所以成功地保留下来，也因为它们一般在描述的一开始就被提出来。听觉实验表明，那些在开头（和结尾）的内容易于被记住。作为这些因素的一个结果，受试者在面对混乱局面时确定方位的需要及初始印象——给场景大体定位是很少被忽略或严重歪曲的。

另一方面，在传播的过程中，对方位的具体细节的描述通常不能保持，并且变得五花八门。比如在地铁场景画面的描述中，车站的名字和这列快车的目的地都清楚地在告示牌上标出来了，但从来没有被完整地保存到最后。或是早早地被省略，或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同样，在街道场景的描述中，街道名称也很少被正确地复述。假如这些地点名称是受试者所熟悉的，那么省略或歪曲的程度可能会较轻一些。在法国的战斗场景中，法国城市的名字——巴黎和瑟堡——通常都被记住了，复述时没有发生歪曲。这些城市的名字对大多数受试者来说是熟悉的，不仅在他们已有的经验中，而且在当时的报纸上也总提到。然

而,路牌上所标的到两座城市的距离却很少被准确地复述出来。这两个数字——50 和 21.5——经常在城市之间颠倒,并且数字常被搞错。还有把数字变整的趋势,21.5 变成了 20。

人名像地名一样,是特别不稳定的内容,尤其当受试者对它们不熟悉的时候。这些名字绝大多数早早地就被省略掉了,而且在省略以前,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

在关于街道场景的实验报告 G 中,可以看到一个人名转变的有趣的例子。开始,百货商店的名字被正确地说出来了:利维父子。在整组的报告中,它先是变成了迪比,然后又成了"有两个'e'的名字"。这一歪曲毫无疑问是由某种听觉误差造成的。因此不经意听到的专有名词,不像大多数常用词那样为听者所熟悉,也就特别容易被搞错。

表 1 在连续表述中专有名词被提及的比率

(以在最初的表述中出现的全部专有名词为 *100%*。表中各项以此为基础计算比率。)

复述次数	正确比率	错误比率	未提及比率
原始描述	92	8	0
1	51	18	31
2	43	16	41
3	30	17	53
4	23	13	64
5	18	5	77

表 1 表明在口头传播的过程中,对常用的名词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我们注意到即使是在最初的描述中,有 8% 的名字就说得不正确。这个事实再次证明甚至眼见也不能总是为实。这和记忆对同类型事物歪曲和同化属于同一类型,但程度低一

点。这是由于试验物的强制性影响造成的。让我们来看看复述5,只有18%的常用名词被正确地提到,5%的名词虽被提到但搞错了,其余的就再没有被提起过。

像地名和人名一样,时间的具体细节通常被省掉或歪曲。除了军人受试者那一组外,能够把法国战斗场景中教堂钟塔上所示时间准确地说出来的复述不超过一二个。同样在地铁场景中,对车站上的钟所给出时间的复述也好不到哪儿去。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对一个故事来说,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当不会严重影响到故事的连贯性时,准确的时间极易被忽略或弄错。报告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采用了现在时态,这一趋势加重了现时性的歪曲。当观众看到一张捕捉到稍纵即逝的历史性时刻的照片时,总是忽略了时间。在说到这张照片时,受试者会把它现时化。讲述这一故事时,好像就发生在当前。

孩子们的报告

在许多方面,孩子们的报告都明显地异于成年人。

简化更为惊人。在他们的整组报告中,年纪小的孩子们记住的内容要比大点的孩子少,更远远不及成年人。

当然,随着年龄和能力的增长会记住更多的内容,这是众所周知的现象。例如,在智力测试时,一个三位数字,在听一次后,一个三岁的孩子应能够正确地复述出3位数来;六位数字,一个十岁的孩子应能复述出6位数来。麦克吉奥(McGeoch1928)通过研究儿童在目睹事件发生后,组织语言进行复述的能力,发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讲述内容就越丰富。在他的实验条件下,平均年龄14岁的孩子在他的报告中能正确在复述出28.5%的内容,与之相比,9岁的孩子只能讲出18.2%的内容。因此可清楚地看出,简化行为,部分是由于记忆能力尚未发育成熟的结果。

报告是列举式的。下列取自5年级的孩子们有关法国的战斗场景的描述表现出这一年龄段在讲述中不连贯的特点。

实验报告O

（儿童报告的列举倾向和快速简化的例证）

场景描述：有一个男人，一辆红十字卡车，一枝枪，三个路牌，一个教堂，一些飞机，一些高射炮，一些炸弹，好多破烂石头墙。远处有山。躺着一个男人。有一个人站着用双筒望远镜瞭望。有一个带破旧围墙的岗哨和一棵非常难看的树和一些灌木丛。有一个黑人。正在打仗。敌人的飞机在扔炸弹，想炸死城里的人。红十字车正在抢救伤员。

复述1：一辆红十字卡车。一棵七零八落的树。一个黑人。一个躺倒的人。一个人用双筒望远镜瞭望。破烂的石头墙。头上有飞机。炸弹。枪。

复述2：红十字卡车。炸弹，一架飞机。石头墙。

复述3：红十字卡车。炸弹。一架飞机和石头墙。

复述4：红十字。一些炸弹。一架飞机。

复述5：炸弹和一架飞机和红十字。

复述6：炸弹。一架飞机和一个红十字。

这些列举显得手忙脚乱，不带有想叙述一个完整故事的意图。如同记录P显示的，在初级中学年龄组中，情况稍好一点。

实验报告P

（*13—14*岁年龄组报告的例子）

场景描述：战斗场面。教堂尖顶塔上的钟指着差10分2点。有一尊黑人奴隶的雕像。一个人负伤了。他旁边躺着一个

人拿着望远镜。一个人从墙头上射击。路牌,“巴黎 21.5 公里”和“瑟堡 50 公里”。远处有一辆救护车和两个医院的人。教堂顶上有洞。支架支着一座建筑的废墟。雕像,也可能不是。附近有石墙。远处教堂上空有两架飞机,一架小的和一架大的。教堂后边有炸弹爆炸。

复述 1:发生在战场上。近处有一尊黑人奴隶的雕像。近处还有教堂。上空有两架飞机,一架小的和一架大的。附近在射击。尖顶塔上的钟大概是 10 点。教堂附近有墙。一个人负伤了,他旁边躺着一个人正用他的双筒望远镜瞭望。

复述 2:战场。黑人奴隶雕像。一个伤兵,他旁边一个人用望远镜瞭望。教堂附近有围墙。两架飞机,一架小的和一架大的。不断地射击。是在 10 点钟。

复述 3:战场。黑人奴隶雕像。两个人负伤了躺在战场上。一个人正用另一个人的双筒望远镜瞭望。当时是 10 点钟。上边有飞机。另一边有墙和一座教堂。

复述 4:战场和黑人雕像。两个人受伤了躺在地上,用各自的望远镜瞭望。10 点钟。有飞机飞过。有一座教堂。

复述 5:战场。一个黑人的雕像。两个人受伤了。躺着用对方的望远镜瞭望。当时是 10 点钟。还有飞机和墓地。

复述 6:墓地里有一场战斗。一个黑人的雕像,头上有飞机。两人受了伤。

很可能是要求孩子们的报告要“尽量准确”的原故,促使了他们采取罗列的方式来完成报告。然而,众所周知,年龄小的孩子在描述照片时,会简单地罗列事物。通常只是到了 12 岁,他们才有可能把它们扩展成一个连贯的故事。在我们做实验的情况下,强调准确报告时,甚至更高年龄组的孩子(13 和 14 岁)也会进行罗列。这种列举的倾向似乎表明,孩子们没有觉得受到强迫,要像成年人那样尽可能去理解、思考、解释并汇总为一段

经历。

由于孩子们从生活中所获得的许多情节明显超出他们自身的理解范围，所以他们也就不觉得有必要将他们所罗列出的对象按其含义纳入适当类别中。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在他们的报告中很少发现同化现象。所能发现的是简化现象，它使得报告符合不同年龄组的少年所特有的记忆力发展阶段。并且报告中所保留下的各项内容之间还发生了相互强化的现象。而在歪曲的过程中，无论是联想性的还是情感性的同化作用，都没有发挥大的作用。

种族因素被淡化。通过在实验中使用一些带刺激性的材料，我们得到一个很好的机会去研究孩子们对场景中的种族因素会如何反应。在没有限制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发现孩子们倾向于淡化种族色彩。在几个报告中，人们的种族特性全被省略了。在这方面，与黑人受试者报告是类似的。综合所有孩子们和成人的报告，我们发现83%的成人在复述中描述了人们的种族身份，相比之下，儿童仅有43%。即使种族内容被孩子们完全保留下来，也是作为众多列举对象之一而被提到的。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没有发现蔑视态度的同化现象。例如，关于地铁场景的报告中没有一个把白人工人的剃刀说成是黑人拿的，而在成年受试者中却有50%以上的人是这样做的。以下报告是有关这幅图片的比较典型的孩子的报告，它们显示出青少年在处理种族问题时，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特性，以及复述中这一种族内容的迅速消失。

实验报告Q

（关于儿童处理种族问题的案例）

场景描述：有一辆坐着许多人的电车，一个把帽子扣在后脑勺儿上的小男孩正对一个黑人说话。一名妇女坐在那儿。窗外

有一个带尖桩的栅栏。一个小老太太坐在那儿。那个黑人正在对男孩子讲什么有趣的事儿。一位戴眼镜还戴着一顶杜鹃帽的女士在他们的后面。墙上有标牌。牌子上表明电车开向哪儿。外边有山,一男子在座椅上睡觉。有5个人坐着,两人站着。那个小个子男孩看上去好像有点粗野。

复述1:这是一辆电车里的情景。有一个粗野的小个子男孩,后脑勺儿上扣着帽子,正和一个黑人说话。有一位女士戴着一顶杜鹃帽。还有告示牌。告示还表明车向哪儿开。外边有山。5个人站着。

复述2:这是电车里面的情景。戴帽子的粗野小个子男孩坐着,正和一个黑人说话。有5个人站着。有一位女士戴杜鹃帽。还有标着车往哪儿开的标牌。窗户外有山。

复述3:在电车里边。粗野的男孩子头上戴着帽子;一个男子坐在他旁边。女士戴着可爱的帽子,一个男人在她后面。外边有山。标牌表明车开向哪儿。

复述4:电车里面。粗野的男孩坐在位子上。他旁边是一个戴着漂亮帽子的妇女。窗外是山。标牌表明电车开往什么地方。

复述5:电车里面。粗野的男孩,他旁边是一个男人,再旁边是一个戴平顶帽的妇女。外边是山。广告牌表明电车开往什么地方。

复述6:电车。车里有个粗野的男孩。他前面有一个男人。还有一个女士。车上的图板表明电车开往什么地方。窗外是山。

请注意,在关于黑人的描述中,没有那些固定的套话。他只被简单地说成"黑人"。没有提到在成年人受试者的记录中频繁出现的"佐特装",或"扎眼的衣服"。报告中说,这个黑人正在对

这个白人“男孩”“讲什么有趣的事情”，与之相反，成年人总是把他们描述成正在争吵，这种不带情感因素的描述是所有孩子们报告的特点。在这个实验中，受试的孩子之所以没有强调种族色彩，部分原因是由于他们所在的学校有意倡导促进不同肤色与宗教之间的友善。这个学校有黑人学生，同样也有一些黑人教师，他们既教白人孩子，也教黑人孩子。因此，孩子们不在意肤色可能反映了他们学校的种族平等。然而，除了因为这所特殊学校所采取的开明政策以外，众所周知，在受到特别事件和双亲或文化熏陶的影响以前，孩子们的确是对肤色不敏感的。例如，有一个 7 岁的孩子约翰尼的例子，他问他的妈妈，某一天能不能带汤米来家里吃饭。他母亲知道她儿子学校里有许多黑人，问道：“汤米是白人还是黑人？”这个孩子回答：“我不知道，我忘了看，但是再见到他时我会看的。”在我们的社会里，这样在种族意识上的天真无邪不会保持很长时间了。

第八章 歪曲的基本模式

以上，我们如此详细地介绍实验室情况下谣言传播的结果，是不是有些偏离了我们的主要目标：日常生活中的谣言呢？为了说明不是这种情况，我们用一个日常普通的谣言来验证一下，看看我们在分析时所用的一些主要概念有多少可以应用到这个例子上。

我们从1945年夏天，也就是日本投降前夕，出现在缅因州乡间的大量战时谣言中，任意选取了一个微不足道的谣言事件。

一个中国教师休假开车来到了这一地区，他询问去山顶的路，因为从那个山顶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这些风景照曾刊登在附近一个城镇的商会出版的旅游指南上。有人给他指了路，但是在不到一小时社区内就传开了：一个日本间谍登上了那个山顶拍摄这个地区的照片。

在传播中，构成这一谣言"事实核心"的简单而未修饰过的事实真相从未被提到过，而从一开始，它就从三个方面被歪曲了，即现在我们所熟悉的简化、强化和同化。让我们依次考察一下每一类型的变化。

(1)简化。谣言中省略了大量有助于了解事实真相的细节：访问者彬彬有礼而且腼腆，但是态度诚实，他向一当地人问路；尽管他显然是东方人，但他的准确国籍并不确知。其他没有提及的事实是，这个访问者并不掩饰自己，沿路的人们很容易辨认，以及没有人看见他有照相机。

这些省略并非由于人们记忆的不可靠性。相反，它们是有系统的省略。它们之所以被省掉了，是因为假如讲出来的话，它们就会趋向否定所期望听到的意思："我们中间有一个日本间谍"。我们不知道省略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那个与陌生人谈话的当地人对情况的错觉而造成的，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在人群中一个个地传播开时发生的。可能目击者自己就没有观察到所有相应的证据，因为一见到一个亚洲人马上就引起了他长期存在的偏见与成见。观察和记忆是同一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如同巴特利特指出的"对事物的观察中不可避免地混杂了想像、评价与初步的判断。"①

(2)强化。当一些细节被删去后，那些保留下来的细节就更为突出、重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强化是简化的一个对等过程。由于已经接受了对这名中国学者来访的特殊解释，谣言传播者会尤其强调有助于证实谣传的内容而把其他内容缩减到最少。对这些经过挑选的细节的强化，造成了这个故事的夸张的戏剧性内容。在一开始，亚洲人被叙述成日本人；从仅仅是"一个人"变成了一个特别的人，一个"间谍"。无害的假日消遣观光变成了非常狡猾、阴险的间谍活动。访问者手里拿着照片的事实被强调成"拍照"这一行为。实际上，对敌人来说，从那个山顶上看下去没有任何有价值的照片可拍。从那个山顶上看不到任何工业或军事的设施。此外，大家都知道战争进入了最后阶段，而间谍活动，特别是在偏远地区，从客观上讲，极不可能。然而，战时的情绪和警觉造成了这种强化，从而对这一事件进行加工，

① 伯绍(Bysow,1928)通过区分三个阶段来标识一个谣言的开始：(1)一个或几个人出于兴趣观察某个事件，他们的兴趣产生于该事件对社会的重要性。(2)事物被观察者修改、评价。(3)经过修改谣言产生了。伯绍的分析令人信服，只要我们不认为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之间有任何时间界限。

使之简单明了，易于理解并引起震惊。这里面有些东西很值得讨论、反思和关注。

(3)同化作用。当然，简化和强化不会随便产生，而只会在与谣言传播者过去的经验和现在的态度一致的情况下产生。在缅因乡间居住的当地人很少接触亚洲人。像绝大多数西方人一样，他们不可能区分中国人和日本人。对亚洲人，他们所能获得的只有由战时新闻与传闻所牢牢植入头脑中的概念："日本间谍"。除此以外，对这一不平常的旅游来说再没有其他适合的解释。大多数农民的脑子里都没有"正在度假的中国教师"这一概念，因为他们不知道一些美国大学聘请了中国学者作为教师，并且这些学者，像其他教师一样也有暑假。这个特殊的情况，必然会被人们已知的各种情况中可能性最大的那种情况所同化。

"拍摄这一地区的照片"是另一个明显的同化作用的例子。旅游者并没有带照相机，但是，作为政府开展的"保密"运动，战略地区不准使用照相机的禁令和大量的反间谍电影，这些都给谣言传播者提供了一个貌似合理的动机安在这个陌生的旅游者身上。这一系列想法的产生是粗劣的：一个黄种人——一个日本人——一个间谍——拍照的间谍。就这样以一种机械的惯性，一个念头引出另一个念头，直至得出最后的结论。

这一系列想法之间机械的联系多少可以说明这个谣言为什么能够传播开来，但是，还存在着一个不容置疑的因素。这个偏远的缅因乡间也深深地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几乎每一家都有儿子在服兵役。对日本人的刻骨仇恨，深切地渴望保卫美国和对外国人的怀疑成了这个地区悠久的文化特征。出于这些根深蒂固的心态，对事件的感觉被同化了，并且从这些心态中，产生出编造谣言的动力。战争创造了把这些因素付诸实施的条件。这一事件对当地人来说有着潜在的重要性。它也是相当含混的，因为他们没有关于来访者国籍与目的的确切信息。

简化、强化和同化这三种并存的过程，反映了谣言传播者的“自发行为的结果”。由于人们对此事的真实情况的了解比较模糊，从而也就无法从中得知这次奇怪来访的目的。所以，一个惟一的、指向性的概念抓住“间谍”这一主题，并且为了使它保持一致，许多与之不符的细节被简化掉，许多细节为了符合这一主题而被强化，而这个插入的情节作为一个整体也和谣言传播范围内人们先在的情感构成和思维特征同化了。

歪曲的三分模式的普遍性

几年前，沃尔夫（Wulf 1922）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个体的记忆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过程中所发生的变化。他所使用的试验材料是简单的不对称图形，如图 3 所示。

在实验中，把这些图形展示给受试者，每次一个。大约 30 秒后，要求这些受试者尽可能准确地再现这些图形。一天以后，要求这些受试者再画一次，一周后再画一次，直到最后间隔为两周到两个月。这样，他收集了大量的资料，用来研究“记忆回溯”的结果和它们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所发生的变化。

沃尔夫认为，如果旧有的记忆机械（火漆上的印章）是正确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再现应变得越来越模糊。相反，他发现，再现的图形呈现出这样一种趋势，样式“更好”，“更简明”，“更有意义”。这些变化保持着这种趋势，而不论受试与回忆之间间隔时间的长短。沃尔夫用德文撰写的论文里，将这一趋势表述为被保留的记忆痕迹趋向于达到 Pragnanz（一种更完美、更基本的样式）。他相信，有三个因素导致图形越来越深刻：（1）标准化，与我们的“简化”概念本质上同等的过程，（2）强调或重点化，相当我们的“强化”，（3）自发变化，它是记忆回溯模式自身所具有的变化。第三类变化中无疑包含了我们所说过的“同化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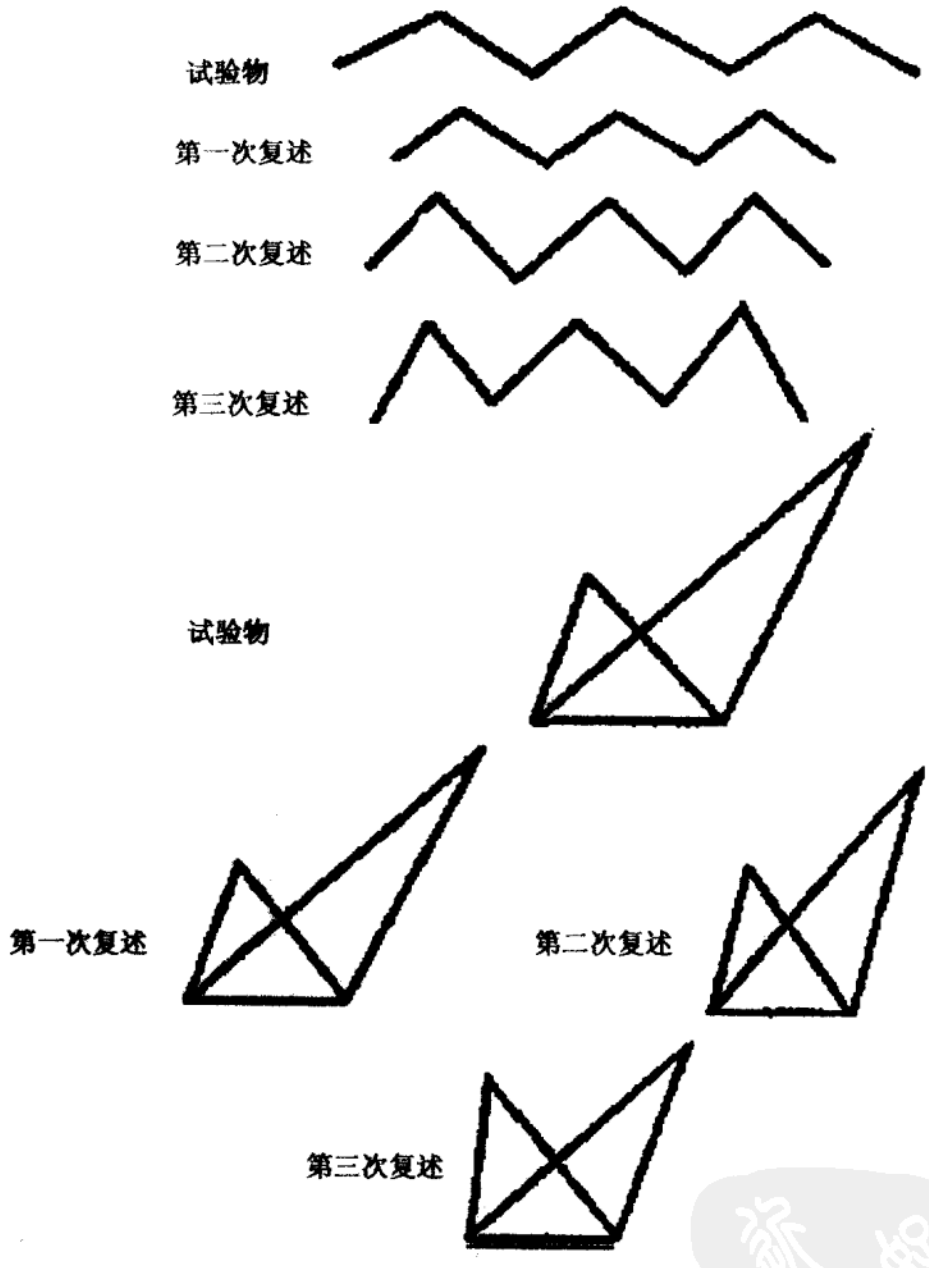


图 3 试验物图形和一组再现——沃尔夫

上面一组例子证明了“强调”或“重点化”(强化);下面一组的例子证明了“标准化”(简化)。所有这两种类型的变化都说明记忆回溯趋向于达到 prag-anz(较好的样式)。

用”的变化。

沃尔夫解释的说明方式遵循格式塔心理学，趋向于把思想当成一种自动的行动者，当任其发展时，会产生出更典型和突出的样式。巴特利特总结这一趋势说，记忆中的某个图形往往比它的原形更清晰易懂，更突出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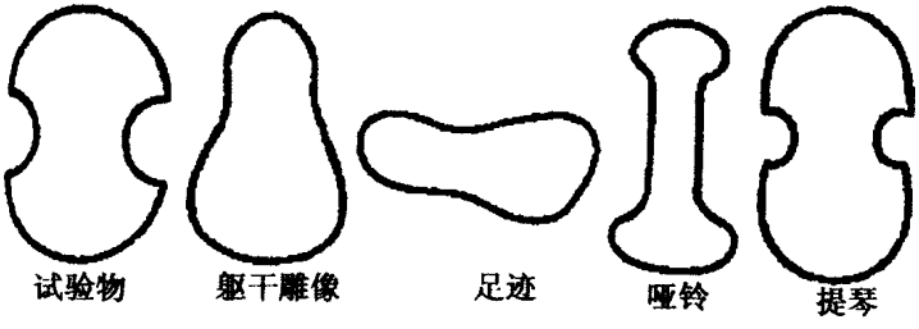


图 4 试验物图形和各类受试者再现的样品——吉卜森实验

后来，吉卜森(Gibson 1929)根据沃尔夫所用图形的基本特点重复了这一实验，大体上证实了沃尔夫的结论。吉卜森的图形甚至比沃尔夫的图形更不为人们所熟悉。

他把他的刺激物投映在一个“记忆鼓”上，以便每一个图形给观察者看 1.5 秒钟，接着是下一个。这一组试验物出现几次，每次整组出现后要求受试者尽可能多地画出他所记住的图形，怎样排列都行。尽管图形都未被命名，但要求受试者讲出他们所画的东西是什么。用这种办法唤起受试者的语言习惯，结果发现再现的图形明显变得与受试者所命名的事物的形状相似。一个受试者画了一个“躯干雕像”，一个画了“足迹”，第三个画了“哑铃”。毫无疑问，这一对象的同化甚至在最初的感觉中就开始了，尽管受试者是在画完之后才给对象命名的。5 周及一年以后的再现表明，文字标识对残余记忆中的图形及复述造成的稳定持久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

在对结果的解释中，吉卜森比沃尔夫更强调联想性同化作用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如同沃尔夫所说的，不仅图形趋向协调和连贯，令人吃惊的是，图形趋向人们日常所熟悉的事物及所被命名的事物。

奥尔波特(Allport 1930)在类似的实验中，用了 350 个学龄儿童作为受试者。他给他们看两个图样，它们在外观上比沃尔夫和吉卜森所用的图形更相似，也更几何化。观看 10 秒钟后，试验人员要求孩子们画出这些图样。事先没有通知，两周后和四个月后，试验人员又回来要求他们再一次画出他们以前在卡片上看到的东西。这些图形是在斯坦福—比奈特(Stanford-Binet)等级的智力测试中使用的。

图 5 中，在这组类型的再现中，我们注意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印象是如何变得单纯与协调的。去掉尖顶的金字塔不等长的边是最先被省略掉的细节。希腊字母中间突起的部分在再现 2 中似乎处于保留与否的矛盾中。而在再现 3 中，这一部分则完全消失了，而且字母本身似乎上下颠倒了。最后的形式比较固定和简洁，几乎是上次再现本身的轮廓。它被简化和强化了，同时也被头脑中存在的那些更倾向于协调、平衡和含蓄的意向同化了。

下面我们引用一个实验，它显示出语言习惯造成同化作用的惊人效果。卡米歇尔、哈根和沃尔特(Carmichael, Hogan and Walter, 1932)把一组 12 个简单的几何图形展示给他们的受试者。这些图画中的每一个至少由两个确切的东西构成。不同组别的受试者对所呈现的试验物图形冠以不同的名称。然后，要求受试者凭着记忆尽可能多地画出这些图形，越准确越好。从受试者那里获得的图画表明，他们所记住的图形趋向于与当初给它们所起的名称保持一致。图 6，显示了一个试验物图形，与之相应的文字和典型的再现，证明了语言标识对记忆中视觉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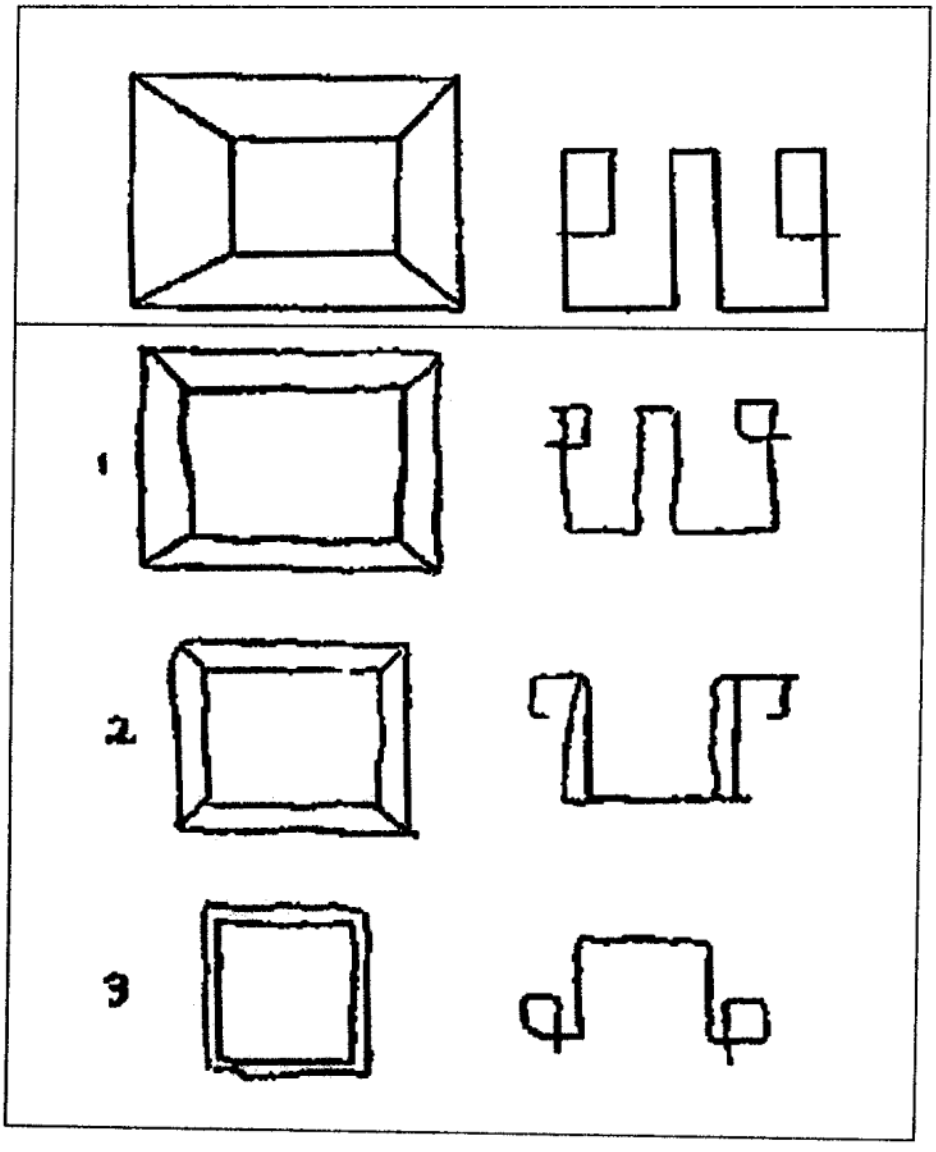


图 5 试验图形和连续再现奥尔波特实验。

这三个连续的图画是同一个孩子画的:1 号是在看完图形后立即画的;2 号是两周后;3 号是 4 个月以后。

象的影响。这里,我们发现了一个巧妙的证明来印证这一事实:我们的感觉和记忆不仅来自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且同样地来

自我们的语言习惯和文化习俗，而且过去的经验也在影响着我们的感觉和记忆。



试验物　　眼镜　　哑铃

图 6　试验物图形和两个受试者的再现——卡米卡尔、哈根和沃尔夫实验。一个受试者给图形命名为“眼镜”，另一个命名为“哑铃”。

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第三章中描述的巴特利特的试验。通过他根据同一个人在连续复述故事时发生的变化所得出的结论，巴特利特报告了歪曲的三个主要方向。读者会发现它们是简化、同化和强化存在的另一个独立的例证。

(1)“故事大大缩短了，主要是省略了”。[简化]

(2)“措辞变得更接近于现代”。[同化作用的一种特殊情况]

(3)“故事变得比原形紧凑、连贯和夸张”。[强化]

在他对个人多次(连续)复述的研究中，巴特利特报告了这同样的三个阶段，尽管他没有用我们的术语。他写道，“在试验条件下，可能发生以下三种主要的变形方式：

(1)“由于省略了看上去似乎是无关的材料，结构上逐渐整体化以及将熟悉的事物向更为熟悉的事物转化，从而使得故事变得更为简化。”

[简化和同化]

(2)“不论是整个故事还是它的细节,将被不断地合理化,直到达到一种能为所有受试者接受的,属于特别的社会阶层所关注的形态。”[同化作用和强化]

(3)“有可能产生一种趋势,使得某些事件变得占据支配地位,而其他事件则以之为中心”。[强化]

这些不同的试验被引用来证明:研究者们尽管使用了各种各样的试验物和不同的表述方法,但都反复揭示了在个体和社会的记忆变化过程中潜在的同一的基本的三大特征。

在变化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特点好像是同化作用,因为,很明显,在所有这些实验中,过去的经验、语言习惯、思维的文化模式和个人的动机情感,为所发生的歪曲形式提供了来源,决定了哪些正好被省略掉,而哪些被强化。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看看建立在所谓“投射方法”基础上的个性研究所得到的一些发现。在这些研究中,个体面对的是没有结构的,模糊的试验物。在个体赋予试验物各种含义的过程中,往往不由自主地显示出他自己的心理结构模式。在罗夏(Rorschach)测验中,给受试者看一组墨迹图,并且问他,“这像什么?”例如回答是“它看上去像一头可怕的狮子”,这个受试者显然忽略(省略)了图中许多不成形的部分。他引入的含义比存在于墨迹本身中的含义更为鲜明。他用他自己的喜好、经验甚至可能是他的恐惧同化了这个墨迹。在这片模糊的墨迹中,他所看到的是他的心理倾向使他所期望看到的东西。由于与他的个人生活完全融为一体,因此,他的报告通常谈他自己多于谈试验物。投射方法的全部用途,依赖于个人的性格气质如何使得他的感觉与其精神生活的先在结构同化,以及如何将这种混和的结果陈述出来。

投射方法可以配合各种各样的试验物使用——只要他们让

受试者把他的感想和理解告诉实验人员就行了。有一种方法，要求受试者听一个人说话的模糊的录音。实际上，这声音仅仅是由排列起来的刚刚听得见的元音组成的。当问他听到什么时，受试者可能回答："听上去好像是'小心，小心，小心'"。或者"你必须干，你为什么不干？去干活"。他按照个人的好恶来解释他所听到的声音。

另一种投射方法是主题统觉测验。给受试者看一张照片，照片上至少有一个人与受试者同性别(最好也是同年龄)。在解释这张照片时(基于照片讲一个故事)他往往下意识地直接讲出一个自传式的陈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把自己与那个同性别的人物视而为一，随后所讲述的只是他自己的忧虑和希望，仅是为了与照片相符合才稍加一些掩饰。

有关研究性格的投射方法的讨论认为：谣言本身可能成为非常好的性格测验。一个人如何对待他所听到的传闻呢？只要它有些含糊不清的地方(而不是已被确凿、现成可靠的证据所证实的)，并且只要对他的生活有着潜在的重要意义，他所做出的反应就会和在投射测验中受试者的反应相同。他从自身精神生活的色素中，撷取色彩去修饰这一故事。而且他几乎不知道，在他所讲述的内容中，有关他个人性格方面的东西可能远远多于他正假装讲述的这一事件。

创造性的添加

无论是带着一定意图的记忆，还是在复述故事的测验或投射测验中的记忆，它们和谣言之间的共同之处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是，我们所进行的这种归纳还可继续引申。

所有的精神生活都是主观意识反映外在世界的过程。确实，为了生存，我们或多或少地改变自己以适应地理环境和物质

环境;但是,我们主要是按照自己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去生活的。我们常常在我们感知的东西里掺入我们自己的个性,然后,依照我们已有的理性和情感的本性向我们自己及其他人解释我们的所感所知。

让我们来看看艺术家的例子,因为艺术家的身份可以使他去做我们无意识地在做的事。他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一个特别的方面——人的本性或人的弱点。他用他内在的统觉谨慎地思考,权衡他所感知到的东西。最后,通过绘画或文学把它反映出来。艺术家应该做到简化一切与主题无关的东西,突出他们想要强调的特征,以此来使这一切与他们自己的判断标准统一,不用说,这部分取决于他们的艺术修养,部分取决于他们自己的个性品格。

不管我们是否具有天赋,从心理学上讲,我们全都是艺术家。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常常影响到我们所感知的世界和我们所表达的世界。

从这一观点来看,谣言简直就是艺术的家常便饭。它表现的心理背景和心理机制的感知,其中我们的所见所闻必然会依照最经济的原则而被简化;由于我们的心智总在寻求事物的含义以避免思维上的混乱,因此我们的见闻也必然会充塞了各种含义;而所获得的含义也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我们习惯上对自然和人类行为的理解相符。将听到的谣言加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也就不能不对我们所传播的谣言有所影响了。

谣言是否都是假的?

我们现在要考虑一个经常会问到的问题:"谣言是不是一定是假的?"我们是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相信一个谣言?

显然，在这个问题里，有一个语义上的争论。如果我们把所有听到的二手消息都定义为谣言，那么其中有一些很可能是确实可信的。然而，当这样的一个谣言被证明是真的时，我们往往可以发现那些处于"谣言"链条中人们所掌握证据的可靠程度。他们老是声称提到的事件都来自于他们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或是曾有机会亲自查证过消息来源。我们能称这样一个验证过的报告为谣言吗？

在前言中，我们建议，在最一般的情况下，当没有确实可信的证据时，谣言应被视作仅供参考。这样一种界定有助于我们明确地把谣言从新闻中区分出来。假如这种界定方法被接受，我们就可以说：在添加阶段（简化、强化和趋向个体情感的同化）造成的曲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把谣言作为相信或行动的指导，都是不安全的。

我们的实验已经表明，即使是在比较顺当的实验条件下收集到的第二和第三手复述也是多么的不可信。而生活中的谣言可能更为走样离谱。

但是，无论怎样，每一个谣言都不可能没有它的事实内核，难道由于这一原因，就应当把它们全都保留下来吗？关于事实内核简单说来是这样的：几乎每一个谣言都是从各种感觉中的某一个种开始的；假定这一知觉符合客观事实，那么目击报告中必然会有一个可信的内核。此外，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谣言的主题是最不易变的，因此，我们通常可以相信，我们所听到的谣言中有关这一事件的内容里，似乎有点儿东西是值得认真对待的。然而，客观情况的核心如此之深地陷入到谣言传播者的主观心理活动中，以至于它所产生的结果不能可靠地用以指导实际行动。在这一章开头记录的那个日本间谍的谣言在实际意义上是完全不可信的。事实的真相被如此地歪曲，以至于无法再将它澄清了。

当然，还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决定该不该把一条听说来的奇珍异闻称为谣言。证据标准是很难确定的，特别是假如它建立在可信赖的个人学识的基础上。一群核物理学家在讨论某些核问题时，按照我们的界定方法，并不是在散布谣言，因为在他们自己的头脑中，他们全都拥有严谨的标准用以验证他们所听到东西的可靠性。然而即使是在那样有利条件下所作出的报告，也不可能完全避免添加。但是科学家们往往保持着警觉，因为比起大多数人，他们更清楚地知道一旦一个理论滑向了混有他们的希望、要求和偏见的模式上，这个理论也就变得不可信了。

夸　张

每个人都知道谣言是夸张的。借助强化这一概念，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大家所熟知的趋势。一个故事的本质，或一些听众所认为的本质，是通过强调而被突出的。任何一个谣言的关键就在于要造成一种某件事很重要的共识，还有比通过修辞上的夸张造成这种印象的更好的办法吗？假如，一个人受一个坏人的攻击，为什么不说他遭到一个疯子的攻击呢？或许，如果他与反对者之间的力量悬殊似乎是主要的内容，为什么不说有三个攻击者，或者甚至是一场围攻呢？如果某人得到了一大笔价值几十万元的丰厚遗产，那么为了把这种交上好运的感觉表达得更清楚，何不把它说成是一百万呢？如果在珍珠港事件中损失了许多军舰从而危及我国的安全，那么为了使这种说法更为有力，何不说我国的舰队已然全军覆灭？不论数量是准确还是夸张，这一声明在情感上的意图——即它的根本目的——是不变的。但是，如果把声调从中音移到高音 C，那一个声明所表达出的效果就要强烈得多。

夸张的一种通常形式是数量的夸大。在我们的实验中，我们发现，在法国的战斗场景中的那个突出的黑人是如何有时被说成是“4个黑人”，或地铁场景中的7个人变成了通常的地铁上的人群。确实，在谣言中，任何内容的数量在讲述时，很少是减少的。假如认为有些复数形式的事项确实值得保留，那它们就会被认为值得翻倍。

夸张也采取其他的形式。一个故事所含有的动机通常都突出到一点，其主要人物是一个感情强烈的人。那个无辜的中国观光者变成了一个歹毒的间谍。新来的邻居是一个真正的畜生，就因为他们的孩子总在啼哭；从附近军营来的士兵，与大多数男人相比，很可能既不好也不坏，但还是被说成是专事奸淫掠夺。

无论什么，只要对这个谣言来说是重要的，都会倾向于强化。但是，非常奇怪，偶尔也有意外发生的夸张，这样的夸张逐渐占据了中心，甚至发展到完全排除了原来主题的程度。在一个基于图2实验中，报告说一个旁观者“微微弯下腰来”。这个报告影响了以后的叙述者，并且在讲述中被强调，结果在最后的版本中，原先的事件已不见踪影，而变成了一个故事，讲一个人弯下腰，把另一个人背在他背上！这样，初始的主题可能由于对原来次要内容的偶然夸张而被完全取代了。

虚　构

人们常以为，在传播过程中常给谣言加入一些想像的细节，或者它们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这是一个误解。尽管，我们当然会发现许多捏造的理由和凭空添上的环境细节，但它们的出现似乎都只是为了强化。那种既不为前后一致的目的，也不为了强调谣言的重要所作的虚构很少发生——从来没有在我们实

验的情况下出现。

巴特利特想在他研究记忆时所作的复述、再写和再画的实验中找出虚构成分，但也失败了。但是他想知道，在口头传播中，是否会有更多凭空捏造无关的倾向。或许，在他的脑子里，还有一个无可怀疑的事实：一个讲故事高手，通过节外生枝，来维持他充满了悬念与疑团的措辞，为他的故事增色，以事铺陈。但是，这种铺陈在谣言传播的全过程中却很少发现。哪怕是一个语言大师在大肆渲染，通常也总是呈下降趋势的。总的来说，谣言会缩减，变得简练，紧凑，常常警句似的。虽然是适得其反，但所发生的虚构确实是出于用简化来强调主题的目的。根据从巴特利特的研究中选出的图 3，在图形的变化中显示出一种虚构，然而受试者在他的复述中只是强调了对他自己的构想的基本简化。

或许会有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发生了虚构，但还没有对这种可能性做过专门的研究。有时，我们发现，在经历了一次巨大的精神考验之后，比如说一次严重的车祸，或一次家庭危机，会造成一种强烈而持久的趋势。人们深深地陷入这一事件中苦心琢磨它，没完没了地议论它，幻想探究出所有可能的结果。对每一个新来的人，他们都增加更多相关或不太相关的细节。他们讲的是他们所想的，翻来覆去反复推敲后面的情况，并顺着这条思路编出越来越多合情合理的东西。因此，这种强烈的锲而不舍的情感很可能为真正的虚构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使人们迅速地陷入到这一不幸事件中，感同身受。但是，后来的讲述者用这种方法去强化和简化谣言，使整个谣言浓缩，而不是扩增。

就这一点而言，应当对传奇故事的发展变化进行专门的研究。传说一点也不简短。北欧漫长的冬夜不欢迎一个简短的传说，相反，还助长了辞汇的铺陈。这一现象或许是一个特例：一

个中心人物或一组人物使得许多相关的传说汇聚到一个焦点上来。传说变成了社会化精神的一部分。这不单单是提供了一个“仅供参考的建议”,而且也超出了简短谣言这一类的范围。然而,我们知道即使在民间传说中,也存在着把谣言零散片断归拢为谚语化的过程。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就是一个非常简短的传说;还有牛顿和苹果。尽管可能存在着特殊原因使得传说被扩展,但简洁的趋向是决不会消失的。

对一个传说是缩减还是扩增,可能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巴特利特提出了一个事实,在他的实验中,印度受试者比盎格鲁撒克逊受试者更着意详述和修饰一个故事。同样,中国的谣言也会有所扩展以强调它们的内在含义。因此,从我们的实验和所收集的日常谣言来看,在某种程度上讲干脆可能是美国人偏好简洁的产物。

凝　缩

我们的记忆太不稳定了,以至于不能一成不变地记住每个个别的事件,把它们分门别类地保存起来,以备将来使用。这种“仓储”式记忆理论早就被丢弃了。

通常某一次经历过的事件和先前相类似的事件混合起来,从而形成了一个总体性记忆。当发现把两个不同的人记混了,或者一个完整的童年回忆变成了完全混乱而破碎的记忆片断时,每个人都会感到震惊。梦的凝缩是最为大家所熟悉的:许多事实上毫无关系的经验片断,被巧妙地融为一个怪诞的故事,它的主要内容是忽然涌现出来的一堆联想,十分古怪地组合在一起。

在实验中,巴特利特发现,没有一个受试者不把原先彼此无

关的试验物搞混的。[1] 在我们自己的实验中，尽管没有用复杂的试验物，但我们还是在同化作用的过程中看到各式各样的经验的混淆。

日常谣言可能是，我们所听到故事实际上可能是好几个相类似的情节的混合版。尤其是那些陈词滥调可被看做是凝缩的一种。种族、宗教或其他社会集团成员的不同经验可能被混合成一个不敢恭维的概括总结，它被不加区别地适用在上述集团的所有成员身上。一个以"有一个犹太人……"开头的谣言，几乎已经确定了下面的主题。老生常谈又开始了，接下来就是一个大杂烩，由许多早先那些糟糕的谣言和传说灌输到脑子里的概念拼凑而成，除此以外，再没别的了。

固定类型的人物有着固定类型的故事模式，这种搭配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从中也能看到一种特殊形式的凝缩。如果要讲一个色情故事，就会和胸部丰满的梅·威斯特，安沙尼，卡尔·库利奇，巴瑞·迈卡逊，第尔·依莱斯波及其他过去和现在的这类人物挂上钩，作为挡箭牌。理由是，这样一个故事与一个知名人士扯上关系会令它增加确定性与意外之意。所有讲故事的人都想尽办法把故事说得活灵活现，亲眼所见，来突出故事的主旨。

习 俗 化

尽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个人的习惯，但绝大多数习俗还是得自于我们的外界社会环境。当谣言传播时，它不可避免地会除去它特殊的装饰。通俗的语言用来传达通俗的意思。不熟悉的用语，单调的措辞手法，个别的解释全都会删除，当不同的个人传播一个传说时，只有最少的通俗的东西会保留下来。

---

① 巴特利特(1932)，103 页。

故事用语简化到受教育程度的最低限度，而且极少华丽的语言，才能成为传播链条中的一部分。

在下面的事件中能看到一个语言类型向普通层次同化的例子。一个外交官家的女主人打算招待一个外交官。她告诉女仆，她希望把每件事情“都准备好，因为瑞典大使要来吃饭”。在向一个朋友讲述这件事时，女仆说，“天啊，首相要来吃晚饭，他们甚至不许把雪茄从桌上撤走”。女主人至少知道两种“大使”，而女仆只知道一种。她只是根据她自己的语言模式去同化她所听到的东西。

这一故事中的女仆不仅用自己通俗的说话方式改变了女主人要求的含义，而且还依据她自己的，当然，同时也是她所处的那一类社会阶层的价值标准，添上一个合乎礼节要求的说明。习俗化过程中所采取的称赞或批评的方式往往以谣言传播的那一阶层中盛行的标准为依据。

巴特利特也曾讨论过另一个在感觉、记忆和复述三位一体的过程中习惯化的重要例子。他的这个例子是关于一个来英国访问的非洲斯威士部族的人。回国以后，他称赞英国交通警察的友好。为什么他有这种感觉并称赞他们是友好的呢？巴特利特解释说，因为斯威士人用举起手的方式来欢迎客人。这是一个熟悉的手势，在异国他乡意味着热情。这是这个访问者所看到的能马上纳入他已有社会体系的少数几个事件中的一个。它迅速产生了一个印象并效果持久。

所有的谣言都易发生这样的文化同化作用。巴特利特认为，在他的实验中印度受试者与英国受试者相比，除了更爱通过修饰和夸张强调谣言以外，还试图按照他们的是非标准插入一个极具特色的转折，从而与印度教神话所惯有方式保持一致。

因此，用不同的方法，文化想方设法对一个谣言既予以简化又加以润色。凭着它的习俗化的力量，文化成为决定歪曲基本

模式的两个重要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个体的感觉、记忆和复述过程中所固有的倾向，到目前为止，对这一方面我们一直给予了较多的关注。在下一章中，我们将研究谣言融入社会生活的其他方式。

第九章 社会中的谣言

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在关注谣言个体传播者的心理过程。但是，谣言像人的每一种说话方式一样，基本上是一个社会现象。在某一时刻，它不过是死水微澜；换成另一个时刻，它却激起轩然大波。有时，仅仅是一小撮人，但是，有时是上百万人卷入其内，直到一则谣言最后偃旗息鼓。一个特别的谣言主题似乎能无穷无尽，并在一系列的历史时期中以不同的面貌反复出现，这也是毫不稀奇的。一种谣言的变化形式可能经过流传被证明十分有效，以至于它被固定为一个能永久流传下去的传奇。然而，无论覆盖面宽或窄，持续时间长或短，它的影响是和平的还是破坏性的，谣言话语存在于每一种文化的篇幅中。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没有谣言。

谣言和历史

古罗马的皇帝被谣言折磨得非常痛苦——痛苦到他们都任命了公共的谣言监察（他们被称作 delatoves），他们的职责便是混在人群中，然后回到皇宫报告他们所听到的。每天的闲谈被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公众情绪的晴雨表。如果需要，delatoves 能够用他们自己编造的谣言发动一场反击战。心理战古已有之。

公元 64 年的罗马大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按照查德

威克(Chadwick,1932)对于证据的分析,哀伤的民众接受和散播了这一谣传:尼禄,那个臭名昭著的元首,即使他没有亲手点燃这场大火,至少也为火焰燃烧的美丽而得意,甚至写诗赞誉。这一没有根据的谣言对尼禄很不利。为了自卫,他自己发起了一个反谣言造成了这样一个印象,是比他更不招人喜欢的基督徒在城市里放了火。结果这个版本的谣言似乎更适合当时的成见和恐惧。这件事"正像"被人鄙视的基督教徒的一贯的所作所为。这样,在这些合适的替罪羊身上,民众发泄了他们的愤怒,忘记了一开始他们的敌意是针对尼禄的。

在这一事件中,假定事实确如查德威克所言,我们发现谣言典型的教化力量在起作用。大火的起因不详(不明确)。它对于人民生命安全的影响(重要性)在于灾难的严重程度。他们既渴望一个解释也渴望解脱即将带来的确定无疑的责难。对他们的残暴统治者长期以来的仇恨形成了一个定式。然而,对于权力的恐惧和长期顺从的习惯使他们更愿意向一个比较弱小的替罪羊,不为人所了解且极不为人所信任的基督教徒复仇。这样,就像对待各个历史时期中无反抗能力的少数派一样,受挫和狂怒的民众向基督徒们发泄了他们的仇恨。在这个事件中还有一个有趣之处。尽管涉及到尼禄罪责的谣言一时被忘在了脑后,但他后来还是得到恶报。尼禄关于大火的诗歌著作成了历史传说并最终成为笑柄。这样一个狠心的暴君,在罗马大难临头时仍载歌载舞。他是否真的这样做了无关紧要;那所谓的作品却是他性格的一个象征。生动、深刻,隐喻真相,这一幕永远连着他的名字。既然目睹芸芸众生在水深火热中煎熬中却无动于衷的情况并非罕见,因而我们也就屡屡有机会运用这些从恶毒诽谤中生发出来的尖锐格言了。

谣言也使苏格拉底丧命,他被指控使雅典青年堕落,并引诱他们背叛亵渎神灵。中世纪宗教战争和十字军东侵时期,充满

了奇闻轶事、不法行为和战利品的夸大传说。稍后一点，探险家遍布全球搜寻传说中的财富和永葆青春的喷泉，或是为了能看一眼传说中的海怪。罗马教皇的宗教裁判所的情况和教皇的私人生活成了无休止的谣言源泉。毫无疑问，其中的一些有助于为宗教改革打下基础。

由此我们可能会问，人类历史中有多少事件，可以被看做是一些关键人物对当时谣言的反应？我们猜想，太多了，因为直到最近，全世界的人们除了从谣言中获得消息外，没有其他方式可以获得消息。报纸、电报、收音机是后来的发明，在它们产生以前，公众不得不依靠旅行者带来的口头传闻，保尔·瑞威尔靠着这些来宣布临近的危险，或通过城镇上宣读公告的人散布他自己的日常新闻。只有很少的政治家和统治者收到确实不是来自谣言的手写密封急件。在我们经初步的实验所获得的经验中，我们看到在第 4 或第 5 手的描述中有多么要命的歪曲，而这种歪曲也会出现在第 1、2、3 手描述中。那么在历史的进程中，那些对民众乃至他们的领袖产生很大影响的外部世界的图景又该是多么的不准确呀！

相比之下，今天我们的证据来源非常可靠。邮电、印刷、收音机、电报和航空快件，已经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我们对谣言的依赖。几乎没人希望自己消息闭塞。历史的进程今后将更多地落在更可靠的事实基础上而更少地依靠相信谣言，这一趋势几乎已是必然的了。

然而，我们不能断定，今天生活中的谣言网就比以往少。关于战争、大灾难、审判、探险，公众舆论的事实真相比以往知道得更准确、更迅速。但是正如我们的眼界不断开阔，未知的领域相对也扩大了。那些引起我们注意的事件，诸如中国内战、五胞胎的诞生、女演员的私人生活等等，一方面扩展了我们的兴趣范围，另一方面，我们所获知的消息，尽管部分是来自正式渠道，然

而仍然是不完整、含糊不清、连官方都尚未完全知道和搞清楚的。我们仍然用谣言来构建我们不断扩大的外界环境。此外，不管现代的发明创造能力如何，情感和认知的需要与我们的祖先没有什么两样。在热衷于确切知晓我们个人生活中的未知秘密方面，我们和他们是完全一样的。像他们一样，我们常常相信传说。

谣言和传说

一个传说可能被认为是一个固定下来的谣言。更确切地说，它是道听途说中一再出现的某些传闻中的不同寻常的部分，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歪曲和变形后，它不再变化，一代又一代地传了下来。正如拉·比亚和法恩斯沃斯(La Piere and Farnsworth, 1936)所言，“传说就是已经成为一个民族口头遗产一部分的谣言”。从语言学上讲，这两个概念可以经常交换使用。[①]

为了变成传说，谣言必须处理好那些对后代人有重要意义的内容。例如关于国家诞生和荣誉的话题，还有关于出生、婚姻、死亡的话题。无论什么，只要具有广泛和普遍的意义，就可能成为我们民间传说的一部分。[②]

---

① 中文以一个相同的基本术语(传)来称呼谣传和传说。范·朗金豪夫(Van Langenhove)的著作，尽管名叫“传说的形成”(1916)，实际只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关暴行的谣言。

② 有时，一个年代久远的传说，虽早已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但最后可能湮灭，取而代之的可能只是一个遗留下来的民间俗语。下面的例子是刘英小姐提供的，从中国的民间传说中举例证明了这一变化。

现在的说法是这样的，月下老人专司安排人们的婚姻，把红绳系在他选择的伴侣的足上，以此来象征他的选择。尽管这个说法广为流传，它最开始的形式却被大多数人忘记了。历史上，它好像产生于一个更完整的故事，流传在一千年以前，仅保存在很少的民间传说中。更早的传说是这样的：

传说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也是由于它以事例说明了人类的根本天性。尼禄的附庸风雅不仅表现出他自己的特色而且使所有的人都对他感兴趣。西西弗斯受到诅咒把一块巨石一次次推上山顶，又眼睁睁看它一次次滚回山下。今天，这个传说被用在遭受同样恶运的不幸的人的身上。在北欧的国度里，不管冰天雪地，圣诞玫瑰据说总在圣诞节前夜盛开，以此表达在那个节日里人们心中的喜悦。

这样，传说保存了下来，因为它们把不死的精神具体化了。它们提供了生命持续之谜的答案，或者，潜移默化地美化了人类的情感。肯姆波尔·扬(Kimball Young)谈到在传说的帮助下，“世界呈现出意义，而无需不断地被重新塑造”。扬补充说，一个传说提供的结构使我们对意识形态的传续感到放心。流传在北欧的那些充满了吸引力的英雄故事，带给听者的是坚定的意志、对祖先的崇敬，并给宇宙间那些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一个令人满意的解释。当人类蒙昧而艰难地生活在大地上时，这些故事像所有的传说一样成为解释一切未知事物的工具。

涉及原始力量，宇宙哲学，宗教信仰的传说，学术上称作神话。这些故事所表现的人生哲理只为单个的文化集群所理解，而且它们很少发生什么变化。尽管关于创世、来生、救世主这样

唐朝的郭威，旅途中在一个小客店过夜。他见到一个老人在月光下忙于翻一本书，于是便上前询问。这个老人告诉他，这本书包含了世界上所有人的婚配。他们一块来到了闽城，遇到了一个瞎眼女人抱着一个小女孩，老人指着小女孩说她就是郭威未来的妻子。郭非常生气，就命令他的卫士去杀了这个小孩。他们打了这个孩子一顿后逃跑了。14年以后，郭威娶了一个非常显赫的官员的漂亮女儿。郭非常爱她，但这迷人的新娘总是在眼眉上戴一朵珠花，他感到很好奇。后来他了解到她就是那个被他的仆人痛打了一顿的小女孩，那珠花是为掩饰伤疤。郭很庆幸他的可爱的妻子没有丧命，他更加爱她了。从那以后，他第一次遇到那个老人的客栈就叫做婚约客栈。

可见，这个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的传说，在最初还保持着这一完整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年月里变得进一步简化和强化，只剩下月下老人和他主管婚姻这个遗迹，不知怎么又和象征姻缘的红绳这样独立的东西融为一体。

的故事有多种版本，但每种版本都限于在它自己的文化范围内流传。这些代代相传的故事总是用明确而具体的语言来表达。不论是传说还是谣言都不包含深奥的语言，即使是当它表述不寻常主题时也是如此。神话所涉及的主题都是那些人们曾不得不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然而有关它们的线索永远是模糊不清的。

既然关于宇宙的问题由来已久，我们发现传说比谣言更能满足人们的需要。然而，也有在短时期内存在的谣言用以临时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和减轻对宗教的迫切需求。所出现的这类谣言，每每是关于即刻降临的世界末日、弥塞亚的到来，或神奇超人出现在某个圣地，或是出现在天空中的一些奇异现象。还有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的谣传，说天使出现在弗兰德战壕的上空。

简化、强化和同化的变化产生了传说，这在民族英雄们的历史故事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在有关亚瑟王、弗德瑞克·巴巴罗沙，阿克的琼的英雄业绩的记载中，史实与传说已不可救药地掺杂在一起，其中还是传说占了上风。除了偶尔冒出个历史学家，普通大众中没有一个人能从这些故事里发现真正的事实，而且似乎也没有人打算这么做。传说中所凝聚的勇者精神可使人们对英雄的渴望得到满足。“为什么不?”诗意的灵魂问道。例如，阿克的琼难道没有体现出人类所具有的最大程度上的恢宏志向与执著信念吗？一个象征了崇高理想的传说，难道就比不上一个成天忙于从被同化和强调了的史料中挖掘纯粹史实的无聊的批评家吗？

由一个历史人物变成一个传说中的人物是用不了多长时间的。我们国家的那些卓绝人物，尤其是那些在现在这代人出生以前就已去世的人，和那些歌曲和文学作品歌颂的人，现在都已成为神话中的人物。约翰·史密斯和波卡洪塔丝（印第安公主）

的故事就没有多少事实根据。在史密斯上尉最初的航海日记中，几乎没有提到公主。十六年以后，当他写他的总传记时，他给了她中心的位置。我们不敢说当他记忆中真实的事件变得模糊时，他把他的故事虚构到什么程度，但是，显而易见，后来的作家和渴望冒险故事的公众更喜欢这个故事的浓缩和强化了的版本。

童年时听到的乔治·华盛顿和樱桃树的传说被我们珍藏在记忆里。其原因部分在于它的人物形象单纯、坦诚，那时我们都是一些小小的爱国者，因此在感情上不免对这位品德高尚的国父产生了认同。但是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是有疑问的。它来自一个牧师，他说他是从一个老妇人那儿听来的，她作为一位远房亲戚有时去拜访华盛顿一家。一个举国皆知的传说只有这么一个薄弱的基础！

但是，在这儿，诗意的灵魂又在辩解。“为什么这么死扣字眼呢?”他抱怨道。“乔治·华盛顿是一个诚实可敬的人。这个故事与他的为人是相符的。让我们用它来寄托我们对这个人的尊敬和对他的美德的理解吧。用不着卖弄学问！”

谣言和传说的隐喻意义

不论是传说还是谣言，它们的讲述形式是简要和明白的。一条船葬送了1000多条生命。华盛顿说，“我用我的小斧头砍它。”雷神猛挥他的铁锤制造雷电。这样的解释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就被当做事实来讲述(也就是对当前话题的一个参考)。因此，当我们口头谈论谣言是如何偏离了原始证据发生了歪曲时，所使用的只是一个字面上的标准。而要判断它其中的含义，则要把它与客观事实——即实验中的素材作比较。

但是，谣言真是有意显得确定无疑，消息灵通吗？只是它的表达方式使它显得这样罢了。然而，再深入地看一看，不论是传说还是谣言在它们的讲述形式中经常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它所

意指的可能比它表面上所讲的要多，隐含的意义可能更重要，更确切。如果我说，犹太人拥有华尔街，他们逃避服兵役，或在军队中获得舒适的工作，不管表面如何，我的本意并非是想告诉你这些事实，而是向你倾诉我对犹太人的不满。实际上我正在作出评价。莫里斯(Morris, 1946)将会把我的谈话叫做诗意的评价。或者，假如我以讲述创世、民族英雄或来世神话的传说来重复一个文化价值观，同样，我也不是意在把这些故事讲述得明确无误，有根有据，而是借助神话进行一种评价的行为。

就谣言所表现出的消息灵通且意有所指而言，它们总是，至少一部分，是错误的。由于这种企图总是存在的，因此它们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虚伪的讲述方式。但是就它们试图进行评价而言，它们又的确较为准确地表达了讲述者的意图。

随着谣言变得越来越格言化或越来越传奇化，它们也越来越多地表现出这种评价和隐喻性的特征。鸵鸟把它们头埋进沙子里，从传递消息，指明事实方面来说，这是一个虚假的寓言。真的鸵鸟并不那样做。但是，这个寓言比喻许多人对迫近的危险视而不见倒是真的。阿拉斯加是被坚冰覆盖的地区这一说法，事实上是不真实的。但是假如我想找个合适的比喻来表达我的某种想法时，等温线是不会制止我的。我会毫不脸红地讲"它像阿拉斯加一样寒冷。"

那个探险家史特芬森(Stefansson, 1928)，讲了数不清的不可信的谎言，这些谎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并且不顾与之相反的证据，已经成为文明世界中流行病。他把这些民间传说的结晶称作"谬误的标准化"。但是，在我们对这种已被标准化了的谬误着手批判之前，我们先要决定其中所谈及的谬误占了多大比重。狼是成对或以小的家族群活动的，很少有人对这样的事实感兴趣。他们根本不是真的关心动物学上的狼。在他们的讲述里，他们需要的是一个暗喻；他们寻求的是一幅群狼蜂拥而

至的吓人场景。狼群用在此处非常合适，不管这个事例中真正的科学事实是什么。

这样，许多传播谣言或复述传说的人，至少有一半都知道，人们不会把他们所说的每句话都当真，哪怕他们说的是真话。他们只是大约认识到自己是在用生动传神的方式来证明某种观念。当文学家们凭借想像力，把一个普通的事实具体地表现出来时，他们就在从事着这种工作。谣言讲述有时是半自觉地虚构故事。尽管如果从表面意义上看，我们所讲的情节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我们用暗示的办法，就会弄假成真。例如，我不知道在原子弹爆炸目标周围几英里范围内，是否会造成潜伏的癌症并引起在此之后的死亡，然而在我的谣言的传播过程中，我说它会造成时，我就是在意味着某些事情比我说的情况更严重更真实(或许我自己也半信半疑)。我说："原子弹真是一个可怕的东西！"而谁会怀疑，我用诗意式的评价方式已使得我所持有的观点都得到了证明了呢？

因此，谣言与传闻主要是表面意思，而不应像传递消息性的陈述所表现的那样，也不应像评价性的陈述通常那样地被逐一判断。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保护每一个人讲述他自己的感受的权力，而假如他喜爱用谣言做比喻，他为什么不能这样做呢？

由于听众在听到一个谣言时，并不是把它当成讲述者的一种评价倾向，而是当成了一个有根有据的事实，这种奇怪的现象就引发了谣言的社会问题。尽管讲述者所说的不过是他对一个偶然事件和一些道听途说加入了自己某种情绪和认知的一个混合物，可如果听者不留心就会把它当做已证明了的事实。这样，他就把客观事实与表面意思混为一谈。要想对谣言采取适当的批判与审慎的态度，需要很高的洞察力。

谣言的分类

既然谣言和传说渗透在我们的社会关系之中，那么有理由问：是否存在着能将谣言加以分类的可操作的原则呢？或者，“对当前事件仅供参考的说法”可能难以计数以至于这种分类的工作根本就无法进行呢？

对这一问题的答案，同时还有关于社会及心理学现象的规律的答案，在于分析者的兴趣。根据一些限定条件和特殊目的，把在任何一段时期内流行的谣言加以分类，还是有可能做到的，当然，假设手头要收集到一套完整的资料。但是并不存在一个放之于四海皆准的分类方法。某个进行研究的学者的兴趣可能在于：(a)速度，周期，或谣言在传播中其他临时性的方面；另一个学者的兴趣则在于：(b)谣言涉及的主观因素；第三个在于：(c)意识形态和可能潜藏在当前流言后面的动机；第四个在于：(d)社会影响，是否有害、有益、或无关紧要。其他的研究者更可能会应用其他的分类方法，以此来区分：(e)地区性谣言和大范围的谣言；(f)新谣言和旧谣言；(g)有可能真实的谣言和不可能真实谣言的；(h)长期持续的谣言和短期内存在的谣言。谣言这块馅饼可能有许多种切法。

现在以上面列出的前三种分类原则为例。

a. 临时性标准已经被一个俄罗斯社会学家伯绍(Bysow, 1928)所应用。他说，首先是在暗地里蔓延的谣言。这种谣言发展得很慢，而且在一个神秘的气氛中以耳语的方式被谈及，直到几乎每个人都知道。像预言不幸的卡桑德拉谣言就是这一类的典型；还有像关于国际银行家、军火商、政府官员、劳工领袖这类人的阴险狡诈行为的敌意性谣言通常也属这一类，它们的传播者形成一个无穷无尽的链条，把它们逐渐播散开来。

其他的谣言都具有迅速传播的性质。它们播散起来像是野火，因为它们往往是关于某一正在迫近的威胁，或是一个被迫切要求的允诺或保证，因此，在令人惊异的短时间内吞没了整个社区。它们包括暴力的谣言，意外事故，大灾难，或战争时期的重大胜利。这一类谣言如果出现在高度紧张的气氛里，可能会激发迅速而又激烈的行为，因为它们基于恐慌、愤怒或惊喜这类强烈的情感。

最后，在伯绍形象的辞语中，还有一种潜水式的谣言。它们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当形势为它们再次出现提供充分理由时，它们有时又重新浮出水面。除了心理上的不同点之外，在一次大战和二次大战中，人们对谣言的关注是相类似的。从 1914 年到 1918 年出现的谣言好像潜入了水中，直到 1939 年至 1945 年间的焦虑情绪把它们重新又带到了水面上。

这种“潜水式”谣言可以从两个途径来解释。或许，它们在某些人的大脑中处于休眠状态，数年后，当周围的情况和第一次听到这个谣言时的情况相似时，这些人用不着确认就能把它们回忆起来。或许，前后两个谣言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连续关系。只是类似的情况下人们的需要就可能引发相似的传闻。比如，在战争的任何阶段，往井水中投毒这种来自敌军的威胁，似乎都不是不可能的。焦虑的人们完全依赖于他们的供水系统，很容易将他们的恐惧强化和戏剧化，却并未想到自己这样做，是重演了谣言史上大家都很熟悉的一页。

b. 主题分析是另一个分类的准则。这里研究者只统计涉及某一指定主题的谣言的数目。例如，在一般情况下，我们可能会寻求那些涉及政论、疾病、性、外交关系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谣言所占的比例。的确，主题清单可能非常长以至于用这样一个方法操作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职业阶层和受教育程度几乎必然会表现出明显的区别。

然而，在战争期间，这一办法更实用一些。的确，因为那时几乎所有的谣言都在某种程度上受战争影响，都是广泛传播的。加拿大的心理学家 J.A. 依瑞文(J.A. Irving, 1943)发现在他的国家里，战时谣言涉及 6 个主要的题目：(1)惊恐，厌恶，死亡；(2)浪费和奢侈；(3)入侵，突袭，对安全的威胁；(4)反英情绪；(5)政府关于定量配给，战争军费，和征兵的意图；(6)所谓的战争指挥无能。这种分类的价值可能只出于一个直接的目的：鼓舞士气和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这种方法至多只能表明人们在谈论什么，但它并没有深入到谣言传播者的动机里，也未能实现揭示任何谣言的普遍规律的目的。

c. 在第一章里，我们引用了一个更为明显的心理学分类准则——这一准则建立在谣言所反映出来的激发性紧张状态的主导形式上。读者会回想起对发生在 1942 年的 1000 则谣言的分析表明几乎所有的谣言都在表达敌视、恐惧或期望。也确实有那么一些谣言仅仅是较明显的心理紧张情绪的反映，是一种好奇心。但与此同时，那些揭示出仇恨、恐惧和期望的对象的内容分析也涵盖于其中。

根据激发性主要动机对谣言进行分类，在战时或许要比在和平时期更容易。但是，即使在战争期间，仇恨、恐惧、期望，三分法也是过分简单化了。确实，一个可怕的谣言(譬如，关于敌人暴行)可能包含了性的兴趣、冒险的成分，以及承受力道德崇高感。谣言同化的各种动机的混合状态是个人问题，要想解释为什么某一个人总是偏爱某一类特定的传闻，可能需要对这个人做一个临床研究。由于诸多动机的混合可能助长某一谣言的传播，因此对谣言的任何心理学的分类都不可避免地过于简单和粗糙。

热爱和憎恶的融合

这样，我们断定我们绝不可能发现任何谣言只和一种情感或只和一个认知趋势有关。同化作用在单一的基础上是不起作用的。即便是一个有着较好结构，表面上比较简单的传闻，也都可能用于解释、评价或是对复杂情感的宣泄。

这一点从一个 1943 年在南方许多州里流传的“伊丽娜俱乐部”的古怪传说中可以看到。这些故事的主题是，一大批黑人妇女，尤其是家庭仆人，在伊丽娜·罗斯福的精神感召下组织起来，她们的目的是反抗现存的社会秩序。这里很明显地融合了对新自由贸易主义的敌视和传统的敌视黑人的情绪。然而，各种动机的混合发展得更为复杂。

关于伊丽娜俱乐部的谣言有许多版本，这些版本明显地表现出对身份颠倒的恐惧。黑人们被说成不仅在私下里抱怨而且已经处在公开反抗的边缘。他们威胁要推翻、颠覆社会等级。为什么？因为白人谣言传播者发现这些谣言在某种程度上表达和揭示了他们对自身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某种程度的不安全感。在这种莫名焦虑的困扰下，他们用指责黑人反抗来为神经过敏辩护，并从警告他人当心受威胁的行为中得到一点可悲的安慰。

然而我们必须进一步探索。一个有关地位颠倒的谣言，通过间接的方式承认了种族间的这种关系，而不是这种社会现状是可被接受的。但是，按照美国的信条，这种不公正的社会现状不应该是永久不变的。如同麦道（Myrdal，1944）所指出的，每一个美国人都信仰和热望比现有水平更好的种族关系。在心里，他赞成奴隶主巴迪克·亨利早在 1772 年就写道：“我绝不，我不能，为之辩护。”而与此同时，绝大多数白人仅仅允许他们自己稍稍意识到他们的道德困境。由于释奴宣言仅仅是名义上解放黑

人，在巴迪克·亨利死后 1 个半世纪，冲突依然存在。如果白人们不得不诚实地面对这个问题，他们将被自己相互矛盾的信仰撕得粉碎：一面是美国的信条，一面是白人至上的利己主义。

由于不愿面对两个由来已久的信仰之间这一尖锐而不可调和的矛盾，许多白人回避、不安，或试图作出合理的解释。为了逃避歉疚，于是急切地抓住谣言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正如关于伊丽娜俱乐部的谣言所说，假如黑人极具攻击性，图谋违法，粗俗凶暴，那么他就没有权利具有平等身份。他只能期待我们像对待入侵者、掠夺者、敲诈者一样地对待他。他必须呆在他该呆的位置上，如果真的有不公正的事发生，那么，我们的耐心与宽容会大大地补偿他的。不管怎么样，必须这样对待他——仁慈然而强硬。用这种心理上迂回的策略，顽固的人就可以逃避他感情上的内疚。

逃避内疚同样可以在无数关于涉及黑人犯罪和不忠诚倾向的谣言中被察觉出来。一个战时的谣言说，黑人没有像白人那样迅速地参军，因为当局害怕让他们手上握有枪。甚至关于黑人愚蠢、易受骗和懒惰的幽默故事，也同样有这种定义的功能；另外还有那些数不清的黑人性侵犯的情节也是如此。所有这些都趋向于缓和白人的内疚，一个黑人又不忠诚，又犯罪，又滑稽、愚蠢、粗俗、堕落——除了像我们现在做的那样，把他们限制在他们该呆的位置上，我们还能做什么呢？平等的理想可能全是理论上的。而且它决不意味着对罪犯、痴呆或黑人也一视同仁。

敌视黑人这种偏见的最大盟友是有关性的谣言。黑人们一再被表现成图谋跨过肤色的界限制造种族杂婚的罪犯。谣言常常涉及的是黑种男人和白种女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更为普通的白种男人与黑种女人的私通。有许多关于强奸和企图强奸的谣言，或不那么耸人听闻的版本，表现黑人接近白人妇女，在大街上尾随她们，试图握她们的手等等。一个战时的谣言说，没有

服兵役的黑人(不忠诚的主题)对即将去打仗的白种男人们说，黑人们回家后将"照顾"白人妇女(性的主题)。尽管有关黑人的性的谣言在南方较为普遍，但在北方也时有所闻。在一个素以种族关系比较友好而著称的新英格兰城市里，一个区域性的谣言四下里传播，去"解释"为什么一个餐馆的洗手间被用木板钉死了。所谓的原因(完全是编造的)是这样的：两个黑人把一个白人妇女带进那个洗手间并且强奸了她。

在这里，引起谣言的动机涉及深层次的问题。在美国清教徒的传统中，所有关于性的事件，很可能会引起一个很强的情感冲击，而且出于这一原因，非常容易在感情色彩强烈的其他地区流传。性，作为时下话题中的热点，是谣言永远不会放弃的一个源泉。像社会地位的问题一样，它也是沉重的犯罪感的一个源泉。既然我们永远也无法接受自己所犯的性过失而导致的谴责，(就像我们因违反美国的信条所犯下的罪一样)那最好去责备其他确有过错或只是假设他犯了错的人。有关性的谣言与有关少数民族谣言有共同之处，二者都反映出对负罪感的逃避。这一共同点使这两种谣言很容易结合在一起。为了逃避内疚，何不把对性犯罪的指责推到那些同时也威胁着我们的社会地位的人身上呢?

在内心深处，许多人感到不安全。无论是在他们的地位方面，还是在他们未来的经济状况方面，或是在他们自己的性道德方面。所有这些，在他们的生活中是隐秘而且重要的。这些致关重要的利益是不可分开来对待的。对一个人的威胁就是对其他人的威胁。因此，充当替罪羊的黑人不仅被视为在日常交往方面傲慢自大，而且在求职竞争中排挤我们，并且有远胜于我们的性能力，而又比我们更少禁忌。从他身上我们感受到了所有掠夺、竞争和放荡的行为，而且如果我们对自己不加拘束的话，也很有可能会陷入其中。他就是罪魁祸首。即便我们也并非无

可指摘，但他们的种种罪状（正如各种谣言中所列举的那些）很明显比我们的更为恶劣。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小小的瑕疵而内疚。

随着这些推理的继续进行，我们可能极为荒谬地发现，黑人身上这些“兽性”的品质却非常令人着迷。假如真是如此，我们就必须严厉地压制这种魔鬼般的吸引力，并且通过“保守复古方式”（诸如反对那些不为我们所允许的魅力的存在）更为激烈地与那些罪恶作斗争。为此我们表现得凛然而不可侵犯，坚定不移地反对种族融合。正是这一想法使我们充满了惊恐（不是吗？）。如果这信念遭到侵犯，那么通往道德沦丧和经济衰败的道路就会向我们敞开。我也许能够容忍自己会败在那些黑人或别的歹毒的陌生人手里，因为在我的潜意识中，我多少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邪恶的密友。

尽管对反黑人谣言的分析如此复杂，但对于由情感与认知二者混合在一起的那种错综复杂，却并未夸大。把一些邪恶力量拟人化，对人们来说似乎已成了一个规律，而且总把它集中在那些有着明显区别的，群聚而居的少数人身上。

在今天，最常见，然而并非是惟一的“魔鬼”就是共产主义者、犹太人和黑人。既然加在他们身上的指责是过分的，技术上我们把他们叫做“替罪羊”。

谣言受众

每一个谣言都有它自己的受众。金融谣言通常在那些财运受市场波动影响的人群中流传。关于征兵法，所得税率，或关于住房发展计划的谣言几乎都是在那些可能受影响的人群中传播的。学校的孩子们，全都热切地盼望放假，他们会急切地了解那些关于尚未决定的“教师会议”的消息，或是有关对校舍进行必

要修缮的消息。职业阶层和社会阶层全都有他们各自的敏感之处。医生、牧师、飞行员或男性聚会会卷入通常与这个阶层利益的热门话题有关的谣言。同样，裁缝俱乐部、桥牌协会、友好团体也会如此。哪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哪就有谣言公众。

然而不同的人对谣言的敏感性也惊人地不同，即使是在种族偏见最为严重的地区，也并不是每一个美国人都相信敌视黑人的诽谤的，每一个村庄都有拒绝听信当地传言的居民。在一个既定的共同利害关系中，即便处于极为混乱而又严重的情况下，也只有那些轻信于人的人才会加入到谣言传播的链条当中。

所谓轻信于人，就是指相信一种有证据但又不应该有证据的某种说法。一些人习惯于批评性地验证所有他们听到的东西。那么，在语义学、社会心理学方面受过训练，或由于其他原因在思想上有多疑习惯的人，他们像著名的密苏里人一样要求可靠的证据。

在另一方面，易于轻信的人，他们的内心世界要么极度贫乏，要么就是充满着陈腐和变态心理。第一类人包括许多受教育程度低下的人。对他们来说，自然和社会外界环境所发生的一切是与生俱来就不可理解的；科学是新大陆。坎脱(Cantril)发现，有这么一大批的人，他们都被奥森·威尔斯那富于想像力的电台广播所报告的，火星人入侵地球这一子虚乌有的事件吓坏了，同样也正是这些人，他们被欧洲的动荡局面，或经济大萧条，或是科学上的巨大进步扰得心烦意乱，他们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们是如此的孤陋寡闻，以至于他们从来没有想过，在晨报中查看节目表，转转旋钮，或者用其他同样简单的办法来查证收音机里的消息。他们禁不住地惊恐，因为他们的精神活动缺乏批判性的原则。他们的思想是“左右摇摆”的，因此成为墙头草。

或许，那些轻信谣言的人们，更多的是那些在思想的某些方

面"过分固执"的人们。他们迫不及待地相信那些与他们自己所解释和预言的模式正相吻合的谣言。在这些人中,相信了火星人入侵谣言的人都是一些虔诚的教徒,他们正期待着世界的末日。其他的人则正生活在由大萧条和随时可能降临的巨大灾难所造成的不安全状态中,处于今天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状态中。证据表明,政治诽谤最易被那些对权力机构不信任的人接受。关于俄罗斯国内情况的谣言——一个最擅长体现含混性、重要性以及偏见的题目——根据听众的政治与社会信仰而被接受或被拒斥。敌意性谣言只在那些已经对谣言牺牲品怀着仇视态度的人群中传播。谣言就像宣传,二者有着密切关系,它引发并巩固了那些预先就已存在的看法,更胜于形成新的观点。

另外有一个使谣言得以传播的条件,而且是所有条件中最为突出的,也必须得以满足。即那些易受影响的个体必须相互保持联系。这些联系紧密大小团体诸如在海上的船员,战斗小分队的成员,同一间办公室的同事,星期五的桥牌俱乐部,或是一个小镇上的居民,所有这些人之间都必然保持着一些共同之处,联系密切。在这些人中间,谣言传得飞快。然而,即使是在同样的人群中,也存在有选择性的传播渠道。例如,在一个军营中,有关所有 35 岁以上的人都将被遣散的谣言会像闪电一般传播。但是,几乎只限在超过这个年龄的人中传播。在一个办公室里,一个宿舍里,或邻居之间,谣言主要通过朋友的渠道传播。

由于谣言的讲述者与听众之间密切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谣言链条已被莫洛(Moreno 1934)注意到。这位研究者用给某一群人画出"社会关系地形图"的方法标出谣言可能顺其流动的"心理走势"。这种被称为"社会人际学"的方法就是请人们说出他们最要好朋友的名字,(或许询问他们喜欢和谁一起生活,一起工作,一起娱乐。)由此产生的关系网络可以预言出处于网中的所有形式的人际交往,包括谣言的活动渠道。

尽管通常由朋友间的交往形成谣言链条，但也存在一些场合，只要最简单而短暂的接触就已足够使谣言传播了。为了消磨时间，在卧铺车厢内我们可能和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建立联系，并且贯穿这个联系的，可能是各色各样喋喋不休的谣传。此外，处在感情危机中的人们会很轻易地向身边的任何一个陌生人谈论眼下的危机。

某旅店发生了严重的火灾，这时听到旁观者在传递这样的一条“消息”：3个、8个、10个、20个客人被困在楼上。所以谣言链条可能暂时地由厌烦或激动的情绪形成，也会固定地通过友谊的纽带而形成。

战时情报局曾针对谣言公众进行过一次有意义的研究。他们调查了两个颇受战况影响的城市——新泽西的新布鲁斯威克，和缅因的波特兰大。在这两个城市中，研究人员都发现那些他们认为是消息灵通的人比那些他们认为消息闭塞的人更多地表现出愿意复述谣言的倾向。对见多识广的人来说，好像有更多显得重要的东西值得他们思考和谈论。这些人好像也有更好的口才，并且习惯于随时地表达他们的思想和感情。此外，还发现那些在社会生活中交游广泛的人，比那些离群索居的人更爱传谣言。例如，职业女性听到并传播的谣言要多于家庭妇女。研究者还发现，在那些被视为“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的人当中，有60%的人传播过谣言，而在那些过着相对隐居生活的人中间，只有30%。

这个研究需要一个评语。被调查人员定为“消息灵通”的那些居民是否真如研究人员所认为的那么“消息灵通”呢？是否当他们确实了解了事件的全部真相后就能较少，而不是更多地陷入谣言中了呢？所谓兴趣范围越广，传播谣言的机会就越多这一调查结果又意味着什么呢？在第一章中已指出，只有当新闻是完整而又明确的时候，它才会起抵制谣言的作用。毫无疑问，

见多识广的市民广泛地阅读报纸和收听许多广播，但是他们扩大了的社会视野可能依然是模糊的。

发生在远方的事件常常是最难搞清楚的，由此推想，人们也最容易受谣言中想像出来的情节的影响。在一个人有足够的见识去抵制谣言之前，需要了解很多东西。

耳语运动

我们已经谈到过，强烈的情感会使谣言的火星穿过陌生人之间交往的缝隙。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在战时，灾祸发生时，和竞选期间，谣言经常冲出它通常的传播渠道。经常是带有几分神秘，或是诽谤和下流，通过耳语，它被逐字逐句地，或大肆渲染地传播。

既然政治是一个很多人热切关注的题目，我们几乎可以确信，针对那些参加竞选的候选人会有数不清的人在暗地里嘀嘀咕咕。一个候选人越是打心眼儿里不受欢迎，谣言攻击的炮火就会越猛烈，攻击他的竞选动机，他过去的生活，他的个人品质和未来的政治意图。

最早期的耳语运动玷污了我们的总统选举。虽然受害者们性格各异，如安德鲁·杰克逊和华文·哈丁，但诽谤的主题经常是相同的：不正当性关系、虐待妻子、酗酒，以及所谓的有黑人或犹太人血统。杰弗逊被指责为无神论者且道德败坏；加菲尔德被说成是处于离婚的边缘；阿瑟据说在华盛顿和一个交际花关系密切；克利夫兰被说成每晚酗酒打老婆；哈丁有黑人血统；阿尔·史密斯是罗马教皇的政治傀儡（只是因为他碰巧是一个杰出的天主教信徒）；富兰克林·D. 罗斯福既是犹太人又是精神病患者。

既然被设想为一个撒旦式的人物，我们所厌恶的候选人就

变得愈发值得我们去仇视和反对。在我们听到谣言以前，我们只是想像他是恶魔。但是现在，我们知道他就是恶魔。这种精神动力与引起反黑人谣言的精神动力相类似。例如，一个有钱人根本无法对自由改革释怀，自由改革会通过更高的税收来限制他的财富，哪怕在良心上，他可能相信社会公正正需要这样的限制。但如果这位锐意改革的候选人荒淫纵欲，行动疯狂，同情黑人，这样，根据这些表面现象，他的反对派抓住了对他进行攻击的方向。敌对感像一个油点一样扩散开来，直到无法再辨认出那个油点原来的中心为止。

有时，也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耳语运动在地方选举中所发挥的作用，远不及在全国竞选中的作用。假如这个观点是正确的，似乎可以从两方面来解释。通常地方选举不那么激烈，因为那些竞选议题很少关乎个人的经济利益。第二，地方候选人对他的选民来说比较熟悉，他在政治和个人生活中隐晦的地方没有全国候选人那么多，因此，关于全国候选人的"几乎所有的一切"都可能是真的。

商业上的耳语运动也不是默默无闻的。那些以他们的冒险精神而非道德水准而闻名的广告商与公共关系顾问，竭尽全力也要把这些耳语都挖掘出来。一个以此为生的代理人，可以在任何一个有利的场合诸如卧铺车厢、理发店、或是球场，去吹捧某种产品的优点并大肆中伤它的竞争产品。但是这种富于想像力的商业行为的效用却值得怀疑。从心理学上来讲，它的弱点就在于事实上听众并不觉得这个话题重要。即便对上述商品的偏袒之心已在他的脑子里扎了根儿，他也不见得会把这些乏味透顶的废话再讲给他的朋友。金钱也许可以雇佣某一个谣言传播者，但它却不能制造出一个谣言链条。

报刊和谣言

尽管谣言基本上是通过自发地口头讲述流传的，但印刷文字所起的作用也不能低估。在那些杂志报纸为极权政府服务的国家里，它会成为谣言之源。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就是如此。散播谣言正是轴心国宣传的主导形式。①

即使在新闻出版较为自由的国家里，大概是由于误解了“新闻稿件”的真正含意，报纸也可能一时疏忽涉入谣言。在极少的情况下甚至会考虑故意刊登谣言。那些不负责任的编辑们，就像希特勒一样有时也会利用公众记忆力上的弱点，以及他们懒得核查事实的心理。一张赫斯特报业出版的报纸的大标题是这样的：“90%的教授讲授共产主义，前法学家如是说。”很少有人会想到要辨别一下标题中是否掺有谣言。但是，许多标题，由于他们强调与歪曲（编辑所执偏见的同化作用）的结果却恰好精确地套上了谣言的公式。塞尔德斯（Seldes，1935）提出，为报纸标题提供依据的新闻原文，丝毫不能为这个耸人听闻的标题拿出任何合理的说明。文不对题的现象并不少见，标题提示出（像一个谣言）编辑或老板的偏见，而文章为了给他打圆场则勉强用与之相关的尽可能真实的内容。

按照与之相类似的方法，那些经过挑选后成为普通新闻的报道，有时是一种半谣言。这些印刷出来的报道可能确实讲述了真相，但它却不是完完全全的真相，而且常常连相对真实的报

① 希特勒依靠公众的健忘，对记忆中的故事的坚信，不论是真是假，都会激发效忠献身行动，而且天长日久也不会有反效果。然而，人类的记忆并不是如此的短暂，人类的行为也不是像希特勒设想的那样特别。有一个关于依靠愚民和谣言的宣传的短视效应和最终失败的讨论。

道都做不到。一张多少有点被歪曲了的照片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作用，使得读者在回忆或转述其中的内容时，会顺着它被误解的方向进一步地强化它。1940 年国会讨论“中立法”之前，波士顿的一些报纸发表告成该法的文章，分析表明，绝大多数报纸都用更多的篇幅登载倾向自己报纸宗旨的讲话和辩论。甚至，他们倾向在文章的开头放上迎合他们编辑立场的事实和观点，而直到文章的结尾才是对立面的事实和观点。这种狡猾的编辑策略是为了在读者思想中淡化相反意见而强化他们赞成的观点。

1945 年秋，巴黎的报纸受到有关斯大林生病的谣言的困扰。这个传闻是反共报纸捏造的，企图把它强化成俄国出现危机的报道。另一方面，拥护共产党的报纸，要么对该新闻视而不见，要么就是否认生病和危机。

记者们总处于一种尴尬的心态中。尽管是怀着世界上最良好的愿望，但他们的新闻也总是逃不出典型的谣言歪曲过程。记者自己很少是一个事件的目击者，而只是在一个有新闻价值的事件发生后才赶到现场。而他的报道可能是从目击者那儿转来的二手或三手消息的（目击者本人的准确性就不太高）。这“新闻”已经变成了传闻，而经过记者的编写及撰稿的修改，出来的东西可能在简化、强化和同化的危险道路上滑得更远了。

塞尔德斯从《芝加哥论坛报》的巴黎版上摘引了一个例子。一个女演员的自杀。

报　道

贝尔格莱德，10 月 27 日——昨天晚上，就在她应该出现在利奥波利娜大剧院舞台上的前一刻，阿拉·贝尔女士，一位斯洛文尼亚女演员，被发现吊死在她的更衣室里。自杀原因不详。

事　实

是在第一幕表演结束后。不是在利奥波利娜，而是在

卡拉金弗特。她的名字叫艾拉·比亚。不是斯洛文尼亚人，而是威尼斯人。不是在更衣室，而是饭店。她自杀的原因是知道的。

塞尔德斯总结说："从新闻的格式上看，确切地讲，共有6行半包含了7点事实，而在这些事实中只有一点，自杀，是正确的，其他的都是错的。"对于这种类型的歪曲，我们不能对这位记者的动机加以责备。如同在我们自己的实验中，尽管受试者的确想尽力提供一个准确的报道，但他依然被频频出现在每一系列复述中典型的重组和嵌入过程所支配。

由于刚才所提到的一个或更多的原因，我们在报上读到的很多东西多少都具有一些谣言的特性。然而在原则上，新闻和谣言之间尖锐对立是始终是不可调和的。前者在理想上的特征是与可靠的证据保持一致，而后者缺乏这样的一致。但是尽管新闻与谣言之间在理论上的区别是如此清楚，在公众的思想中却并不总是这样的。一些容易受骗的人好像"相信一切"从报纸上看到和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对他们来说，一条来自传闻的消息就像被正式文件证明过一样真实。相反，另一些人，是如此的多疑，以至于他们"从不相信报纸上的任何报道"。（对新闻广播持怀疑态度的人要少一些。）在受过一两次愚弄后，他们就变成了顽固的怀疑论者，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发表了许多有关暴行的虚假报道。结果在二次大战期间，许多美国人很难相信那些有关集中营的骇人而真实的报道是有真凭实据的。在我们的新闻领域中许多完全值得相信的新闻报道，却被人嗤之以鼻，当成是宣传鼓吹。如果今后人们越来越具有谣言意识，就像过去人们具有宣传意识一样，那么，记者、专栏作家以及编辑将会发现要取得公众的信任将会越来越困难。

贴着标签的谣言

如果告诉人们他们正在听的只是一个谣言，会有什么结果呢？以下两个实验回答了这个问题，并相当清楚地显示出，公众尚未具备谣言意识。

克科巴特利克(Kirkpatrick，1932)，给他的大学生受试者一组陈述，据称都是从校园的日常生活中收集来的。有一半的陈述都以这样的句子开头，“有谣言说……”，反之，另一半，则自称是确实可靠的消息。而所有的内容都是编造的。对受试者表现出的相信程度的分析表明，带预警性的话“据谣传”几乎根本成为人们去相信它的障碍。

最近，G.H. 史密斯(G.H.Smith，1947)使用了一组虚构的“新闻”，一些有利于苏联，一些不利于苏联。他的受试者是倾向俄国的学生，他们接受了一个态度计分法的测试。那些新闻被置于三种不同的标签下。一些是已经确证的事实；一些是未经查证的谣言；还有一些不带任何标签。通过对受试者从绝对不相信到完全相信之间的不同态度打分的方法，来表示他们相信或不信的程度。

史密斯的试验结果表明，标为事实的最容易被相信，反之，标为谣言的新闻最少被相信。没有标签的处于中间状态。然而，事实标签在增加信任度方面比谣言标签在减少信任度方面更有效。换一种说法，贴谣言标签和根本不贴标签的效果差不多。给一条消息标以事实，就是赋予它可信性，诱导人们顺顺当当地接受它。但是给一条消息标以谣言，只是把它归入了没有根据的闲谈一类。人们根本不会避开这个标签。当听到带有事实标签的某事时，听者好像对自己说：“噢，事实！事实是真实的，我应当相信它们。”当听到标有谣言的某事时，他犹豫一会

儿，并且推断说“哦，谣言也可能是真的”，并且假如听者倾向于接受，他就会在没有证据证实的情况下假定其为真。

在这些实验中，事先所持的态度显得比任何标签更重要，这是因为，在所有史密斯的实验条件下，相信程度的分数与态度等级的分数成正比。那些支持俄国的人更倾向于相信对俄国有利的事实和谣言；反对苏联的人则更倾向于相信对俄国不利的事实和谣言。

谣言标签的相对无效性有重要的实际意义。它意味着仅仅用贴上标识的办法是不能消灭谣言的。还需要更有效的批驳方法，包括借助于爱国主义，借助于人的羞耻心，或许可能还要借助于谣言心理学方面的一些基本指导。谣言诊所能使用的正是后面这些方法。更要注意到，贴上事实标签可在听众中引起盲目的相信，这点也是很重要的。那些大肆使用貌似科学的广告词的广告商们，早已发现了这种特性。然而，不幸的是，它仅仅是容易让人轻信的符号，并不是每一件贴上事实标签的事都与它的标签相符。

为了赢得可靠性，谣言经常伪装成事实，或者引用权威来作它们的后盾。许多谣言都是这么开头的：“我兄弟刚和一个知情者聊过……”，“警察总监亲口说……”或“我对此事有绝对把握……”，还有其他一些说法，例如，提到具体的城市或街道，据说在那儿发生了某一事件，以此来提高可信度。对某一事件而言，一个具体的地点似乎就暗示了该事一定发生过。

谣言和幽默

既然每一个谣言都是“可供参考”的，它就应该讲述一个事实或描述事件的实际情况。但是许多像谣言一样流传的故事是想像力的直接产物，这样做只是想引发笑声，而不是为了制造可

信性。然而，它们也有可能反映种族仇恨，包含个政治性的批评，或发泄某种被压抑的情感。从所采用的流传方式与所起的作用上来看，谣言和笑话常常惊人地相似。

有一个故事，曾在欧洲独裁统治的国家中广为流传。一个居民正在一条较深的河边走着，忽然听到一个落水者在悲惨地呼救。他跳进河里把那人安全地救到岸上。获救的人骄傲地宣布他的身份。“我是墨索里尼。你救了我的命，作为报答，不论你提出什么要求，都可以立即满足。”“我只有一个请求，”救人的人回答说，“不要告诉任何人是我救了你。”这不是谣言——甚至也不算是一个太好的笑话——然而就是因为讲这个笑话而被告密者听到，许多男人和妇女被送到西伯利亚流放地，德国集中营和意大利的流放殖民地。

这个例子证明了幽默和谣言之间在心理上的密切关系。它们都充当了表达个人感情的载体，而讲述者自己并未明确地意识到这种感情的存在。一个脑子里常存有性念头的人是不会公开承认的，甚至不会对自己承认，但却会很容易被黄色笑话或流言所激怒，以此来发泄。（一些人对笑话敏感，而另一些人对流言敏感。）

当幽默包含明显的讽刺时，就像那个独裁者的故事那样，术语叫做“别有用心”。人们可以讲毁谤黑人的笑话来代替说“我恨黑人”。确实，其他人可以不假思索地重复那些故事，而不掺杂自己的感情，甚至是无意识地，也不带任何有偏见的意图。但是，绝大多数诽谤、嘲笑或羞辱它们的牺牲品的笑话，最终会持续很久，就像谣言那样，这是由于它们具有心理宣泄的作用。

要想在巧妙设计出的敌意性谣言和近乎幽默的带偏见的奇闻之间划出界线是极为困难的。它们在功能上的意义几乎是相同的，它们对自己的牺牲者都同样地不公平，并伤害了他们。像二者之间的区别，则完全取决于假设二者之中哪个是建立在可

被查实的证据之上的。

谣言和骚乱

在社会组织中，谣言的细菌总是活跃的。有时，在良好风气下它们传播得非常缓慢。有时它们又会突然爆发，处于一种极其活跃的高热状态。如果健康的社会组织不能抵御它们的破坏时，这种高热就会很不幸地发展到最危险的地步。战争、暴乱、瘟疫、灾祸，这些本身就足具破坏力的东西，再加上谣言的并发症，就会更加变本加厉。

两败俱伤的斗争证明了产生暴乱的环境对谣言巨大的依赖性，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指责传闻是一场暴乱的惟一或最初的始作俑者，然而它似乎总在扮演帮凶的角色。事实上，我们所掌握的证据是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我们可以把它看做一个社会心理学的规律：从未有一场暴乱的发生不带有谣言的鼓动，伴随和对激烈程度的激化。通常可以把这一过程分为四个阶段。

1. 在暴乱前的一段时期会出现不满的窃窃私语，这些窃窃私语可能采取谣言的形式，以散播对对方的歧视、侮辱，或是敌对双方相互指责对方的罪行。在这一阶段出现的谣言与通常情况下的敌视性和指责性谣言没有什么不同。它们听起来就像普通的闲言碎语，关于黑人或犹太人令人厌恶的行为，或是雇主的贪婪，警察的残忍。但是无论何时，只要谣言的传播者超出了平时的范围，或是谣言的恶毒程度变得更为严重，我们就可以把这当成是一个暴乱前的状态。就它们自己本身而言，这些谣言并不会导致暴力。它们只是充当了正在加剧的社会紧张气氛的气压计，它表明除非社会的舆论风向改变方向，否则我们将面临一场风暴。在 1943 年的多事之夏，当时出现了几次种族骚乱，有

关记录显示了在暴乱之前有一个时期正是被激化的谣言四处传播的阶段。

2. 当谣言具有明确的威胁形式时，就表明有危险。“今天晚上河边会出事儿”，“比赛以后一定来棒球场看热闹”，“今晚他们去抓那黑鬼，把他揍得灵魂出窍”。有时谣言把行将迫近的暴力归咎于对立的阵营：“这些杂种一个月来一直在储备枪支。”1943 年初夏，在底特律骚乱的过程中，谣言传说卡车装载着武装黑人正从芝加哥向底特律进发。这一不祥的信息甚至被不负责任地通过无线电向大众广播了。这不可避免地加大了恐慌。

在这一阶段，当有公开的预言威胁说即将爆发暴乱时，警察将组成他们的战线以防止这一威胁变成现实，防患于未然。警力加以预防的很好的例子，发生在华盛顿，同样是在 1943 年那个多事的夏天，有谣言说，大批黑人在策划一场有组织的起义，暴动的那天计划有一场黑人游行。这样一个谣言是打算造成一支由充满敌意的白人组成的军队。通过事发之前建立起一个坚定的公众立场，并为黑人游行者提供充分的保护，华盛顿警方才能及时阻止了一场冲突的发生。

3. 通常，尽管不是一成不变的，点燃火药桶的火星就是具有煽动性的谣言本身。1943 年 8 月哈莱姆地区的严重暴乱就是紧跟在一个谣言之后发生的。这个谣言说，一个黑人士兵和一个白人警察在哈莱姆一个酒店大堂发生了冲突。在这场冲突中，警察受了伤，士兵的一只肩膀也受了伤。但是谣言说黑人士兵被人从背后开枪击毙。几分钟内，愤怒的人群聚集在饭店、警察局和刚刚收治了伤者的医院前。那些激动而烦躁的暴徒们，他们长期以来受着种族歧视、贫困与住房拥挤的困扰，现在采取行动了。无数的商店被洗劫，价值数百万元的财产遭到毁坏。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是一个种族事件触发了暴徒的骚扰行为，但由此引发的愤怒并未构成一场种族骚乱。黑人的掠夺破坏，主

要针对白人的财产。暴力好像是漫无目的、随机的，是由为时已久、再也无法忍受的挫折感和失望情绪所引发的。这一事件显示出，一场骚乱开始时，暴力是多么的无计划和无目的。

相比之下，底特律的暴乱，从其更多伤亡与破坏来看，确实是一场种族骚乱。在长时间的社会紧张局势之后（如果留意骚乱前的谣言的话，这种局势的严重程度是本可以预料到并被缓解的），这场骚乱的直接诱因是发生在贝尔·爱丝丽海滩上一个被严重歪曲的谣言。那是一个炎热夏天的周日下午——顺便说一句，我们注意到，这一时间也是绝大多数骚乱发生的时间。如同报纸上报道的那样，导火索是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之间的拳脚争斗。这件事被夸大地传遍海滩，甚至传到了城里。它的各种版本依照传播谣言者不同的同化偏好而改变，一些是专门编给白人听的，而另一些是编给黑人听的。有一种版本声称，一个黑人婴儿被白人水手从桥上扔下去了；另一种则说一个白人婴儿被黑人从桥上扔下去了。一个白人妇女在桥上被黑人攻击；白人水手侮辱黑人姑娘；白人姑娘游泳时被黑人勾搭。由于我们先前所提到的原因，性的主题是必不可少的。

4. 在一场骚乱的狂热中，谣言比平时传播得更快，但在这一疯狂的阶段，它们的内容里反映出明显的盲从。有时它们能使人产生幻觉。人们用一种狂热的态度对拷打、强奸和谋杀详加描述，仿佛是为正在发生的暴力行为进行解释，并加快报复的进程。李和哈姆弗莱告诉我们，在极端激动的情况下，底特律的警察是如何被报告传说事件的电话淹没的。一个白人妇女在电话里说她"亲眼"看到一个白人被一伙黑人暴徒杀害了。当一辆警车被派到报告里所说案发现场时，警察发现一群小姑娘在玩踢石子游戏，没有任何暴力的迹象。来电声称自己是目击者的事实说明，在极度紧张和兴奋的情况下，谣言很可能完全是一种精神病态的产物。

雷顿这样评论这一点：

观察精神病人的精神病学家们很久以来就知道，当病人处于恐慌状态时会把正常的事情歪曲为可怕的威胁。远处的火车汽笛声，变成了死亡的尖叫，或者两个人在一起谈话被立即假想为在密谋什么。甚至，还见到过处于恐慌中的病人能够产生幻觉，并且看见有人过来攻击他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人，或是能嗅到不存在的烟味和汽油味。对另外一些正常人来说，当他们处于极度惊恐的精神状态时，这类现象也很可能会发生……

在他和日裔美国人从西海岸疏散的经验中，雷顿接触到许多使人产生幻想的谣言。在亚利桑那州波士顿新定居中心的一次罢工期间，受煽动的示威者看到了根本不存在的机关枪和武装人员。他们看到了想像中的灵车在夜间拉走尸体。他们相信那些社区的居民由于炎热、腐坏变质的食物和缺乏医疗照顾，正像苍蝇一样大批地死去。婴儿被说成在温度过高的托儿所中快要冻死了。这样的谣言是暴力冲突形势下，谣言第四阶段的一个典型。

当谎言已经达到第三和第四阶段时，警察或一般的社会领导者几乎已无法制止了。它本身就是必须被制止的暴力，疯狂的传言差不多就是暴力的口头伴奏。但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谣言似乎有可能成为可信赖的警告，提醒执法机关，别再迟疑，尽可能采取果断的措施去控制受到挑动的人群，这些人很快就要走上激动、敌对、无法自控的道路。

如果把标准放开一点，这个谣言和暴力的故事可以应用在社会管理的许多方面。在公司、工厂、学校、监狱、船上——几乎任何人们聚居的地方——谣言是他们思想状况的一个表征。敌视少数人的谣言显示出在该范围内较低的社会凝聚力。当这些谣言开始增多时，特别是当它们带有威胁成分和明显地预示出麻烦时，管理者就可以从中获得明确的警告，在他的管区内紧张

局势十分严重。对他来说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小 结

通过这一章的各个小节，逐渐揭示出，谣言已深深地融入了社会结构之中。我们已经指出，历史上的许多事件都取决于人们对传闻的反应，而他们的许多信念则是古老传说和神话的产物。

谣言的欺骗性就在于，尽管它们具有评价与煽动的意味，但它们往往伪装成正在提供客观事实。实际上，它所潜在的表达功能要比它所谓的提供消息的功能远为重要。通过试图给谣言分类，我们发现它们之所以难以捉摸，部分是由于潜藏在它们之下的爱恨交织融合。只有深入到人格的更深层次，进入个体的精神生活的运作中去，才能衡量出谣言在社会生活中所起作用的意义。什么样的人会轻信什么样的谣言。这些谣言链条依赖于组成它们的每个人的轻信盲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刺激因素变强，越来越多的人就会加入到这一链条中。战争、暴乱、竞选会引起恶作剧类型的谣言，以耳语运动的方式四处传播。近些年，我们已经发现在谣言和暴乱之间存在着多么紧密的联系。必然的，为了控制后者，也就必须留心前者。

既然当人们遇到一则谣言时通常并不能分辨出这是谣言，而且人们也很少因为谣言被明显地标识出来就不去轻信它们，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断定民众还没有具备充分的谣言意识。它所建立起来的可怜的免疫力聊胜于无。

无法指望传闻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会有所减少，除非几个不大可能的条件正好凑在一起。诸如，新闻媒体应该力求更加准确，而且应该比现在更加成功地渗透到它所触及到的人们的思想当中；而那些寻找解释的人们，应该找到比他们现在所知的更

令人满意的答案；另外那些强烈的仇恨、恐惧和那些在虚幻中寻找理由与发现的念头也应再少些；最后，还应找到一种方法纠正那些折磨着所有回忆与复述，使之发生歪曲的心理动机，尽管讲述者本意是要力求准确的。

既然这些条件在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实现，那么每个人为了使自己获得谣言免疫力，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地熟悉心理学和社会学上对谣言现象的观点，并且通过不断的实践，提高他的技巧，以辨别和分析每天他那饱受冲击的耳朵所听见的没完没了的传闻。

第十章 谣言的分析

为了发展谣言分析技术，一个人首先需要熟悉前述各章中所阐述的原理，然后要练习去应用它们。不用说，他还要有健康的（而不是偏执的）怀疑态度来对待他的所见所闻，同时要具备一种意识，对照自己过去的相关经验去检验这些信息，可能的话，还要参照客观标准去验证。

在这一章，我们挑选了一些有关谣言的例子，请读者对它们进行检验。有些例子好像已过时了，这本身就是谣言短命的实例。“仅供参考”好像是暂时的，只是因为人们的兴趣视角变化太快。然而，从各种各样的社会氛围中挑选一些普通的案例进行研究，哪怕其中一些已经过时，还是可以从中了解到很多东西。

对任何给定谣言的分析，都不可能像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完美，原因是对于谣言传播的精确心理条件和社会条件还只是一知半解，而且往往还是仅靠推测得来的。再说，也不能指望仅用一个谣言就能证明有关谣言的所有原理，尽管谣言的基本公式在每一个例子中都应该是可以体察到的。如果，基本公式不适用，我们就必须判断，是这个被研究的样品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谣言呢，还是这个公式本身有问题。事实上，前面章节中提出的所有原理的准确性都是可验证的，通过它们对具体谣言案例进行的成功的解释，就证明了这一点。如果这些原理中的任何一个被多次发现不太合适或不起作用，它们就应当被抛弃或修改。

现在我们对下面这个例子进行分析评论，尽管我们不能肯定在每一个案例中这种评论方式都同样适用。这样的练习中是应该允许大量自由的思考存在的。

在读者看过我们的第1、2或第3个评论后，他应当在阅读作者的建议之前，自己试着作分析。

例1

第一个例子引自乔尔·塞亚(Joel Sayre)的"柏林来信"，发表在《纽约人报》上，时间是1946年夏，混乱的占领时期。

发生在科耐斯拜克大街上的这个盲人的故事，可以让我们了解一些柏林市民的思考方式。某天傍晚，一名年轻妇女从办公室回家，正走在克耐斯拜克大街上，这是一条被轰炸过的住宅区的大街，当她在等红绿灯时，一个盲人撞了她。他是一个身材高大面目憔悴的中年人，戴着盲人眼镜，穿着旧毛衣，灯笼裤的裤脚刚到脚脖子，他正用一根手杖探路。在他的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封信。他的一只胳膊上戴着一个黄臂章，上面标有三个黑色的球，呈金字塔状，这是所有德国盲人和聋哑人在大街上都应该佩戴的标志。盲人为自己撞了人而道歉。她告诉他没关系，并且问他是否需要帮助。他说正需要她帮助，他把信递给她，请她把他领到信封上的地址处。这封信是寄给距克耐斯拜克大街相当远的某人的。这个妇女告诉盲人，那要走过好多街区。"啊，上帝，今天我已经走了那么远！"他说，"你能不能替我转交这封信？"她告诉他，她很乐意，不管怎样她回家都要路过那个地方，所以一点也不麻烦。盲人深深地感谢她。两人说再见，他敲打着手杖向她来的方向走开了。她刚刚走出去20或30码，偶然回头看看那个盲人是否没事儿。他确实

没事儿：他夹着手杖，正沿着便道快步走着。从那灯笼裤看，是他没错。这个妇女没有转交这封信，而是把它送到了警察局，并且告诉警察这信是怎么到她手里的。警察赶到信封地址上的那间公寓，发现那儿有两个男人、一名妇女和一堆肉，经检查，医生发现那竟是人肉。信封里的信上只有一句话："这是今天我送给你们的最后一个。"

评论。这个有意思的案例的提供者在后面附加了他自己的分析：

这个故事纯属虚构。然而，我在柏林所认识的所有德国人，还有其他一些我问过的人，都听说过，并且95%的人信以为真。和我讨论这一故事的某些人还极其频繁地暗示我，一种挤眉弄眼的暗示，他自己和那个年轻妇女很熟，她险些被人成磅卖掉。胖乎乎的，人们向我这样描述她，胖胖的，但很可爱。过了好长时间，我发现几乎没有一个柏林人怀疑这个盲人的故事。对于这一点，有两个原因：第一，难以想像，在这段日子里，在柏林还有什么荒诞的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第二，大多数30岁以上的柏林人都能记起那个历史上的先例。在1925年闻名全欧的弗雷兹·哈尔曼，或者叫汉诺威吃人魔鬼，被处以死刑，因为他杀了两打男孩，切成块，拣好的卖给民众。他还供认处理和肢解了好几十个青年，甚至在证词中都没有提到的——30或40，他无法确定。我被告知，打那以后好几年，几乎所有汉诺威的人都坚持吃素。

报告者提出两个很好的论点，毫无疑问，这是对这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的两个最重要的解释。

1. 这个故事主要反映柏林经济和道德生活的极端崩溃，这是由于一系列的空前大灾难带来的：残忍的迫害、轰炸、饥饿、战败。社会瘫痪得越严重，谣言就越疯狂——"难以想像在这段日子里柏林还有什么荒诞的事是不可发生的。"人们极易轻信，因为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完全"紊乱的"。假如已经有一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为什么就不会发生别的事呢？

2. 同化作用的因素显得突出。人们长期以来念念不忘的就是食物，同样还有人身安全。而人的生命之廉价，令人毛骨悚然的处理尸体的方式（在集中营里、在大轰炸时）这些都是另外一些令人极度敏感的东西。人们感兴趣的这个大的血腥背景，通过对汉诺威恶魔这一更为特别的吃人事件的回忆而加强了。这一骇人历史的特殊之处就在于它的"事实内核"，在类似环境中再次出现，但已不是作为"仅供参考"（并被广泛接受）的事件出现，而是作为同化这一故事的内在心理背景出现的。结果就是把当前的事件和过去的事件融合、压缩，并现实化。

作为对这两个有关传闻的主要原理的补充，柏林传说还例证了其他的东西。

3. 很明显，谣言的基本公式是适用的。食物和安全对穷困的人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东西，还有被毁坏了的城市交通和从前建立起来的道德规范的崩溃一起造成了最大程度的混乱局面，在这里"任何事儿都可能发生"。

4. 这个故事具有心理学上的功能，它解释并缓解了由目前的食品质量和人身安全状况给人们造成的焦虑心理。这两种焦虑心理一时之间在听众的头脑中融合到一起。这个故事为人们的忧惧心情提供了理由，而且，当它被讲述时，把其他人也带入了同情和遭受苦难的氛围中。

5. 由于它的虚构特征，这个故事有很好的连续性和表面上的合逻辑性，帮助听者与传播者实现他们的"意有所指"。屠夫

闹剧的牺牲品被描绘成胖胖的;她对"盲人"坏蛋的仁慈和他的假装的残疾都提供了动机和悲剧的因素。与绝大多数谣言相比这个故事比较长,它被戏剧性地强化了、许多具体而生动的细节被用来突出这个故事,尽管这些细节看上去十分详尽,但实际上它被主题同化了。

6. 据这个报告者所说,这一谣言四处流传而且几乎人人都相信它。它并不只限在一定范围内的谣言公众中。渴望得到食物的焦虑心理在全城的泛滥,使这个谣言变得像硬币一样流通,因为就内心的关注焦点而言,所有的人都是相似的。

7. 这个故事的极端反常,使它具有一种特别的情感上的吸引力。但是,它却不会在一个更安全的、较少饥饿与恐慌的社会氛围中流传。这种反常的兴趣来自全人类内心最深处的焦虑——对痛苦与死亡,以及无处不在的神秘事物的恐惧。无论何时,当悲观的社会情绪盛行时,反常的谣言就成为闲言碎语的可靠的题材之一。通过它们,人们抑郁的心情得以缓解,并找到合理的理由来解释说明这种心情。

例 2

1906 年 4 月 18 日,洛杉矶大地震刚过去,疯狂的谣言充满了整个城市。卓·卡姆柏林(Jo Chamberlain)把其中四个刊登在《巴尔的摩太阳周日刊》上(1946 年 3 月 31 日)重述如下:

a. 在洛杉矶地震的同时,海啸吞没了纽约市。

b. 芝加哥沉入了密歇根湖。

c. 地震把动物园里的动物都放出来了,这些动物在金门公园吃了好几个灾民。

d. 在男人的口袋里发现了女人的手指,因为来不及把戒指取下来。在这些谣言中,洗掠死者财物的人总是被吊在最近的街灯柱上。

评论。多疑的读者可能想知道，事隔40年以后再复述这些谣言，这中间是否又加入了额外的强化和歪曲呢？这一点很值得考虑。也许谣言d中“总是”这个词可以作为一个例子来研究。像这种总是以仓促的当场处决收尾的盗窃死者财物的事件，查证起来肯定很困难。但是这些大灾难之后流传的谣言，的确是在当时就被记录了下来的，如果仅以分析为目的，我们可以假定，它们和上述列出的那些并没有大的出入。

1. 这一系列谣言证明了一个显而易见的规律，即谣言的创造力。极端的重要性和大量的模糊性合谋制造了一个接一个疯狂的谣言，其中很多与其他的谣言只是稍有不同。这种相似的联系很简单：一个大城市被摧毁了，那么其他的城市为什么就没有这种可能呢？通过把灾难扩大增加，谣言的创造力促进了强化作用。

2. 情绪失常的人们总是试图对某一事件的重要性进行评价，这成为意有所指一个步骤。谣言成功地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夸大灾难后果的工作。然而，从评价性的角度来看，它们相当准确地表达出对这一事件的个人看法。他们暗示说：“再没有比这事更可怕的了。”在失去了家园其或亲人以后，他们又编造出野兽或盗尸者的蹂躏，以及另外一两个大城市的毁灭，以此来突出自己焦急与悲伤的心情。通过这些润色，大难之后的种种感受被委婉地表达出来。

3. 由于他们的意有所指，人们还得出许多推论，有些是貌似合理的。在更为合理的推论中，有一个就是“地震使动物园里的动物逃了出来”这种可能性（谣言c）。在这一说法中是否有真实的内核，我们现在已无法知道，但是即使遭到毁坏的笼子真的使一些动物跑出来了，在讲述中仍有可能把许多限制性的话省略掉了。动物逃窜的范围被强调，而且可能是浓缩作用造成了灾民们可怕的命运。动物在金门公园，灾民也在金门公园。

后者被"浓缩"进前者的胃里。想像力(在谣言里如同在梦里一样)经常把分散的事件合在一起,化繁为简,从混乱中理出一条外在的头序。

4. 吊死洗掠死者财物的人(谣言 d)反映说教的终结和幻想中的报复。由大灾难造成的重大损失不存在人为的原因,因此在一场由神的意旨造成的大地震中,盗尸者就成为惟一能被想起来的替罪羊。

5. 诸如此类的恐慌谣言,相当于暴力谣言第四阶段。只要能多少解释并缓解当前的紧张状况,那么没有什么事情会疯狂得令人无法相信。但是,与暴力谣言不同,恐慌产生的谣言没有前述的发展阶段,当然,除非这个恐慌自身是逐渐发展的——这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

6. 如同在柏林谣言的例子里,这儿没有谣言链条的迹象。灾难使人们的关注完全集中在一起,以至于我们能很好地想像一个幸存者给一个完全陌生的人讲述这些故事。然而我们却不能想像纽约或芝加哥的居民会相信自己城市毁灭的传言。每一个大城市的居民都有他们自己的标准去判断事件的可靠性,从而使得这类谣言无法产生。而且记者恐怕也不会刊登任何能被迅速查实的谣言。然而许多不能证实的故事仅依据传闻就被发表了,并且还在全国范围内被广泛地接受了,直到地震不再是热门话题为止。

7. 很容易想像,讲这种恐怖故事可使讲述者大出风头。全国上下都处于一种兴奋状态中,热切盼望知晓任何类型的消息。一旦了解到灾难的大概轮廓,人们就会急切地想知道那些补充画面的具体细节,而一个能够提供点滴最新"新闻"的邻居当然是受欢迎的,很容易得到听众。

例 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大不列颠，有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英国人在英吉利海峡游泳。他穿着一件一个美国人借给他的游泳衣。上衣上绣着“美国必胜”。海滩上一个朋友对这个英国人说：“你最好当心鲨鱼。”这个英国人指着他泳衣上的字回答说：“噢，不怕，没有哪条鲨鱼能够吞下这东西。”

二次大战时，在美国，故事变成了这样：在迈阿密海滩上一个美国人正要游泳，他的泳衣是一个英国人借给他的。对于当心鲨鱼的警告，他回答说：“不用担心，没有鲨鱼能吞下那个东西，”并且指着他泳衣上的字，上面写着：“英伦永存。”

评论。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伯绍所说的一种潜水式的谣言。在这个例子中，流传的第一个时期过后，这个故事潜入大西洋底，经过一代人，又在另一个大陆上冒了出来。在流传的过程中，它颠倒了它的“别有用心”，并且改变了它的嘲笑对象。

1. 所有的潜伏式谣言连续流行过后，它的重现依赖于类似的心理条件的出现。两次世界大战的形势环境是非常相像的。作为同盟国，美国与英国在很多场合下不可避免地同舟共济。即使是个人之间彼此不友好，对彼此的国家抱有强烈的偏见，都被迫致力于共同的行动。借泳衣反映了关系的密切——并表示一定程度的联合和友谊，这一点是为谣言本身所否认的。这一故事离奇有趣的特点之一就是反映出这两个盟国之间既团结又敌视的矛盾关系。

2. 这个故事基本上属于敌视类型，尽管敌意不是特别严重。所表达的感情不是一个家伙痛恨另一个家伙，更像是对他的自命不凡不屑一顾，以及一种竞争的意识。与绝大多数谣言不同，这个谣言包含着机智（可能有点老套）。确实，要不是由于它的这点别有用心，人们会怀疑它能否保存下来，因为它的重要程度对大多数讲述者来说无关紧要。没有几个美国人或英国

人，会对对方的怪异行为强硬到散播敌意性谣言的地步。它是以笑话的形式出现的。而且它的存在至少部分地在于讲述者想用一种幽默的用词不当，包括“吞没”这个双关语，来引人发笑。这是一种闲谈，我们用它来填充谈话中那种令人尴尬的沉默空当。真正反对英国的谣言则更可能会用一种恶毒语调去谈论她的帝国主义野心，以及她“玩弄美国人像玩弄一个吃奶孩子”的能力。这种完全敌意性的谣言，当然只会在怀有明显反英偏见的美国人中才能流传。

3. 这个谣言的玩笑特性是如此突出，以至于我们发现自己站在了谣言的边缘上。警觉的读者可能会指出这个例子不符合我们的“仅供参考”的限定。因为它所期望的是听者的笑声，而不是相信。这位读者是对的。在谣言和幽默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界限，尽管后者倾向于毫不掩饰自己是在信口胡言，而前者则大有一本正经的意思。然而，这个例子和其他很多的例子一样，其中的信口胡言在笑话的伪装下表达了真正的敌意。讲述者以一种漫不经心的评论式的口气说：“这些自命不凡的美国人（英国人）简直是傻瓜！”虽然，严格地说，这个故事不真的是个谣言，但在很多方面，它的表现很值得把它收纳到我们的收藏品中。

4. 这个故事还明确地证明了趋向于当前社会形势的同化作用。公众对一战后，英吉利海峡的海滨浴场上所发生的事不会有什么兴趣。因此，已成为历史的故事被置于现代环境之中，由此被现实化。

例 4

谣言对学术界是一视同仁的。即使是冷门的科学也领教了它的歪曲和篡改，正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 G.G. 辛普森博士（Dr.G.G.Simpson）遗憾地发现的那样。在他发表在《科学》杂志上，名为《一个科技新闻谣言的个案记录》的短文中，他向我

们讲述了他的亲身经历。我们将这篇文章进行了一些缩略。

1937年8月21日，美国国家博物馆发表了一篇我写的报告，名为《蒙大拿州克瑞滋山地的尤尼堡及其哺乳动物群落》。这篇文章的学术色彩浓厚，在长达287页的报告中描述了蒙大拿州中部在中生代与新生代时期的地理学和古生物学概貌。作为惯例，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还给杂志社附上了一份有关这个报告的非学术性的摘要。这是一个相当准确，然而通俗易懂的摘要，它小心地避免了所有可能会耸人听闻的论述或伪述。在摘要中不到四分之一的篇幅谈到了已知最古老的灵长类动物，它包括在报告中所说的哺乳动物群落中。这个报告和最原始的新闻稿强调，这些动物与现代灵长类动物或人类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它们是同种哺乳动物的非常古老的代表。他们还指出，并不是我发现的这些古代灵长类动物。快递服务送来了刊登在从缅因州到加利弗尼亚的93种报纸上的这一摘要的各种版本。

即便是把摘要全文转载，也夹带了一些错误。其中，一篇文章说，被提及的化石有七千万年历史，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夸大。标题倒无意冒犯，尽管蒙大拿《巴特报》以横跨三栏的规格写着"蒙大拿的克瑞滋山脉被列为人类生命的发祥地"，虽然是胡说八道却避免了严重的谬误。

美联社以摘要为素材进行了改写，这篇经过大量改动的通讯又刊登在34家报纸上。它的开篇第一句就定了这一基调："人类并非由猴子进化而来，取而代之的可能是一种四英寸长的栖息于树上的动物，它才是今天地球上所有哺乳动物的老祖宗。"它接着说我认为人类可能起源于美国西部而不是亚洲。头条新闻的作者们在这个故事的标题上各显神通：

人类的父亲是猴子？不，是一只老鼠——以主的名誉发誓
加利福尼亚，《联合报》
四英寸长树上动物被认为是人类祖先
——斯里夫波特，《路易斯安那时报》
对哺乳动物的研究带来新的进化论
——《新港新闻》，弗吉尼亚出版社

顺便说一句，之所以在这样一些报纸中又提到老鼠的话题，只不过因为我说了一句，即那些早期的哺乳动物大小与耗子差不多。当然，它们不是田鼠或家鼠，那篇原始的摘要中也没有这种说法。

似乎只有四家报纸写出他们自己的未经转载的报道。其中两家就像其他几个使用授权转载文章的报纸一样，说是我发现了这一缺少的环节。

到1937年10月，这一狂热沉寂了下来，而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并着手试着纠正报纸对我过去文章的看法。然而，在1938年4月18日，格洛弗斯瓦尔《纽约先驱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摩霍克谷宠物俱乐部的一次展示会的新闻。在这次展示会上我被他们称作是（一个错误但难以被认可的称号）七千万年以前生存于蒙大拿的一种原始狗的权威，这种狗，据他们说有卡地亚熊那么大。然后，另一个城镇搞了一次狗展。这次，他们说我不仅发现了这种狗，还详细地把它们区分为60个种类。如此丰富的想像力真使人吃惊，因为最初的摘要根本没有什么狗的发现，不管它们是和卡地亚克熊一样大，还是和老鼠一样小。犬类爱好者们和报纸交相呼应，随后，我又陷入了另一个大出风头的时期——这次，我又成了“生存在七千万年以前现已灭绝的卡地亚熊狗的发现者”。其实和把老鼠作为人类祖先一样，这个也并非是我的发现。

大约一百多家报纸的报道最后又回到了我身上，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报纸，既没有严重的学术上的错误，也没有针对我个人的令人不快的报道。撇开这里面的幽默成分不说，仅从通俗的方式表述科研成果的必要性来看，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是一个相当典型的范例，说明在科技性新闻中依然存在着问题。这是一次教训。事实上类似的还有许多，这些对读者来说都是显而易见的。

评论。1. 这一"学术性"谣言的第一个令人惊讶之处在于，歪曲完全产生在报纸上。它是一个报纸谣言，它例证了我们曾讨论过的，口头谣言与报纸谣言之间相似之处的方方面面。

2. 在应用谣言公式时，我们注意到，在事件中本来就存在着含糊的地方。即使对专家来说，人类起源的问题仍然远没有解决；对一般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不清楚了，而且他没有一个用以区分可信和不可信的标准。尽管这个问题对个人而言并不重要，但它却是一个永远争论不完的话题。在原始新闻摘要中缺乏有关真正"关键内容"的基本报道，这为辨别所发生的歪曲的类型提供了线索。最初的新闻摘要没有任何有关人类起源的内容，但是，为了使这篇文章显得更有新闻价值，记者们和标题编辑们只得安上这么一个能引起人们注意的标题。新闻的价值就像谣言的价值一样，要求文章能够迎合读者的某类兴趣。按读者先在的兴趣去编排客观事实，其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歪曲。作者被迫去说那些与读者的期望相同化的事情。人类起源这一课题在广袤的古生物学领域里是一个，而且是惟一一个较容易理解的课题，读者有可能对它产生兴趣。

3. 在通俗的学术研究论文中，那些有关限制条件的干巴巴的罗列不可避免地被省略了。警告性的说明，附带的建议，研究的条件被减少了。所需要的是不卖弄学问的科研成果。一个很

好的简化例子就是田鼠与家鼠是人类的祖先这种说法。最初的说法是:上述灵长类动物(没有说是人类的祖先)和田鼠、家鼠一样大小。而在新闻中,比喻被省略掉了。

4. 强化是明显的。灵长类动物的年代,相当可观,被吹到七千万年。即使是按保守估计,也已相当久远了。哺乳动物之间偏远的血缘关系被强化到小脊椎动物好像成了人类的直接祖先;而在蒙大拿,在肥沃的美国土壤之上,进化之树到处生长。

5. 同化作用形式多样。语言学上的老词"丢失的环节"理应是指找到一个进化论方向上有所突破的理论。它恰好证明了趋向于期望、语言习惯、兴趣的同化作用。犬类爱好者们依照自己在犬类种系方面的兴趣同化了整个谣言。这一特别的修订被成倍强化了,以至于那些报告会论及想像中的史前狗家族的"60个种类"。关于尺寸的强化发生在"和卡地亚克熊一样大"这句引入语上。省略再一次发生在比喻中,我们发现想像中的特大号狗变成了"卡地亚克熊狗"。

6. 诸如"丢失的环节","卡地亚克熊","猴子祖先","进化理论"这些插入的内容——所有这些都是期望和语言习惯同化作用的产物——也例证了谣言中习俗化的倾向。现行的民间风俗和通俗用语似乎像带静电的小棒,吸引来那些"仅供参考"的消息,并且把它们导入到有一定限制的框架中。学术性的谣言就像其他类型的谣言一样,是以大家所熟悉的事物来充当背景的。

7. 作者哀叹更为荒唐的新闻报道授予他"一个错误的而又难以被认可的称号"。他的埋怨提醒我们这样一个规律,专有名称特别容易受歪曲。这个例子还证明文章中有关时间和数量的说明的不稳定性。

例 5

我们的下一个问题，引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涉及到公共媒体。我们不愿意把这么多的责难指向报纸，但是文字性的谣言易于详细考察，因此特别适于分析。

庞森白(Ponsonby)披露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讲的是在一系列报纸之间滚雪球的事件，他还把这个例子写进《战时谣言》一书中。能够像这样标定出谣言传播过程中经历的每一个阶段是罕见的。这些来自欧洲报纸的报道，主要内容是 1941 年 11 月，安特卫普失陷，沦于德军之手。

当安特卫普陷落的消息传开后，教堂的钟声响了起来(指在德国)。《科隆日报》

据《科隆日报》消息，安特卫普的神职人员在要塞被攻占后，被迫敲响教堂的大钟。《马丁报》

根据《马丁报》从科隆报道，比利时神父们在安特卫普被占领时拒绝敲响教堂大钟，这些比利时神父已被驱逐出他们的教区。《泰晤士报》

据《泰晤士报》从科隆经巴黎报道，在安特卫普被占领后，拒绝敲响教堂大钟的不幸神父们被判罚苦役。卡瑞亚·第拉·塞拉

据卡瑞亚·第拉·塞拉从科隆经伦敦报道，已经证实，安特卫普野蛮的征服者们惩罚不幸的比利时神父们，由于他们勇敢地拒绝敲响教堂的大钟，他们被当做活的钟舌，头朝下吊在钟上。《马丁报》

评论。1. 这是大多数战时谣言的典型，它起因于战争形势

特有的模糊性和在情感上的重要性。它得以延续下去的动机是对敌人的仇恨。(许多战时"仇恨谣言",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不是直接指向敌人,而是指向作为侵略者帮凶的那些当地居民。)在这个例子里,对德国人的仇恨在谣言传播过程中被巧妙地表达出来。

2. 最初的事实核心是简单的、可被查证的事实,即德国教堂里的钟之所以敲响是为庆祝攻克安特卫普。但这一事实,在经过先在的仇恨和对德国佬极有可能犯下暴行的预期的同化作用后,就不见了。

3. 通过一系列的连续转载,教堂的钟(一个熟悉的象征)一直是人们注意的焦点,并且在一系列的报道中被强化,最后,被安上了人作的钟舌。在报道中,教父们先是被驱出教区,然后被判服苦役,最后被处以想像中的可怕的极刑,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存在着强化作用。

4. 以提到教堂的钟为开始,与之相联系,神父的插入也就是一个合理的、习惯性的联想。这样,也就例证了认知活动和有动机的同化作用。

5. 在这一系列转载中最重要的转变,大概是紧接着最初《科隆日报》的报道之后出现的。科隆的报纸认为在德国敲响教堂的钟这件事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法国的编辑把它们放到了比利时。这一重要的失误(这就需要一个详细的合理解释,为什么在一个战败的城市里敲响教堂的钟。)很像有时从一个无意的口头误传而开始的歪曲。一旦一个口头的误传造成了一种含糊的状况,就很容易引发出进一步的有动机的和无动机的解释。

6. 在这一系列的谣言中,带补充说明意图的行为是很明显的。德国人的暴行就是(通过补充说明)我们产生仇恨的理由。另外,故意添加的可能也不能排除。在暴力倾向方面,盟国想要对德国人做的,与德国佬对盟国做的相去不远。但是,假定既然

是德国人而不是盟国犯下了残暴的罪行，在这样的形势下，对盟国来说，就有了一个相当好的机会，使自己尚未暴露出来的残忍逃避谴责。

例 6

下面是在 1943 年蒋介石夫人访美期间流传的一个谣言。事件的场景通常被说成是巴尔的摩。故事是这样的，一天一个绅士走进一家珠宝商店，想要一只价值 500 美元的手表。珠宝商没有那么昂贵的存货，但是最后努力找出一些高级钟表供他的顾客选择。这位顾客一共挑选了价值 7000 美元的手表和珠宝。当店主问他如何付款时，这位顾客回答说，他是蒋夫人的秘书，并且要求，他买东西的钱应该算在给中国的贷款里。

评论。这是二战时典型的挑拨离间式的谣言，它的目的是分裂美国和它的盟友。它是那种对政府官员给以巨大关注的谣言。（同类型的还有俄国人用借款买来的黄油擦他们的枪支，英国人把援助款项用以购买美国的尼龙长袜和其他短缺的奢侈品，结果使我们自己的居民买不到所需要的商品。）

1. 有证据表明，我们可能期望这样的谣言仅在一个有限的谣言圈子中流传。蒋夫人的丑闻会使得那些早就有抵触情绪的人反对中国，或更有可能反对华盛顿民主党执政的政府。

2. 总的看来，像敌意性谣言一样，这是受挫的结果，代替了许多由此而生的敌意。战时的物资短缺是令人烦恼的，而课以重税就更是雪上加霜。假如短缺商品全跑到国外而税收被一个挥霍的政府不顾后果地浪费掉，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感到气愤呢？噢，当然，我们愿意为战争做出牺牲——但是，我们并非在抱怨战争，而是在抱怨由长头发教授和华盛顿“某人”这伙激进分子所组成的、令人厌恶的官僚政府的低效率。这个谣言表现了厌恶和受挫的巧妙融合，它还为我们在政治上持敌对态度提供了

理由与解释。

3. 动机也可能是为了逃避内疚。当战争隆隆作响的时候，许多人沉溺于豪华奢侈，这在和平时期他们是负担不起的，而且和战时强调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战时禁购制度很不协调。但是，面对战时最显赫的人物之一无耻地沉溺于个人享乐，大肆挥霍我们国家的资金去购买那些难以置信的奢侈商品，我们小小的浪费容易被忘记和原谅。

4. 这里可能还有一个同化作用的因素，这一同化趋向于当时普遍认为中国高官浪费和腐败的看法。但是，这一因素，如果的确有的话也是很小的，因为很显然，憎恶的对象更多的是那些有"非分之想"的美国官员。

5. 我们发现，具体细节可以使谣言显得貌似合理。精确的价格——500 美元和 7000 美元——在谣言中被提到。这个例子很像那个柏林谣言，它详细地描述那个盲人坏蛋的衣着和事件发生的那个街道的情况。谣言合理化过程中的一部分往往围绕着那些带有伪权威性细节的内容。

6. 尽管这一故事的地点，并不总是说成在巴尔的摩，然而我们知道，场所一经确定，贴在这一事件上的标签(特别是如果这标签就代表了这个谣言，并且使人产生第一印象的话)将倾向于固定不变。

7. 如果这个谣言并没有提蒋夫人的名字，那么它的基本功能本来是不会发生变化。但是指名道姓一个公众人物却是一个惯用的策略，以使谣言个人化，使它与当前人们兴趣中通俗普遍的主题同化。

例 7

战争还制造了一个关于谣言的谣言。曾经一度有人传言，政府已经通过立法来惩罚所有谣言的传播者。根据这一消息，

犯有散布谣言罪的人将被罚款1万美元或被判有期徒刑。

评论。1. 可能,在这想像出的小小恐慌中起作用的一个突出的原则,就是同化作用。关于煽动叛乱言行的法规是联邦法典的组成部分。这一法律,在战争时期曾广为宣传,它规定对散播可能影响战争顺利进行的谣言的人处以不超过1万美元罚款或监禁。("不超过"的短语被省略掉了)由于情报安全保密运动,也由于谣言的流行突出了有害传言这一话题,公众渐渐对有关谣言的话题有所察觉,而且很容易就把当时四处流传的,一些有关却并无害处的闲言碎语与惑众谣言混为一谈。当然,实际上只有一种非常危险的谣言贩子(可能是一个轴心国间谍)应该受到指控。

2. 但是这种法律上的甄别超出了大多数人的能力。对他们来说,形势是非常含糊的,因为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缺乏法律范畴上的安全标准。

3.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重要性,不仅因为存在着一定数量上的谣言受众,以及战时普遍存在的对危险的敏感性,还因为那些忠诚的市民为了自己或多或少的传谣行为就会毫不怀疑地产生负罪感。自知自己放肆的谈话无益于国家,每个谣言传播者都会在想像中惩罚自己。即便在一些场合里,谣言并未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起到缓解作用,它仍是迂回地表现出严肃的人们感到有遵守战时限制的必要。当然,害怕、内疚和严肃的感觉会混合在一起,混合的程度因人而易。

谣言分析指导

现在,读者可从自己日常听到的谣言中挑选例子做出自己的分析,在进行分析时,你会发现下面的指导性问题是很有用的。这些问题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前面章节中所论述的原理为依

据的。无需说明，不是所有的问题都适用于所有的样本。灵活使用它们，准确而灵活地理解前面所做定义和讨论的必要条件。此外，分析者可能会发现，为了充分解释一些新的谣言，会需要运用一些心理学和社会学原则，这些原则虽然与所举的例子有关，但不是那么常用，所以我们并未涉及。

1. 这一谣言是否只是热门话题中仅供参考的消息？

2. 讲述者与听众是否对证明它的证据缺乏可靠性的标准？

3. 是否同时存在含糊性和重要性？哪一点更为突出？

4. 谣言用何种方式反映出“另有所指”？

5. 它是否对复杂的周围环境和心理状况提供了一个简短明了的解释？

6. 它是否表达了某些内心的紧张不安？

7. 紧张不安首先是情感上的还是非情感上的？

8. 紧张不安是焦虑、敌视、期望、内疚、好奇或其他精神状态？

9. 它是否证明讲述者存在其他自己无法接受的情绪？

10. 是什么使这个谣言对讲述者很重要？

11. 讲述这一谣言使什么情绪得以缓解？

12. 是何种因素使之合理化的？

13. 它是否包含着直接或补充性的设想？

14. 它是否类似一个白日梦？如果是的话，是什么样的白日梦？

15. 它是否起逃避内疚的作用？

16. 它是否反映了被代替的敌意？

17. 讲述这一谣言时，讲述者是否从中获得了他人的注意？

18. 讲述它是否为了取悦一个朋友或投其所好？

19. 它是否作为闲谈？

20. 一个人能否从它可能有的发展中发现事实的核心？

21. 它是否是一个接近尾声的谣言?

22. 在第一印象中它是否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23.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虚构添加过程?

24. 它是否可能包含对细节的说明,如果有,是哪种类型的?

25. 它是否可能有名称、日期、数量和时间上的歪曲?

26. 它是否被贴上了标签或是固定了场所?

27. 主题是否发生了完全的转换?

28. 是否有传统化和道德化的迹象?

29. 它反映出了何种文化同化作用?

30. 它是否带有传说的性质?

31. 能否想像得出它与事实可能正好相反?

32. 它是否别有用心?

33. 它流传时的情况是否证明谣言的繁殖力?

34. 有什么可能被省略掉了?

35. 在讲述中,是否有什么古怪或是多次重复的地方?

36. 是否通过夸大加以强化?

37. 动作、尺寸或类似的特征是否起了强化作用?

38. 是否有具体化和个人化?

39. 可能证明了何种最终的倾向?

40. 是否涉及目前的形势?

41. 是否把过去的事件当代化?

42. 它首要反映的是更为思辨性的还是更为情感性的同化倾向?

43. 是否所有的细节都向主题同化?

44. 是否发生了内容的压缩?

45. 是否有良好持续性的迹象?

46. 同化作用以何种方式来表达期望?

47. 是否有语言习惯的同化作用?

48. 是否有职业的、阶级的、种族的或其他利己的同化作用?

49. 是否有偏见的同化作用?

50. 是否能想像出有的部分被口头误传了?

51. 谣言表达的(暗含的)含义是什么?

52. 它是否表现为爱恨交加?

53. 它是否通过谣言链条传播?

54. 人们之所以轻信某一特别的谣言是因为他们"闻所未闻"还是"过分着迷"?

55. 它能否被分类成恐吓、挑拨离间或是妄想? 或者分为慢性、急性或潜伏性谣言?

56. 它是否构成耳语运动的一部分?

57. 它是否与新闻、报纸有关?

58. 这个故事是否已标明是谣言,或事实,或被称作有可靠的消息来源? 造成什么影响?

59. 驳倒它的最好方法是什么?

60. 它是否表现出危机(暴力)谣言传播四个阶段的任何阶段?

附　录

有关部门制止和控制战时谣言的标准

（马萨诸塞州公共安全委员会和《波士顿先驱旅行者报》谣言诊所联合制定并散发）

一、人员

1. 这项工作的负责人必须成熟，具有良好的判断能力和常识。

2. 负责人和他的助手必须有一些谣言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二、顾问团

顾问人员必须是胜任的、积极的，这点是最基本的。顾问应当包括三类人员。由于对付谣言经常需要相当慎重的判断，所以顾问们应能防止行政官员免受自己的疏忽和思维定势的影响。

1. 技术顾问。这一组应当包括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在对所遇到的谣言现象给以充分的解释时，社会心理学和病态心理学的背景知识也是必要的。

2. 代表顾问。由于谣言管制部门经常要处理复杂的外部关系，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包括宗教、劳工、商业、种族和文化组织在内的广泛的代表团。而所有党派的观点都必须避免。

3. 名誉顾问。这些人是由于他们在社区内显著的有影响

力的地位而被挑选的。他们的尊严和社会地位对于采取措施的有效性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他们可能经常要充当批驳谣言的权威人士。在这一组人中有必要包括当地驻军或海军司令部、公共事务局、民防处。

三、公众合作举报谣言

这个部门必须尽量公开化，成为任何人能够向之报告有害谣言的地方。必须注意深入到公众的所有阶层。

1. 在全社区范围内指定专人留意并报告他们听到的所有谣言。为了协助他们的工作，每两周要给他们送一份问题调查表。除了作为一个收听网外，如果经过适当挑选，这个小组还可以作为民意机构。

2. 应当鼓励市民以邮寄的方式来报告他们听到的所有谣言。所有信件都必须经过认真审阅。

3. 要采取各种预防措施，以确保公众对这一机构的各种意图与诚意，都抱有信心。

4. 此机构决不能取代警察部门，曝光或申斥传谣人。

四、检查和反驳谣言

谣言只能由权威专家来反驳。因此，最重要的是，这一机构要和重要的公共机构中的最高权威建立密切的联系（陆军、海军、公共事务局；联邦调查局等等）。还可用社区主要官员来反驳有害的谣言。

1. 谣言总是应该由其他部门来反驳。谣言监控机构不要自己去辟谣。

2. 反驳必须有逻辑性和事实根据。一个贫乏而又不明确的回答会给公众的信任造成很大的伤害。

报纸上谣言诊所的写作标准应当远远高于一般的新闻评论，因为读者们对貌似有理的文章中不合逻辑的地方的要求是苛刻的。对于那些与目前公众相信的某些东西或公众根深蒂固

的成见发生抵触的东西，他们会产生怀疑。

3. 不要夸大事实。许多谣言都有一个事实的内核。如果采取直率坦白的政策会增强公众的信任。

当谣言大体上是真实的，同时也是有害的时候，最好不要让它流传得更广。

4. 不要暗示所有的谣言都是由纳粹制造的。如果过分强调轴心国散布的谣言会使这一机构失去信任。最好是告诉公众，眼下有一些谣言的内容是与通过轴心国短波电台广播内容一致，这样可以使让事件平息下来。

5. 把谣言置于一个不利的境地。

在陈述一则谣言之前，先谴责它；陈述之后，再一次谴责它。

6. 不要印刷或用其他类似方式公布带有惊人口号的恶性谣言。淡化惊人的语句以使它不被记住。危险在于即使加以反驳，口号和警句依然会由于它们令人吃惊的特点而被记住。

例如，那个说国内南方组织了尹丽娜俱乐部的谣言，其口号为："每一个白人妇女留在她自己的厨房里过圣诞节"——要想淡化它，最好说，"据谣传，国内南方的一些家庭仆役组织了尹丽娜俱乐部，它的目的是迫使白人妇女干她们自己的厨房家务。"

7. 在送去印刷以前，应允许顾问团有较长的时间地阅读那些有关谣言的文件。需 2—3 天的时间，让顾问们吸收、阅读和反馈他们可能提出的任何评论。

8. 经验表明，仅有大约 10% 的谣言被及时公布。负责人必须对以下事务个别处理：大约一半谣言需要提交给其他组织（公共事务所、红十字会、邮局）查询，要求作出特别的回答。其他的必须转交给联邦调查局或调查人员让他们去寻找答案。还有一些仅值得扔进废纸篓。处理谣言是一件耗时间的事情，不应当草率行事。

9. 在反驳种族问题的谣言时，作为一条原则，不要特别强

调被攻击的种族。要把所能列举的全部种族放在一块讨论(例如,黑人、犹太人、劳工组织者、资本家、爱尔兰人、国会、英国人等等),并且表明所听到的恶毒言论是针对所有这些种族和阶层的。

10. 决不能把谣言分析当做报纸社论的观点。必须保持客观事实的最高标准。用新的虚构故事作为社论会降低报纸的道德规范。

11. 谣言不应该被说成仅仅是一个玩笑。公众不可将其当做仅仅是一个幽默的娱乐。

12. 涉及谣言的电台广播节目应注意绝对防止无意中扩散谣言。

五、行动的方法

这个机构必须做好充分准备去解决思想道德领域内的各种问题。

1. 对遇到的许多问题都需要有良好的判断力,了解社区情况及愿意对社区的文明建设出力。

2. 该机构必须准备好运用下列全部或绝大多数办法:

a. 调查委员会。一些谣言可能需要指定一个委员会进行调查,以确定 事实真相并与之斗争。委员会的报告要与谣言一起发表。

b. 海报和图解。绝大多数海报仅仅把谣言描述成向敌人提供消息的情报源。挑拨离间式的谣言造成道德败坏的结果可能更为严重,且可用图示说明。

c. 宣传文学。传单、图表、小册子等等,只要写得好,内容真实,就可以成为传递信息和警惕谣言的有效手段。

d. 电台宣传。电台宣传与谣言斗争有两种形式。首先是"事实真相"节目。这一方式的基本原则是,如果事实是可靠的、完整的,谣言就没有生长的场所。第二类节目一般对付谣言和

闲言碎语。这些节目将举例证明战争时期谣言的荒谬可笑、危险和威胁。无论如何，必须给予适当的警告，以免谣言通过电台广播传播出去。记住：人们收听晚，关机早。

e. 宣传人员。在所有有组织的行动之前，宣传员先出面，讨论眼下流行的谣言，并证明谣言的危害，这对任何反对谣言的行动都是有价值的。

f. 民意监督员。这是一些住在社区内的人们，他们的首要职责是报告谣言。他们构成一个收听网络，作为反映公众观点的晴雨表。

g. 谎言特写。1942 年 9 月《读者文摘》上的文章就是这类宣传，文章的名称是《波士顿向谣言开战》。其他一些文章和故事也能很好地阐述战时谣言、谣言和宣传的关系等等。

h. 电影。虽然电影是把反谣言意识带给公众的一个非常有效的途径，但迄今为止应用很少。不管怎么说，《长舌先生》就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它是涉及这一主题的优秀影片。

六、对谣言的打击要点

一个公开打击谣言的运动应遵循以下几条：

1. 谣言是不可信的，几乎全是虚假的。明智的人都不会相信。

2. 谣言可能是敌人的一种宣传手段。

3. 谣言对道德品行是有害的，传播谣言是不爱国行为，是可耻的。

4. 传播谣言的人是愚蠢的、怀有恶意的或危险的人。

5. 散布谣言通常是寻找替罪羊，其形式是为摆脱困境而谴责无辜。

《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一辑

85种(80册) 定价:630.00元

传统文化书系47种(39册) 307.40元

1	周易·尚书·诗经	9.80	17	墨子	8.00
2	周礼·仪礼	8.60	18	老子·庄子·孙子·吴子	9.70
3	礼记	8.60	19	世说新语	9.80
4	春秋左传(2册)	16.00	20	搜神记	6.80
5	春秋公羊传	6.10	21	梦溪笔谈	9.80
6	春秋谷梁传	5.70	22	楚辞	4.80
7	论语·孟子·孝经·尔雅	9.80	23	古诗源	9.80
8	帝王世纪·山海经·逸周书	9.80	24	陶渊明集	8.40
			25	李太白集(2册)	14.40
9	国语	6.90	26	杜工部集(2册)	18.80
10	战国策(2册)	14.00	27	李贺歌诗编·李商隐诗集	8.70
11	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5.40	28	乐府雅词	9.80
			29	花庵词选(2册)	15.30
12	史通	8.00	30	明词综	9.20
13	孔子家语	6.10	31	西厢记	3.10
14	荀子	6.50	32	牡丹亭	7.20
15	管子	9.80	33	桃花扇	8.00
16	韩非子	8.30	34	长生殿	6.40

近世文化书系17种(17册)145.30元

1	王国维:静庵文集	8.80	3	刘师培:中古文学论著三种	7.20
2	熊十力:十力语要(2册)	17.00			

4 杭辛斋:学易笔谈·读易杂识 9.80
5 陈　垣:通鉴胡注表微(2册) 13.00
6 萧一山:清代史 9.80
7 傅斯年:史料论略及其他 9.20
8 瞿兑之:　杶庐所闻录·养和室随笔 9.20
9 徐一士:一士类稿 9.00
10 刘成禺:世载堂杂忆 9.80
11 蒋梦麟:西潮 9.80
12 罗家伦、罗庸:新人生观·鸭池十讲 8.10
13 叶恭绰:矩园余墨 8.90
14 吴经熊、苏雪林:唐诗四季·唐诗概论 9.80
15 陈　铨:中德文学研究 5.90

外国文化书系 21 种(24 册)　177.30 元

1 梅烈日科夫斯基:诸神死了——背教者尤利安(2册) 15.50
2 德日进:人的现象 9.90
3 凯特·萧邦:觉醒 6.90
4 卡尔维诺: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 3.90
5 海因利希·奥特:上帝 5.10
6 彭迈克:难以捉摸的中国人——中国人心理剖析 5.80
7 密那:母亲的话 5.00
8 伊林:书的故事 附:话说图书 6.90
9 约翰·温特里奇:书与人 5.60
10 埃米尔·路德维希:尼罗河传———一条河的传奇(2册) 22.00
11 伊迪斯·华尔顿:伊坦·弗洛美 4.80
12 T.E. 劳伦斯:沙漠革命记 5.40
13 司汤达:爱情论(2册) 16.40
14 格雷厄姆:杨柳风 7.20
15 力争上游——布克尔·华盛顿自传 6.60
16 斯蒂文生:携驴旅行记 附内河航行记 9.80
17 暴风雪——阿克萨科夫散文集 8.30
18 王尔德:温夫人的扇子 3.20
19 最后一次幽会——伊万·布宁散文集 9.50
20 莫斯科的伪善者们——契诃夫散文集 9.80
21 詹姆斯·罗宾森:尤金·奥尼尔和东方思想———分为二的心象 9.70